

关于清除党内 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四

• 意

出 版 說 明

这本小冊子里，选編了六十九件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的党籍的决定和決議，仅供县委以上党委和有关黨員幹部閱。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璉党籍的决定.....	(1)
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机关总支委员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郝可銘的党籍.....	(4)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仲平党籍的决定.....	(7)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林朗党籍的决定.....	(9)
中共中苏友好协会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廖經天党籍的决定.....	(13)
中共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学增党籍的决定.....	(18)
中共教育部临时党组、教育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展开反对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斗争的报告.....	(20)
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尙明党籍的决定.....	(28)
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詹武党籍的决定.....	(30)
中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夏鳴党籍的决定.....	(32)
中共广播事业局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温济澤党籍的决定.....	(33)
中共通俗读物出版社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蓝鈺党籍的决定.....	(38)

人民鐵道報社整風領導小組對右派分子范四夫的处理决定·····	(39)
人民鐵道報社整風領導小組對右派分子刘萍的处理决定·····	(40)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對右派分子袁毓明的处理結論·····	(42)
中共新華社对外部支部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陈适五党籍的決議·····	(43)
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極右分子翟宜地党籍的决定·····	(45)
中共輕工業部造紙設計院总支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李平党籍的决定·····	(49)
中共建筑工程部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陈永清党籍的决定·····	(52)
中共地質部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刘韻党籍的决定·····	(58)
中共地質部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刘毅党籍的决定·····	(61)
中共石油工業部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楊海鵬党籍的决定·····	(64)
中共建筑材料部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陈新党籍的决定·····	(6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建設委員會整風領導小組對右派分子罗維的結論·····	(68)
中共城市建設部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牟宜之党籍的决定·····	(70)
中共水產部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極右分子刘乐川党籍的决定·····	(72)
中共農業部机关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張子敬党	

籍的决定.....	(75)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孙森甫党	
籍的决定.....	(76)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普通班第七支部委员会关于极右	
分子徐盈的政治结论.....	(77)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齐	
佩軒的处理结论.....	(82)
中共司法部机关委员会关于极右分子王怀安的结论	
及处理决定.....	(84)
中共监察部第一司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	
沐英党籍的决定.....	(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整风领导小组对右派分子王	
善玲的处理结论.....	(88)
中共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罗	
青党籍的决定.....	(90)
中共对外贸易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超	
党籍的决定.....	(92)
中共第二商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华	
党籍的决定.....	(95)
中共卫生部机关委员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齐仲桓的	
党籍.....	(98)
中共辽宁省委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开除坏分子、	
右派分子阮途党籍的决定.....	(101)
中共辽宁省水利局总支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	
宗义党籍的决定.....	(103)
中共辽宁省气象局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敬党籍	
的决定.....	(112)
中共东北工学院委员会关于极右分子王銘勳的处分	
决定.....	(114)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曾軍的 党籍的决定.....	(116)
中共鞍山市委组织部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董惠民党籍的決議.....	(120)
中共鞍山市文化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楊东昉党籍 的决定.....	(125)
中共旅大市委扩大會議对党内右派分子王輔民、黃 易明問題的決議.....	(126)
中共辽宁省妇联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立 党籍的决定.....	(129)
中共吉林省林业厅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坏分子、右 派分子王其清党籍的决定.....	(132)
中共长春市委委员会关于極右分子范政的結論.....	(137)
长春电力設計院整風领导小组关于極右分子張濤的 政治結論.....	(138)
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处理右派分子 章洛的决定.....	(142)
中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右派分子閻伟鋒的 反党活动和处理意見的报告.....	(145)
中共唐山铁道学院委员会对右派分子白鉄岩开除党 籍的处分决定.....	(150)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張田党籍的决定.....	(153)
中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局支部委员会关于 开除右派分子王斐然党籍的决定.....	(157)
中共北京市司法局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賀 生高党籍的决定.....	(162)
中共北京市房管局第二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 子馬陵党籍的决定.....	(165)
中共北京地質勘探学院委员会对右派分子陈子谷的	

处分决定·····	(167)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除高沐鸿党籍的决定·····	(176)
中共山西省交通厅机关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景良党籍的决定·····	(183)
中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韩林党籍的决定·····	(186)
中共陕西省卫生厅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明党籍的决议·····	(189)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杨林党籍的决定·····	(195)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文良党籍的决定·····	(200)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晓天党籍的决定·····	(203)
中共兰州市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秦汝哲的政治结论·····	(210)
中共青海省委委员会对右派分子刘杰的处理结论·····	(214)
中共青海省委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潘光亚的处理结论·····	(216)
中共青海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雷鸣的处理结论·····	(218)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哈木提尧鲁达西甫的党籍·····	(223)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極右分子李之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璉、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見的报告，决定立即撤消李之璉現任机关党委委員和書記职务並开除其党籍。

附：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風领导小组关于極右分子李之璉的政治結論

李之璉，男，四十四岁，河北蠡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現任职务：中央宣传部秘書长、机关党委書記。

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續不完备”为借口，保持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在他提出的审查結論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屬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錯誤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間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計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結論的三点保留，以欺騙和愚弄組織。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們写“申诉書”，並广为印發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書”。完全按照丁玲

的意思对丁、陈問題进行所謂重新查对，力圖为丁、陈开脫。丁玲直接寄給他的一封为自己辯护、污蔑周揚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給周揚同志和作协党组負責同志传閱，他完全照办。他还散布“一九五五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錯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定掉”等流言，並在八大第一次會議的河南小組會議上說：“丁、陈問題搞錯了”，企圖在八大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給他的信中公然污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陷害”，李之璉予以默認；丁玲在給他的密信中竟說“翻身有日，有重見天日的可能”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語說：“丁、陈問題自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直到現在还未做出結論”。企圖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錯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2、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積極分子的恶毒政策。他認為肃反搞群众运动是錯誤的。他片面地夸大肃反运动中的部分缺点錯誤，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績，認為从反对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發展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思想上組織上是缺乏准备的”，因而，普遍地發生了“盲目性”和“扩大化”。他同时还散布謠言說：“中央准备释放胡風”。他特別集中反对作协的肃反，認為作协肃反工作有偏差是由于“党委过分依賴了中央十人小組的直接领导”，这实际上是指責中央十人小組。他在甄別工作中，強調所謂避免同被审查者之間造成对立，对多数历史反革命分子在結論上都不写明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还特別強調对肃反对象的“賠礼道歉”。在他亲自召集的对肃反对象的“賠礼道歉”会上，对参加会的肃反对象表示極大的同情，附和他們对肃反运动的攻击。他在会上鼓励他們“坚持真理”，要有“独立見解”，要把反攻的鋒芒对着領導。他並且說：“在运动中一些同志受到一些不同的对待，事后

同志們不滿，這種不滿是合理的……有些同志經不起考驗而自殺了，你們总算忍受過來了，這也是政治上的涵養。……忍受這種苦難是政治上的鍛煉。”

李之璉是一個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野心家，他是一個在黨內隱藏得很深的陰謀家，他的許多反黨活動都是背着部的領導，利用取權，採用兩面三刀的手法進行的。過去他曾經背叛過革命，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後，喪失革命氣節，在供詞上和上訴書中提出“反對共產黨”，辱罵黨為“共匪”、“反動團體”，說：“強日侵于外，共匪擾于內”，“共黨固宜痛剿，不遺余力”等。他在東北工作期間，反對當時的平分土地運動，認為如果發動群眾在一九四八年春耕前“又快又透”的搞完土改，東北幾百萬人就會有餓死的危險。並公開主張“右比左好”。他在文藝思想上也極為反動，他在延安發表的文藝作品中，對革命戰爭充分表露了恐懼、絕望和動搖的陰暗思想。一九五七年春，他還寫了一首丑化和污蔑轉業軍人的反動長詩“靈魂深處”，赤裸裸地表達了他對革命事業悲觀失望的心理。

鬥爭中的態度：極不老實，不肯交代，進行詭辯，尚未真心低頭認罪。

處理意見：劃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已經中央批准），降六級（由行政七級降為十三級），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財貿工作部机关总支委员会 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郝可銘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郝可銘，男，山西省洪赵县人，四十五岁，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中共中央財貿工作部幹部管理处处长。

郝可銘在幹部处工作期間，同該处副处长江卓、二級巡視員李毅組成了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他的主要錯誤事实是：

一、反对和抗拒中央的指示和决定。

他反对中央分級分部管理幹部的决定。他說：“我不敢說中央分級分部管理幹部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並譏諷地說“我只好說它正确”。反对中央規定的中央新成立的部（工业部、交通部、財貿部）的四条任务，他說：“四条任务很空”，“你抓也可以，不抓也可以”。他对政治思想工作、幹部工作、政策检查工作都进行了攻击和否定。他还反对下乡到基層調查了解情况。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他在中央財貿部整風領導小組（扩大）會議上，公开抗拒中央書記处关于帮助国家机关有关部門整風运动的指示。他說去帮助对口部整風是“不伦不类”。当他被迫接受了任务以后，不仅消极怠工，还在幹部处散布謬論說：“派人帮助别人整風，会增加人家的麻煩”。

郝可銘反对中央关于幹部訓練教育工作的指示，主张取消幹部訓練工作。他說“幹部訓練工作不是我們的工作”，“幹部訓練工作是个包袱”。他反对陈云同志关于改进財貿各部門幹校教学工作，要各业务部門負責同志亲自上課，借以总结工作經驗，

克服教条主义的指示。中央財貿部決定財貿幹校教學內容以理論、業務政策為主，強調學習毛主席著作。他反對學習政治理論和毛主席的著作。當資產階級右派反對高等學校實行黨委制的時候，他就主張幹部學校同高等學校一樣不實行黨委制，因而拒絕簽發要黑龍江省委財貿部總結省合作幹校實行黨委制的通知。

二、散布流言蜚語，破壞黨的團結，誹謗中央和毛主席，破壞中蘇友誼。

三、否定中央財貿部的工作成績，對抗部的領導。

一九五七年二月馬明方同志在全國財貿部長會議上對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做了估計，肯定成績是主要的，而郝可銘卻說：“有人說成績是主要的，我就不同意這句話”。他說，如果說我們有成績的話，就是發現了中央成立的中央財貿部是“基礎同上層建築不相適應”。他反對“我們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是正確的，因此成績就是主要的”的說法。他對馬明方同志報告中的許多問題進行了攻擊，企圖煽動大家反對領導。

四、整風運動中，煽風點火，包庇右派，向党進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幹部處江卓副處長主持起草了“關於非黨幹部的提拔使用情況的報告”（草稿），其中不加批判地引用了一些反黨言論，並錯誤地指責黨的部幹政策。部里要他們修改，他們不修改，到反右派鬥爭的時候，又把這份文件拿出來，要幹部處幹部鳴放。他說“這個文件還是有用的”，“為什麼不發表，為什麼不送中央？”他還散布挑撥性的言論，說中央財貿部“矛盾的鋒芒主要是領導與被領導間的問題”，向別人暗示領導上有錯誤，企圖掀起反黨反領導的鬥爭。

郝可銘反對認真進行反右派鬥爭，並包庇右派分子郝守業（幹部處工作人員），部里指示詳細調查核實郝守業的錯誤事實，他不執行。部里把郝守業的錯誤事實弄清楚，經過了幾次大會批判肯定是右派分子以後，他又積極主張把郝守業留在黨內。郝可銘還利用李毅向党進攻，並且包庇李毅，他把整風辦公室整

理的关于李毅的錯誤言行材料传给李敏看，要李毅預为准备。他还諷刺、打击積極同李毅进行斗争的同志。此外，他还詆毀浙江省委对沙文汉等右派分子的斗争。

五、工作消極。郝可銘在中央財貿部工作期間消極怠工是一貫的，而且愈來愈严重。他常常在办公時間带头下棋、打扑克、看小說，迟到早退，无故不上班。他連自己的检讨，也找別人代写。他的病本来不是那样严重，医生証明他是可以上班的，但自反右派斗争以后，他即借口有病欺騙組織，不上班。

郝可銘的上述錯誤並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沒有根本改造的旧知識分子。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生活頗富裕”的官僚兼商人的家庭中渡过的。他的剝削階級意識很深，入党以后，屢犯重大錯誤。一九四零年他在恋爱問題上和党的團結問題上犯了錯誤以后，竟然把党对他的教育說成是“摧殘”他。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期間，他两次私自回家养病，两年多未做工作。党批評他，他竟誣蔑党“誹謗非難”他。一九四九年他在福建閩侯地委任地委書記期間，把我們党領導的福建人民英勇堅持了二十年的革命斗争，誣蔑为“只是一条失敗的經驗”。他反抗省委的減租指示，还指示各县委“勿为外界（指省委）影响所动摇”。对于这些錯誤，他不但沒有改悔，反而說“党内麻煩，只要你犯了錯誤，什么时候都要整你一下”。他沒有認真的自我改造，一貫的站在極端个人主义的立場上来觀察問題。这次整風运动中郝可銘所犯的錯誤，是他反党思想的發展和暴露。为了严肃党的紀律，中共中央財貿工作部机关总支委員會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郝可銘的党籍，並且撤消他担任的一切职务。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仲平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陈仲平，男，四十五岁，福建省武平县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职员。一九三〇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县委特派員、地委副書記、专員等职。現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陈仲平在近几年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高潮以来和右派进攻期間，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馬列主义的活动，其主要事实是：

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陈仲平經常攻击党的某些基本政策，誣蔑中直“三反”运动搞“左”了，誣蔑統購統銷搞“糟”了。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他更进一步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恶毒地誹謗、誣蔑党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導同志，恶毒地造謠、誹謗兄弟国家的領袖，公然为胡風辯护，包庇反党坏分子古达。在反右派斗争中又同情、包庇右派分子，为他們的反党罪行开脫、辯护。

他誣蔑校党委不能領導教学，攻击党的教学方針；反对“向學員学习，为學員服务”的口号；反对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結合的方針，坚持资产阶级的治学方向。他还造謠中伤，誹謗党委第一書記楊献珍同志，罵侯副校长“不学无术”，不能領導教学，抗拒党委領導，不执行党委決議。

几年来，陈在室内極力培植个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拉攏黎明、朱明搞宗派活动，打击排斥異己。破坏党和同志間的团结，阻挠貫徹党委的指示和決議，把持領導权，使党委的指示在

哲学教研室不能貫徹执行。对其他部門，陈用同样办法破坏师訓部、短訓班党的統一領導，破坏部門間的團結，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

陈仲平很久以来就存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早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在本校學習期間，就積極参加了陈华、陈銘金地方主义的反党活动，策划与組織他們向中央告状。攻击党的南下幹部掛帅的方針。以后又不断散布南下幹部排斥本地幹部的錯誤言論，並对党的反地方主义斗争肆意攻击。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他又企圖再次組織普通班學員向中央告状，借以达到反掉南下幹部掛帅的方針的目的。

当他的錯誤被揭發后，他不但不低头認罪，徹底交代，反而对整風运动进行破坏。整改运动刚开始即散布空气、緩和反右斗争的鋒芒；进而压制批評，打击报复，制止別人揭發問題；利用領導职位，拉攏部分同志，指示他們“解釋”、串連，召开座談会，用各种方式大肆活动，混淆是非，制造混乱，轉移斗争目标，抗拒党的領導，阻碍运动的开展；当他的阴谋被揭穿后，竟公开抵抗，直至在全室大会上作了檢討，虽承認了反党罪行，但对某些重大錯誤仍采取抵賴态度。党組織为了挽救陈仲平，五个月来，一直耐心教育帮助，但陈直至开全校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时仍不覺悟，态度很坏。据此，陈仲平已背叛了党、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完全蜕化成为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支部大会决定开除陈仲平的党籍，並建議行政撤消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职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林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同意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右派分子林朗的斗争（林朗已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决定撤消右派分子林朗现任机关党委委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 右派分子林朗的政治结论

林朗，原名姜国忠，男，家庭出身地主兼商人，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编辑、採訪部科长，延安新华社解放区部副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西北群众日报总编辑，西北行政委员会新闻局副局长，新华社总社副总编辑兼国内部主任，俄文友好报总编辑，一九五七年五月任中苏友协总会副秘书长，党内任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

林朗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1、林朗一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就完全站在右派立场，违抗中央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批发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组“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问题报告”的指示，否定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绩，把总会过去的工作说成“一团糟”，并以此污蔑和攻击当时的党组和党组书记钱俊瑞同志。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五月总会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上，恶毒地提出关于总会“领导核心长期不

能形成的原因何在？”的問題，來追查責任。這显然是要把責任推到錢俊瑞同志身上，以此來污蔑、攻擊錢俊瑞同志，達到攆走錢俊瑞同志，取得秘書長職務的目的。他在这次會上，就公開提出請中央考慮不讓錢俊瑞同志再兼友協總會的秘書長職務。

2、整風鳴放期間，林朗在總會與右派分子廖經天（原總會黨組副書記、副秘書長）、在友好報與反黨分子庄方（總會黨組組員、俄文友好報副總編輯）結成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反黨聯盟，公然違抗中央整風指示，出謀劃策，有意識、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策動和組織黨內外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廖經天的反黨整風計劃和反黨的動員報告是經過林朗看過和同意的，廖經天在整風鳴放初期的一系列反黨措施，都是經過林朗同意的。有些具體措施還是林朗直接指示實行的。比如林朗提議成立四個翻案小組（幹部工作，三反，肅反，領導關係），並親自布置這四個組極力進行翻案活動。

在友好報，庄方的反黨整風計劃和具體措施，也是林朗同意的。林朗在整風一開始，還特別惡毒地規定總編輯、副總編輯迴避會議，領導人暫不表示態度的組織措施，讓右派分子毫無顧忌地向黨進攻，向領導同志，其中特別向盧竟如同志進攻。

在整風鳴放初期，在總會和總會會刊友好報都出現了右派分子鬧大民主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局面。林朗是支持右派分子鬧大民主的。他曾在總會黨支部大會上公開支持右派分子鬧大民主說：“昨天聽說大民主有到來的趨勢。群眾（林朗心目中的“群眾”，就是右派分子）不滿是正當的，因為過去的問題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混亂的……”

人民日報6月8日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後，林朗認為國內形勢急轉直下，他唯恐機關里面右派分子的反黨情緒受到影響，在總會提出所謂“外緊內松”方針，在友好報提出所謂“我們機關沒有民主人士，和社會上情況不一樣”的論調，繼續鼓勵右派分子向党進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林朗顽强地抗拒中宣部和钱俊瑞同志提出应把廖经天划成右派分子的指示，并且千方百计破坏与阻挠反右派斗争，包庇其他右派分子。在总会，林朗特别顽强地包庇右派分子廖经天、李林；在友好报，林朗自始至终包庇由庄方挂帅的林璋、尤锡麒、宫以仁右派反党小集团。对总会及友好报的所有右派分子，林朗给予极大的同情和关怀。他甚至在陈璋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策动他翻案。右派分子对林朗表示了无限的感激和推崇。极右分子辛秋水逢人便说，他最钦佩两个人：一个是李之璉，一个是林朗。

3、抗拒执行中央关于俄文友好报由日报改周刊的决定和办周刊的政治方针，自改刊之日起直到揭他罪恶盖子之时为止，周刊所执行的是他反党的方针。

中央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初就作出了改刊的决定，林朗在友好报的一次编委会上竟公开地抗拒说：中央不了解情况，我们不妨着手改版的筹备工作，先收集一些情况供中央考虑改变决定。他还借口技术上的困难，把改刊决定拖延两月之久，直到中央联络部一再催促之后，才仓促在10月1日改刊。改刊后，林朗又指示在读者来信摘要上，大量选刊读者不同意改周刊的意见，妄图以此来与中央对抗和迫使中央修改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

4、林朗执行资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和“用人唯亲、用人唯不贤”的家天下的干部政策，抗拒中央“有反必肃”的方针，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俄文友好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林朗在总会及俄文友好报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维护党的利益的同志，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要把这些人撵走；而对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党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坏分子却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把这些人安插在重要工作岗位甚至党的要害部门。林朗在友好报一手包庇和重用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党分子达八人之多。在很多部门插上了白旗，拔掉了红旗。

林朗为了拉攏幹部，培植亲信，完全破坏党的組織原則，任意扩大閱讀內部文件的范围，特別恶毒的是，党内許多重要传达报告，如传达党中央南宁會議、成都会議、武汉會議的內容时，吸收叛徒夏牧原、反革命分子楊金涛和其他一些历史复杂的非黨員参加。

林朗和庄方长期以来操縱和把持了友好报党的支部，在他們担任前后两届支部書記期間，对思想落后、品質恶劣的人从不进行教育，而且还計劃把一些思想極端落后、对党不滿、品質恶劣的人拉进党内来。

一九五五年全国肃反时，林朗以俄文友好报是新建立的机关，問題不多为借口，抗拒中央“有反必肃”的方針，在俄文友好报不把肃反作为群众运动来进行，以审幹代替肃反。林朗在一九五七年友好报作整風勁員报告时，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說：

“俄文友好报沒有进行肃反，問題不大，別的机关問題很多，就是因为肃反的遺留問題”。在他的包庇和寬容下，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在总会，在他所領導的翻案小組的策动下，肃反中畏罪自杀的叛党分子刘瑞祥的妻子王淑兰曾到总会控訴我們的肃反斗争，說肃反把她的爱人害死了，这个会是林朗領導的肃反翻案小組主持的，林朗事前已知道此事但並不加制止，事后还認為王淑兰沒有在会上鬧起来，“表現很好”，因此發給她補助金一千元。

林朗反党是有他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林朗出身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抱着个人野心混入党内，入党后又拒絕党对他的教育和改造。他的反党是一貫的和多方面的：他一貫反对本单位的領導，一貫抗拒上級党委和中央的領導，一貫无組織、无紀律、个人决定一切，一貫抗拒执行党的組織路綫和幹部政策，一貫坚持資產階級立場，一貫追求資產階級生活享受，一貫抗拒思想改造。

林朗是一个資產階級極端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家，他的个人

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当党对他的信任越高，給予他以更多更大职权时，他不但不兢兢业业，来完成党对他的付托，相反地，他利用这些职权，变本加厉地进行多方面的反党活动，以致今天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在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召开了揭發和批判林朗反党罪行的会议后，林朗的态度极不老实。他回到友好报来还继续活动，找人谈话，散布流言蜚语，企图拉拢人，争取同情；並曾一度悲观失望，有过自杀的念头。在总会及其友好报党员幹部大会上，对林朗的罪行继续深入揭發和批判后，他的态度稍有转变，在会上先后作了三次检查。这些检查虽稍有进展，但总的来說，仍然是不老实的，沒有向党交心。他不具体交代他的反党阴谋活动，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仍避重就輕。他沒有积极交代自己的罪行和揭發別人的材料。

处理意見：根据林朗所犯的罪行，应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降五級（由九級降为十四級）下放参加劳动。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苏友好协会总支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廖經天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支部根据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整風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右派分子廖經天的政治結論”，为了严肃党纪和純潔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右派分子廖經天的党籍。

附：中苏友好协会整風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廖經天的政治結論

廖經天，男，四十六岁，广东省梅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一九三九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历任延安解放日报研究员，群众日报（原冀热辽日报）付总編輯，北京市委宣传部編审科长，长沙新湖南日报付总編輯。一九五〇年任广西日报社长。一九五二年任人民日报付总編輯。一九五三年五月間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任党组付書記、第一付秘書长。

主要反动言行：

1、廖經天抗拒执行中央对友协方針的指示，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廖經天来中苏友协总会后，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友协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友协宣传工作方針：“面向工农、面向生产、密切結合各个时期和各个部門的中心工作，介紹苏联先进生产經驗。”企圖大搞一番。由于这个方針在中宣部常务会议上討論时未被批准，廖經天便心怀不滿，污蔑中宣部领导同志，說：“个别领导同志憑印象發表一些意見，既不見得中肯，也不解決問題。”自此他就开始消極对抗，长期不做工作，向人表示要“鬧到撤职查办完事！”一九五六年二月，拒絕参加总会召开的友协工作规划座談会。四月，錢俊瑞同志主持的党组会，批評了他的消極情緒，他立即給錢俊瑞同志写了抗議信，对錢及其他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八月，友协总会党组研究友协方針任务問題期間，廖經天認為中苏友协没有什么工作可作，主張只要掛个牌子以照顧政治影响。这实际上是取消中苏友协。一九五七年二月，中央批准了总会党组“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問題的報告”。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認為中苏友协今后沒

有什么工作可做甚至取消的想法是錯誤的。这与廖經天实际上取消友协的主张毫无共同之处，而他竟恬不知耻地说，中央批准的这文件，就是根据他的意见写出来的。

廖經天还进一步攻击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友协总会党组扩大会上说：一九五三年中苏友协組織形式转变以后，中央确定友协为宣传机构，是錯誤的；一九五四年一月友协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确定的方針，就是在这个錯誤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廖經天向全机关工作人员作的整風动员报告，重述了上述这个論点。他是有意地把錯誤归于中央，煽动群众对中央不滿，煽动群众反党。

二、廖經天长期以来，有意識、有目的地制造种种流言蜚語，向党进攻。他經常以友协总会党组書記与付書記“职责不清”为借口，多次攻击錢俊瑞同志和党组其他同志。說：“錢又管又不管”，“我这个党组付書記到底向誰負責？我算什么实际負責人？”又说：“我的所謂总的領導重任，就只好成为供在神龕上的牌位”。还说：“我甘願做赵仲池第二”（按指宗派排挤）。

一九五六年八月，友协总会研究友协方針任务时期，散布他实际上取消中苏友协的荒謬主张，以此来拉攏一批有反党思想的人，如赵洛生、印石等，一道兴風作浪，攻击党，攻击領導。在他的影响、縱容与支持下，在总会形成了一个由他掛帅的反党大联合，其成員有李林、欧阳惠（已划为右派分子）、赵洛生（已划为右派分子）、印石等人。这个反党大联合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由四个黨員（欧阳惠、赵洛生、寿航、焦野），書面給少奇同志写了一份反党的报告（李林出謀划策，廖經天也是支持的）。污蔑和攻击党的領導。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五月，总会党组扩大会议检查工作，廖經天在会上談，他是受宗派迫害的，他自比为旧社会的县太爷，而其他領導同志则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凡事都得通过他們，否則这个县太爷就做不下去。在廖經天的支持下，这些人又从总会的方針任务、幹部政策、領導关系等三个方

面向党进行了猛烈的全面攻击和阴谋活动。

三、整風鳴放时期，廖經天与林朗共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地进行了反党阴谋活动。廖經天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当資產階級右派向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便和党內外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糾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地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1)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廖經天与林朗共謀拟定他們的反党綱領——所謂“整風計劃”。在这个反党綱領中指出：首先应集中力量揭露与解决机关內部矛盾——領導同志之間的矛盾；領導与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党群关系問題。並乘机在方針任务問題上追查責任，企圖將斗争鋒芒引向攻击党的領導。

(2)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廖經天在总会全机关人員的大会上作了反党的動員令（即所謂整風動員报告）極其恶毒的煽動說：“总会早就存在着所謂无形的頑固堡垒”；“部分領導同志有宗派主义情緒，錢俊瑞同志也有偏听偏信。……”說这个宗派中的成員“互相吹嘘，对錢歌功頌德”，“錢掛名，叫廖負实际責任，而实际上，有許多工作是錢直接抓，使廖不好工作”。进而污蔑領導同志是“憑資格职权，發号施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更恶毒的是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是“用人唯亲，用人唯党，用人唯不賢”。污蔑党处理有政治問題的人“不严肃，……使他們长期背包袱”，並丑化党群关系。廖經天的这个“整風動員报告”，是事先与林朗討論並且經他同意的。

(3) 六月一日，廖經天又在中苏友好报整風小組会上两次發言，进一步恶毒地攻击錢俊瑞同志和所謂“頑固堡垒”，自称他在总会完全是有职无权的，把自己装扮成受宗派排挤的人，以此騙取群众的同情，煽动群众对領導的不滿。

(4) 与林朗共謀，採取了一系列的反党的組織措施。提出整風墙报不受党支部的領導；墙报編委会“民选”；整風小組付組長“民选”；成立三反、严反、幹部工作、領導关系等四个“調查研究小組”（实际是翻案小組），攻击右派分子，严重右

傾分子和未定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参加这些小組工作；召开了肃反中畏罪自杀的刘瑞祥家屬王淑兰向党进攻的控訴会；派人外出訪問收集反党材料；在牆报上發表了“赵仲池訪問記”，（赵过去是总会副总幹事，他認為赵調离总会是被以錢俊瑞同志为首的宗派排挤走的。）等許多攻击党的文章；将外調人員調回鳴放，以助长反党声势。如张再回会狂妄叫嚣，要錢俊瑞同志下台，召开各种反党的座談会；如所謂“实力派”座談会，“楊李路綫”座談会等等，进一步增强反党气焰；他对翁恒生的反动文章“再論我們的問題所在”倍加贊揚，一再鼓动他在牆报上發表；排斥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整風办公室工作，而吸收一批一向对党不滿的人参加整風办公室工作。通过这些反党的組織措施，总会內部一时烏云蔽天，党内外右派分子更为猖狂。五月二十三日發生了由党内右派分子欧阳惠煽动和組織的鬧大民主事件。党团积极分子和維護党的利益的同志遭受到无情打击。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总会的领导权实际上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在总会实际上复辟了。在这个期間廖經天实际上扮演了可恥的納吉角色。

本人在斗争中的态度：廖經天的問題，早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便已提出來要他檢討，但在將近十个月的斗争过程中，他的态度一直極不老实，不願真誠交代自己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总会整風領導小組宣布經中宣部批准的決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他毫无沉痛表現，反而輕松愉快。

处理意見：廖經天反党情节極為严重，在这次斗争中态度極不老实，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降級（从十級降为十五級）。下放参加劳动。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共鐵路工會全國委員會 辦公室支部委員會關於开除右派分子 王學增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王學增，男，三十九歲，工人成份，一九四六年入黨，歷任齊鐵機車段長、鐵路工會錦州區委員會副主席、東北地區委員會副主席。原任鐵路工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已於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二屆第五次全體委員會上決議撤銷其副主席及委員的職務。

王學增的主要右派言行是：

1. 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污蔑我國建設事業。污蔑我國建設鐵路用“人海戰術”，“趕節日通車造成工傷死亡多”。污蔑對修路工人是用“半軍事化管制，吃飯還得喊口號”，是以“打、罵、捆、綁、扣政治帽子等手段整服工人”，並說：這和資本主義壓迫工人的手段，警察、棍棒和失業一樣。他還將我們社會主義的企業管理比作秦始皇的統制，他說：“過去孟姜女哭長城，現在鐵路工人家屬哭鐵路。”

2. 反對黨對工會的領導，攻擊黨的工運方針。他說：“黨對工會管的多了”，“黨的基層組織水平低，不能發揮工會的組織作用，這是黨的組織建設問題沒有解決的緣故”。污蔑黨不能領導工會，說“黨對工會的干涉，限制了工會發揮作用”，“工會地位擺的不當，與行政說不上話”，提出“工會監督要有法律保障”，與此他又說：“一九五一年全總黨組擴大會議決議有問題，特別是在鐵路系統中貫徹這個決議——反經濟主義、反工團主義，不應該，搞糟了，副作用很大，一直沒有緩過氣來。來自

竟內的压力很大。”他还在河南第二工程区工会幹部大会上說：

“关心生活是工会刻不容緩的責任”，“生活改善是刺激生产的动力”，到处号召工会幹部“要学习况鍾的精神，不要怕丢烏紗帽”，“不要怕天下大乱”，並說“我同意讓工人鬧事，好教育教育官僚主义者”。

3. 煽風点火，否定鉄路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工作成績。他在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在北戴河煽动工作组幹部，捏造、污蔑党组說：“全委几年来的主要文件都不能說明問題，都不能反映鉄路的情况。”污蔑党组“不关心工人生活”，把党组貫徹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组扩大會議決議，污蔑为“靠教条主义吃飯”，他說：“全国委员会是靠鉄道部吃飯，靠全总吃飯。”他身为党组成員，却有意在幹部中大肆污蔑王志杰同志，以树立个人“威信”，挑拨党组与幹部的关系。

4. 攻击党的幹部政策，污蔑工会組織部門。他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是“論資格、排輩数，是家理教”，罵老幹部是“老油条”，“老也不值錢”，“专憑資格領導”。將党对他的培养和信任說成是党利用他“当牌位、当傀儡”，是“撑門面，有职无权”。將幹部写实工作制度，污蔑为“特务政策”，是“从貝利亚那里学来的”。污蔑組織部門“凌駕在主席团之上”。

5. 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在鳴放会上污蔑黨員幹部是“拦路虎”时，他附和和支持說：“要反拦路虎，得先反飼养員（指党组）”。他听了鉄道部党外人士坐談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發言后，說“真受感动，又上了一課”。他还进一步煽动說：“全委机关問題可大了，不得了！”当我们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开始后，他發現右派分子的言論中，許多都是他供給的子弹，他就为右派分子冷超等打掩护。

王学增是一个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並有修正主义理論，长期拒絕改造，隱藏在党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造成的恶果是極严重的，他是一个隱藏

在党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中共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支部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召开了支部全体黨員大会，充分討論了右派分子王学增的反党事实，一致決議，开除右派分子王学增的党籍。

中共教育部临时党组、教育部 机关委员会关于展开反对柳湜反党 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斗争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柳湜，原名柳克立，男，五十五岁，湖南长沙人。家庭出身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八年入党，同年在安徽蕪湖被国民党公安局逮捕，一九三三年释放出獄。历任上海申报流通圖書館讀書指导員，讀書生活編輯，上海生活星期刊編輯，汉口全民周刊主編，重庆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周刊主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冀中行署教育厅长，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視导司长，师范教育司长，“人民教育”总編輯，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反对党的肃反运动、反右斗争及其它政治运动。

柳湜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的立場，对党的肃反运动非常抵触和反对。在肃反运动期間，他不積極参加斗争，后来却到各地对肃反进行恶意的攻击，打击群众和干部的積極性，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平反”，甚至庇护他們。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到华东視察时，向华东师范大学民主党派人士講話，說“三反、

肃反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搞錯了，積極不起来。反革命分子只要努力，一样可以当英雄模范”。同年六月他在华南师范学院視察时，更猖狂地进行了反对肃反运动的罪恶活动。他“批評”該院党委搞肃反是“不务正业”，“批評”該院肃反面过宽，善后工作不好，执行知識分子政策粗暴。他很关心反革命分子廖懋揚的自杀事件，向廖的弟弟說，此事已交由广东省委負責处理，意在为廖伸冤。柳湜的这种行动，大大損害了学校党組織的威信，助长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到去年大鳴大放时，該院右派分子竟借廖懋揚事件，要求法办領導該院肃反工作的党委正、副書記徐震远和楊友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柳到广西师范学院視察，在該院召开黨員大会时，柳指示要吸收所有系主任和民主党派負責人参加大会。他当着肃反对象“批評”了学校的肃反工作有錯誤，善后工作不徹底，並要学校在原斗争場合向有历史政治問題的賀祥麟（現为右派）肖厚德（現为坏分子）等道歉，进行“平反”。柳湜还庇护反革命分子。例如：反革命分子黃德安刚从監獄出来不久，他即以个人名义介紹黃到教师报社工作，並为黃吹嘘。北京师范大学的反革命分子謝斯，一九五〇年入校时被發現有严重的特务嫌疑，一九五三年校方拟令謝休学，謝向柳申訴后，柳責成校方仍給予助学金，不使休学。

在反右派斗争中，柳湜的反党言行也很突出。他採取两面态度，抗拒党的反右派斗争，坚决同党对立。他一面借口有病，迴避参加整風和反右派斗争；一面散布不利于反右派斗争的言論，为右派分子鳴不平，並且支持包庇右派分子。中央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两个指示中，已經明确指出，在大鳴大放中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緒的人企圖将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錯誤方向去，应准备回击右派。而柳看了这两个指示以后，还一再把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况說成是“正常的現象”。同年六月七日他还在原高等师范教育司全体幹部会上說：“章乃器仍属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柳湜还为

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辯护。他說林汉达不应划为右派；說有些被划成右派的青年人向中央写信提意見，縱然意見是錯誤的，也不应划为右派。更严重的是他在反右斗争中支持原高等师范教育司領導小組的右傾思想，对右派分子张月加以保护。高师司在反右斗争中表現了严重的右傾，部領導小組曾給予批評。柳却为高师司領導小組辯护，支持和助长了他們的右傾。高师司右派分子张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很完整，在大鳴大放时对党的人事制度进行攻击。柳浞身为部領導小組成員，却採取两面态度，一面对部領導小組的其他个别成員表示应划张月为右派，一面又在背后支持高师司領導小組，一再要他們坚持不划张月为右派的意見，实际上是在破坏反右派斗争，对张月加以保护。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刘耀如、何錫麟同志向柳浞談到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成績和“师大教学”（校刊）上有关駁斥右派分子的文章时，柳却說：“这些文章，右派分子还不会心服吧！”这也反映了柳浞对反右派斗争抗拒和不服气的心情。

柳浞对其它政治运动，也抱有不同程度的消極、反对态度。他反对对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只強調知識分子的好处和作用，強調对知識分子团结和照顧，正如他自己所承認的：他是跟资产阶級知識分子“站在同一立場，跟他們有共同的情感，当他們受到打击，就好像痛在自己心上一樣”。他反对用运动的方法改造思想，認為这会伤害知識分子的自尊心，引起他們的反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反对沈阳高等学校在教师中举行思想展覽，告訴“教师报”、“人民教育”不要宣传。他一再強調說，从今以后不搞运动了，反对把社会斗争、农村斗争、工厂斗争的领导方法搬到学校来。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号召批判唯心主义，原教育部党组决定批判杜威思想，指定柳浞負責，而柳浞則消极应付，他認為“杜威思想有可取之处”。对北京师范大学朱泽兰、陈友松（現在都是右派分子）在批判杜威的座談会上宣揚杜威的

言論，絲毫未加批駁。

(二)在教育工作上，主張由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專家領導，反對黨的領導。反對走社會主義教育的道路，主張走資本主義教育的道路。

一九五六年，當國際上出現反共高潮和修正主義思潮時，柳在各地通過座談、報告、寫文章，發表了一系列的反對黨領導教育工作的反動言論。他反對學校實行黨委制。他把學校黨組織看成為一般的社会团体，主張把黨組織放在院校長監督之下。主張黨委工作主要是保證教學，不是另搞一套。那麼，靠誰來領導學校呢？他先後在原教育部召開的高等師範教育會議上，在視察華南、江西等師範學院時，在與民主人士談話中，一再主張靠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專家來領導。說“高師大多數教授是民主人士，這是高師的命根子”，“民主黨派應該監督學校內的黨”，並說“學院辦不好，民主黨派要負責任，這是任務”。他在章伯鈞主持的部分高師盟員院校長座談會上說，“高等師範院校的命脈就掌握在你們的手里”。他又說，“學校工作有陰暗面，主要是領導思想沒有明確依靠着老教授辦學”。在學校已經建立了黨的領導的地方，柳湜則惡毒地攻擊學校的黨組織，把學校產生矛盾的根源和學校工作中的缺點，都歸罪於學校黨的領導，歸根於黨委不慣辦教育和黨委負責人對黨外人士粗暴、不民主。他多次強調學校教育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不是兩條道路的鬥爭，而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又說，學校內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是“生產關係妨礙了生產力”。即黨的領導（“生產關係”）妨礙了教授能力（“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惡毒的攻擊，目的在於要把已經建立了的黨的領導取消。

柳湜反對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不僅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到各地不斷進行了拔紅旗、插白旗的勾當。華南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工作有缺點，省委曾決定於適當時機調動他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柳到華南師院視察時，偏聽老教授的意見，激動地、夸大地

向广东省委反映該院党委書記坏透了，副書記作風也不好，主張馬上撤党委書記的職，並調動副書記的工作，說什麼“否則大家都不願幹了，學校就无法再办下去了”。那次視察結束時，他在該院全体大会上作了總結講話。講話中對學校黨組織作了惡毒的攻擊，嚴重地打擊了學校黨組織的威信，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一切不滿黨的人撐了腰。致使黨的工作同志和一些積極分子都抬不起頭來，而反動分子的氣焰，則囂張到了極點。當以後省委派人到該院宣布院党委書記撤職、副書記調動工作時，黃明慧（現為右派）竟高舉拳頭大喊“今天是華南師院的校慶”，“是學校第二次解放”，並要求把當天定為校慶日。後來該院黃明慧、廖華揚（現皆為右派）到北京參觀時，柳湜竟對他們說：“如不把你院兩塊大石頭搬掉，華南師範學院是办不好的”。在福建，柳湜听信福建師範學院余宝笙（現為右派分子）等反映，先向院領導提出將該院党委副書記張立同志撤職的意見，後來又向省委建議將張調離學校。柳湜听信了鍾敬文、傅種孫（現皆為右派）等人的反映，將北京師範大學黨員教務長丁浩川同志調走了；還多次揚言，要將該校黨員副校長兼党委書記何錫麟同志撤職。他極力主張提拔黨外人士甚至右派分子作院校的領導人。

（三）抗拒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批評，藐視地方黨委，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由於柳湜堅持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的立場，所以他對黨的領導，對黨的方針政策，處處表現抵觸和反對。主席提出了“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几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方針后，他說這個方針不是什麼新的東西。他抗拒中央對教育部的批評。一九五七年春，董純才同志在原教育部黨員大會上講話，傳達中央精簡節約指示和中央對原教育部的批評，会后，柳湜對中央的批評置若罔聞，還在支部大會上攻擊說：“如果我不是黨員就听不下去”，並責問董是以什麼身份在黨員大會上講話的。

他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为了迁就照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抵制党的勤俭办学的方针，反对把师范院校内迁和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无话不谈，甚至对华南师范学院老教授公开谈论该院党委书记的档案材料。正因为如此，柳湜得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赏识和称道。曾昭掄說：

“教育部只有柳湜这个人好些”。华南师范学院一个右派教授陈子明說：“柳副部长对我们很亲切，甚至一些内部的话也和我們說了。柳这些话，在许多党内负责同志都不易听到的。”又該院講師卢天裕說：“这些年来，我仅听过一个好报告，就是柳湜副部长的报告，大快人心，听之忘倦”。

他藐视地方党委，反对把学校置于地方党委直接领导之下。他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认为地方党委领导不了高等院校。他捏造說：“江西师院学生闹事，省委与学校党委一筹莫展，風潮一直闹了几个月不能平息，我向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才把学生說服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他到处批評学校的房子、设备不好，随便许愿；並慫恿教师到省委去爭吵，造成地方党政工作上許多困难。他不通过地方党委，就直接解决学校的問題，造成学校和教师对地方党、政的不满和不尊重。

柳湜对教育部党组长期鬧分裂活动。在董純才同志来部前，他召集三次会议，在部分司长干部中散布对董不利的話，並要黃嘯曾向習仲勋同志反映，以拒絕董来部。董来原教育部任党组書記后，柳即工作消极，先后利用前办公厅主任黃嘯曾、原高师司司长李实、原中学司司长侯俊岩等的对党不满和其他弱点，形成宗派，反对党组和董純才同志的领导。柳又利用部内群众对董不满的情緒，通过支部会议等合法形式煽动群众反对董純才同志，甚至說：“不要怕，鬧不出匈牙利事件来”。党组副書記陈曾固同志初来教育部时，柳就背后散布陈不懂业务，是外行。以后又造謠說陈对董不支持，說董受到中央批評，可能是陈向中央反映了董的問題，

柳湜自己檢討說，他在全國解放以後對自己的工作地位是不滿意的，對於解放初期未當上副部長，未當上人大代表，後來他的位置又被放在董純才同志之下，他都不滿意。所以，柳在原教育部的反黨分裂活動不僅反映了他個人主義野心，也反映了他對中央的不滿。

根據這次揭發的全部材料看，柳湜的反黨罪行不是偶然的。他原來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的思想浸透了資產階級的世觀和人生觀。他具有牢固的資產階級立場和觀點，具有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入黨以後，長期沒有得到改造，所以，他長期同黨有矛盾。民主革命一關，他就沒有过好。他在延安任邊區政府教育廳長時，以民主人士身份（柳當時是秘密黨員），向黨爭教育上的財權、人權獨立，未成，就掛冠而去；他審查課本，把“邊區好”、“八路軍好”、“孔二小姐”（揭露四大家族揮霍民脂民膏的糜爛生活）等課文刪掉，說是有礙統戰工作；他叫人把美軍新聞處的材料散發各县；听信米脂某小學校長（土紳）的意見，堅決主張將該校黨員教導主任撤職；等等。但是當時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同黨的矛盾還不突出。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由於他還堅持資產階級立場，他同黨的矛盾就發展到顯明的對立。他對黨的方針政策處處抵觸，對新社會的新事物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在國際上出現了反共高潮和修正主義思潮，在國內他又從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觀點曲解了黨所提出的百家爭鳴、長期共存、團結知識分子和向科學進軍等方針政策，他覺得形勢對他有利，就積極起來，代表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向黨反擊。首先是攻擊黨的肅反運動和對知識分子改造的政策。他到處去“視察”、講話，肆無忌憚地大放謬論。這是情況在一九五六年前後出現反黨的主要原因和背景。一九五七年，當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展開以後，革命的鋒芒指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時候，柳湜更感到切膚之痛，他同黨的對立就更加突

銳了。他一方面消極躲閃，不参加反右斗争，另一方面，却積極抵抗，为右派分子辯護，支持和庇護右派分子。这些，是柳湜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必然結果。柳湜長期保持着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把黨当作個人追逐名譽地位的工具。到延安時，他自以為在白區作文化工作有功，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竟以民主人士自居，對黨分庭抗禮。全國勝利以後，他的個人主義野心更加發展。他對於黨所分配他的工作地位不滿足，同民主黨派負責人比地位，同曾任過陝甘寧邊區政府廳長的其他同志比地位。當個人願望一再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他對黨的不滿就不斷增長。由於柳湜長期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和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同黨的關係長期矛盾，隨着革命的不斷深入而發展到同黨對立，最後就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可恥的道路。

柳湜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被揭發以後，他前後共檢討了四次。前三次檢討態度不老實，不肯主動交代問題。後來，經過群眾的嚴肅揭發和斗争，經過領導同志對他的不斷批評和幫助，最後一次檢討，已經被迫低頭認罪，承認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檢查，有了一定的認識，並表示願意悔改。

我們認為，柳湜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資產階級右派知識分子在黨內的代理人。他的問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性質，他是一個黨內的右派分子。按柳湜問題的性質和他的檢討態度，我們認為，應該開除其黨籍，撤銷其行政職務，降級，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批示：同意開除柳湜的黨籍，撤銷原有職務，降級，另行分配工作。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尙明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

尙明，男，四十二岁，河南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高中程度，一九三八年入党，現任中国人民銀行总行办公厅主任。

历史上主要問題：在中学时期参加反动組織复兴社（一九四四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根据本人交代作过結論）。一九五六年为包庇国外局前局长詹武錯誤，受到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后因崔光等包庇詹武翻案，处分未能执行。

一、主要反动言行

1. 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反对思想改造。尙明在受处分后，对党級为不滿。發現崔光企图包庇詹武等翻案，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进行翻案活动。一九五七年一月份，利用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总结的时机，在党内会议上大肆誣蔑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是“蛮不讲理，仗势欺人”。說：“运动是靠优势和声势解决问题”；运动一来就“不能解释”，“不允许解释”。他說在国外局案件中对他的批評和处分是“落井下石”。他攻击領导上領导运动都是为着应付上級，任务观点，只顧当时交差，不管遗留問題。他認為历次运动作用很大“被批評的人抬不起头来”，“看的人也感到不知那天算到自己头上”。大鳴大放时右派分子朱紹文誣蔑政治运动，大罵共产党，他竟說：“我們过去斗争人家时，比人家现在罵的厉害的多。”

2. 利用各种場合运用各种手法，散布右派言論，向党进攻。

总行召开代表大会时他利用起草“统战总结报告”和“总结发言”的机会，系统的散布了大量右派言论。他诬蔑历次政治运动滋长了党内的宗派主义，严重的阻碍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并故意诬蔑说：“为什么对政治历史上没有怀疑的人政治上还不信任？为什么相同的国家干部，党与非党却有不同的权力和权利？……答案只有一个，宗派主义。”

在党代表小组长联席会上，他还将从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收集来的大量右派言论，借向党员“透气”为名，向党员大肆传播，攻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是：“过去社会地位越高，社会关系越复杂的知识分子，被斗争越厉害”，他们的心情是：“欲哭不哀，虽笑不乐”，他们本来是“资产”，将他们当“负债”。将知识分子当“弼马温”，免不了要大闹天宫。诬蔑党群关系是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三反后不如三反前，肃反后不如肃反前，他还在办公厅支部大会上动员鸣放时，宣传这种反动言论，并说：“你不让人家说，人家就会到街上去说，就会造成匈牙利事件。”他威胁党员干部说：“如果谁听了这些群众的话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请他吃点安眠药。”

3. 极力包庇右派，打击陷害积极分子。他是总行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分工领导国外局整风运动。在反右斗争中，他为了坚持翻案抗拒上级党委，在他和崔光、乔培新、尹志海等反党分子的庇护下，国外局漏掉了成批右派分子。但是，对反对包庇詹武翻案的积极分子苏世铭，则利用右派分子对苏进攻的机会（苏离婚后与一女党员顾肇墀恋爱，婚前怀孕），进行打击陷害。他和国外局被反党分子所把持的领导小组共谋，在斗争苏世铭的群众大会上，公然摘掉右派分子胡元民的右派帽子，来发动右派向苏世铭进攻。为了打击苏、顾，制造罪名，国外局反党分子尹志海等还强迫苏与前妻叶秀梅复婚，复婚后因感情无法恢复，又去西四法院申请离婚。在西四法院正在审理的过程中，尹志海等又怂恿叶秀梅向东单法院诬告苏、顾破坏婚姻法，妨害家庭。当西四法

院已經弄清过去强迫苏与叶复婚不对，准备判处离婚，来行征求組織意見时，尙明和尹志海、王彬等共同策划，要西四法院从緩判离，候东单法院对苏、顧判刑后再处理苏、叶离婚問題，以免在斗争苏、顧过程中陷于被动。苏世銘被陷害开除党籍、东单法院判处拘役緩期执行后，尙明还說：“苏如悔改不好，党票下了，再下他的飯票。”

二、斗争中的态度

經過群众的斗争批判，尙能認識其罪恶，願意悔改。

三、結論和处分决定

根据以上情节，尙明应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上並按第五类处理，降职、降級、降薪。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詹武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

詹武，男，三十九岁，浙江溫岑县人，家庭出身小地主，本人成分学生，高中肄业，一九三八年入党。前中国人民銀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兼中国銀行副總經理，一九五六年免去局长职务。

(一) 历史上主要問題

(1) 詹武在任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期间，因严重右傾，重用有政治嫌疑的旧人員，一味庇护，不讓进行审查和改造，結成宗派集团，抗拒上級检查，对批評者施行打击报复，反党反领导，給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后因詹武进行的翻案活动，得到崔光等人的支持，处分未能执行。

(2) 曾利用职权，介绍其姊夫刘羽阶（恶霸地主，镇压中被镇压）参加工作，以后又为他的儿子刘秉彝伪造历史，冒充中国银行干部，介绍到北大学习，在整风运动中刘秉彝被揭发为政治骗子，极右分子。

(二) 主要反动言行

(1) 坚持错误，拒绝改造，进行反党活动。詹武受处分后，对党极为不满，玩弄两面手法，反抗党的决定。当党代表会议处理他的错误时，他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会议结束不久，他就到处活动，散布流言蜚语，积极进行翻案和反党活动。他造谣说，中央要为他平反。又鼓动其反党集团分子坚持错误，和他一起翻案。还造谣说：“某人一九四二年整风时，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也不瞎说，现在还不是负责干部！”要他们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

(2) 在大鸣大放期间，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整风开始后，右派分子大肆向党发动进攻，詹武、夏鸣（詹的爱人，也是反党集团为首分子。）进行翻案的阴谋活动中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也成为他们向党进攻的借口。右派分子出了不少攻击党的大字报，还贴出“联合宣言”，叫嚣要为詹武等平反，拥护詹武等上台。他们说：“詹武、夏鸣是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受害者”；说：“肃反运动偏差是主要的。”等，要党限期答复，否则上街闹事。这时詹武等也利用右派进攻的时机，推波助澜，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煽动群众向党进攻，詹武还在总支大会上带头攻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及其检查组，诬蔑检查组是“逼供信”，是“捏造材料，欺骗中央”。接着党内右派分子也一拥而上，替詹武叫“冤”，攻击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肃反运动，气焰十分嚣张。

(三) 斗争中的态度：一九五七年反右后，仍不向党低头认罪，直到现在，他仍坚持错误，态度很坏。

(四) 结论和处分决定：根据以上情节，詹武应划为右派分

子，开除党籍，行政上按第二类处理，撤消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夏鳴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

夏鳴，女，三十九岁，沈阳人，家庭出身房屋出租者，本人成分学生，高中肄业，一九三八年入党，前中国人民銀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付局长，一九五六年停职，分配在計劃司工作。

历史上主要問題：夏鳴在任国外业务管理局付局长期間，和詹武(夏的爱人)一起，犯了严重右傾、重用有政治嫌疑的旧人員、一味庇护、不讓进行审查和改造、結成宗派集团，抗拒上級检查，对批評者施行打击报复，反党反领导的錯誤，給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后因詹武、夏鳴进行的翻案活动得到崔光等人的支持，处分未能执行。

(一) 主要反动言行

(1)和詹武勾結一起，坚持錯誤，拒絕改造，进行反党活动。夏鳴受处分后，对党極为不滿，和詹武一起，到处散布流言蜚語，籠絡詹武反党集团分子，積極进行翻案和反党活动。她誣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检查组“主觀片面”，“处理案件不符合八大精神”。並阻止反党集团分子向党承認錯誤，說：“反党是政治問題，不能随便加的”，“过去承認錯誤了，今后可別再这样了，不然以后会被动的”。

(2)大鳴大放期間，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整風开始以后，右派分子大肆向党發動进攻，詹武、夏鳴进行翻案的阴谋活动中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也成为他們向党进攻的借口。右派分

子出了不少攻击党的大字报，为詹武等叫“冤”（其中有些是用鸣字的化名写的），說“詹武、夏鸣是共产党内宗派主义的受害者”。诬蔑检查詹案的积极分子是宗派集团。夏鸣就兴高彩烈地跑回国外业务管理局去看大字报，当右派分子徐静波問她：“夏局长怎么不鸣放啊？”夏鸣就当众指着大字报說：“这些鸣字的大字报不都等于是我鸣的吗？”夏鸣还幸灾乐祸地說：“看看国外局鬧成什么样子，誰是誰非，现在还看不明白嗎？”夏鸣还夸大捏造国外业务管理局新领导的缺点，煽动党员鸣放。

（二）斗争中的态度：一九五七年反右后，仍不向党低头認罪，直到現在，她仍坚持錯誤，态度很坏。

（三）結論和处分决定：根据以上情节，夏鸣应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上按第二类处理，撤銷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中共广播事业局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温济澤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

温济澤（曾用名温諒文、温济直），男，現年四十四岁，江苏省淮阴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轉为共产党员。現任广播事业局党组幹事、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編委会委員、副总編輯。

温济澤是一个资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入党后长期抗拒改造，胜利后更严重蜕化，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立場和品質。在他分工負責对外广播工作时期，他和邹晓青、张紀明結成反党小

集团，带头反对党的领导，以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篡改了党在对外广播中的政治方向，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和文艺观点；在外交工作中，目无组织不守纪律，而且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表现了投降主义和奴才相；在组织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非组织的手段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将对外广播部门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在整风反右期间，温济泽又阻挠和抗拒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温济泽已堕落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成为一个右派分子。

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

（一）在宣传方面

在对外广播宣传中，以温济泽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篡改了党的政治方向，以修正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代替了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的立场代替了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他反对宣传党的领导，在许多对外广播稿件上删去了“党的领导”的字句。他不准选送歌颂领袖的歌曲出国，甚至“桂花开幸福来”等民歌也在被禁之列。在宣传上经常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和规定。例如对台湾的宣传，他不许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卖国残民的罪行，而签发赞扬蒋氏父子“有民族气节”的稿件。在少奇同志指示可以作适当的揭露以后，他竟然继续反对揭露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罪行。去年鸣放期间，中央规定对外不报道右派言论，温在口头上也说报道，但实际上并未执行，以致对外广播大量地报道了右派分子言论，而事后温济泽却向中央联络部写假报告，说对外广播这一期间的报道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认为对外广播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并因而取消了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温一再说：“对外广播没有指导性”，在毛主席已经指出东风压倒西风之后，他还是说：“世界革命是遥远的下一世纪的事情”，“对外广播根本不存在灭资兴无的任务”。他认为外国

資產階級害怕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宣傳我國在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宣傳，同樣也採取消極的態度。他以對外主要是宣傳工業化為借口，不宣傳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黨中央提出十五年趕上英國這一個與工業化密切關聯的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口號以後，溫又以不知道“如何向國外宣傳”為借口，拒不布置宣傳。對於宣傳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和團結，溫也採取消極態度，在毛主席指出“東風壓倒西風”以後，溫長時間沒有布置宣傳。在送給波蘭和南斯拉夫的賀詞中，溫濟澤刪掉了“以蘇聯為首”五個字，並且把“陣營”改為“大家庭”。溫主張對外廣播不播蘇波會談等有關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重要消息，甚至蘇聯成功地發射洲際導彈的消息也沒有廣播。溫濟澤拋棄了無產階級的根本立場，為討好國際資產階級大談其所謂“全面、客觀、公正”，並且不同意宣傳帝國主義的矛盾和危機，他根據對內部國際生活組播出稿件的統計，認為“談蘇聯多了”，有“片面性”，“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科學成就就提一點道，僅是介紹他們的矛盾、危機”，認為也是“片面性”。他在一篇稿件上刪掉了“台灣人民反美情緒越來越高漲”等字句，並且不准在稿件里提“立即”制止美軍強姦台灣婦女的罪行，說用“立即”“迅速”的字眼就是一種“速勝論”。兩年來，在所謂“和平共處”、“不干涉內政”的借口下，溫反對對外廣播進行有關各國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運動的宣傳。他提倡資產階級的新聞觀點和文藝觀點，強調對外廣播要適應資產階級的“興趣”和“需要”。一九五七年初，他在對外廣播部門大力推廣以輕鬆、荒誕、談情說愛、厚古薄今和言不及義的東西爭取聽眾的日語組的“先進經驗”。在他的這種思想指導下，英語廣播規定了每天要播一條奇聞和有“人情味”的消息，以至大烏龜的消息成了重要新聞。對外部國內生活組在兩年內一共發了五百八十八篇這一類的稿件（如胡同里的叫賣聲、活捉三郎、兔子的尾巴為什麼是短的等），佔全部發稿九百二十篇的百

分之六十三，其中充滿毒素的有一百六十三篇，佔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这些东西显然只能博取国际资产阶级的欢心，麻痹国外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意识，为帝国主义效劳。

（二）在組織方面

温济澤和邹晓青、张紀明結成反党小集团，带头反党，严重地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抗拒党组、編委会的领导，制造分裂，破坏党的統一和团结。为了抗拒和分裂党组、編委会的领导，把对外广播部門变成他們的独立王国，温济澤公然否認中央台統一领导的存在，說：“中宣部尚且不能领导对内对外的宣传，中央台編委会还能統一领导对内对外广播？”並且制造了一套理論——“对外特殊論”“具体领导論”“大同大異論”“四大不同論”，作为欺騙和拉攏群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綱領。温济澤在对外广播部門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和宗派主义的幹部政策，封官許願，提拔重用亲信，排斥打击不同意他的做法的幹部，並私自定所謂对外局副局长和其他負責人的入选。温对录用人員敌我不分，主张“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都可以用”。去年十月，全局討論机构問題，温济澤及其小集团利用这个时机，大肆进行非組織的活动，煽动群众，散布流言蜚語，制造宗派主义情緒，竭力把对外广播部門結成一个宗派集团，公开抵制党组提出的加强統一领导的机构方案，並以上述那一套荒謬的理論，坚持对外广播和对內广播分家。温济澤还說有关对外部門的問題，党组、編委会无权作出决定。温济澤还貼出大字报抬高自己，大肆抵毀攻击編委会和总編輯的领导，破坏編委会和总編輯的威信，企圖拉攏群众和他一道来搞垮編委会，使他們的独立王国进一步合法化。利令智昏，温济澤的反党活动極其猖狂，而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原形因而也徹底暴露。

（三）在外事工作方面：（略）

（四）对整風和反右斗争的态度

以温济澤为首的小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阻挠和抗拒整

風运动和反右斗争。整風期間，溫濟澤強調“业务太忙，整風和反右不能抓得太紧”。他身为党組成員和对外部門的負責人，却把整風領導工作交給鄒曉青，自己不掛帥。在整風运动期間，从不發動群众，但在專題鳴放階段却乘機煽動群众，借以為自己的反党活動助威。為了逃避思想斗争，整風每一階段，他都主張草率收兵。他對群众提出的意見採取了極端官僚主義的不負責任的態度，寫了几條千篇一律的答案，叫秘書填寫答復。對於貼大字報批評他的幹部，則粗暴地予以打擊。他認為“國內經過几次大运动，反革命基本肅清了，階級斗争趋于緩和了”，因此私自決定調進相当數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問題的人。在反右斗争中，溫提出种种借口，力圖縮小斗争面，甚至同情和包庇錢敏齊、陳潤康等右派分子，並且為其弟弟右派分子溫濟中到处叫冤說情。

此外，在个人生活方面，溫濟澤也充分表現了腐朽惡劣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他以“老革命”“理論家”“科學家”自居，自我吹噓，喜人奉承，好出風頭，愛講排場，用答应介紹入党、拿双薪、出国、提級等办法來拉攏幹部。在一年零四个月中，溫以出国名义，用公款买了四双皮鞋、六套西装、两件大衣，而且不按制度办事，有一件大衣就价值五百多元。他對女同志的行為極其輕薄，虐待年迈的老母。這些也說明了溫已喪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質。

二、对錯誤罪行的态度及处理意見

溫濟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严重，行為惡劣，給了党的广播事業以严重的損害。在斗争开始后相当長時間內，他仍然不肯低头認罪；在斗争逐步深入之后，在无数鉄的事实面前，他被迫承認了反党的罪行，並作了初步的交代。斗争后期稍有悔改之意，但他的交代和檢討仍然是不徹底、不深刻的。

根据溫以上錯誤事实充分証明溫濟澤已墮落为党内右派分

子。为純潔党的內部和严肃党的紀律，經討論研究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規定，給予开除党籍处分。並建議行政撤消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

中共通俗讀物出版社总支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蓝钰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

蓝钰，男，三十九岁，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現任通俗讀物出版社副总編輯。

蓝钰在整風鳴放期間，趁着党整風的机会，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其主要反党罪行是：

一、在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召开的座談会上，对党的出版事业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並提出了一个比較完整的資本主义出版工作綱領。他还向一些地方出版社的领导人进行游說、煽动，企圖迫使文化部接受他的反动主张，並利用別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他的反动观点。

二、包庇、鼓励和支持“时事手册”的右派小集团向党进攻。

三、宣揚修正主义的觀點，提倡極端民主，毫无批判地在社内介紹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謬論，提倡沒有政治界綫的“独立思考”。

以上主要反党罪行表明，蓝钰是一个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队伍，經总支全体党員大会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撤职、降級。

人民鐵道報社整風領導小組 對右派分子范四夫的处理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范四夫，男，三十六岁，一九四〇年入党。安徽繁昌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人民鐵道報社副总編輯。極右分子。

主要反动言行：

1、在五月十六日首都新聞工作者座談会上，發表了一篇系統的反党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聞綱領。反对党的机关报，說：

“既然是机关报，便成为这个机关的下屬部門；就要代表官方說話，不便發表与本机关指示、决定相违背的問題”。“報紙也就不能成为群众的輿論机关”。他極力支持新聞界右派分子徐錫成所提出的“列宁的办报原則已經过时了”的謬論。狂妄地說：

“我很同意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報紙的作用和基本任务，有大可研究的必要”。他公开提出主張，要修改党中央有关党領導報紙的一些規定。他还大喊我国新聞工作者社会地位不高，新聞採訪不自由等荒謬論調。

2、亲手制訂了两个反党的所謂“整風报道計劃”。把当时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列在他的計劃內；並到处煽动“要給鐵道部領導上施加压力”；鼓吹“打破过去同級報紙不能批評同級党委的常規”。当領導上几次指出整風报道有錯誤时，又採取公开抗拒的态度。

3、他利用副总編輯的职位，糾合報社另一些右派分子，形成反党小集团，他大唱“報館不鬧禍不是好報館，記者不討厭不

是好記者”。報紙批評“要在太歲頭上動土”，“要聾人聽聞”。他以肯定、支持的態度在報紙上大量登載右派言論；並拒不登載人民日報有關反右派的社論。因而在去年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這一期間，篡改了人民鐵道報的政治方向。

鬥爭中的態度：曾進行避重就輕的檢討，經再批判揭穿後，索性全部推翻，否認他的罪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至今仍不肯低頭認罪。

處理意見：建議開除黨籍，撤銷人民鐵道報社副總編輯職務，監督勞動，酌情給予生活補助。

中央批示：開除范四夫黨籍，撤銷人民鐵道報副總編輯職務，監督勞動。

人民鐵道報社整風領導小組 對右派分子劉萍的處理決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劉萍，男，三十八歲，出身富裕中農，成分學生，1937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共產黨。人民鐵道報社副總編輯。

在報社副總編輯范四夫糾合報社其他一些右派分子，有綱領、有計劃、有行動的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並一度篡改了黨報政治方向的整個過程中，他的主要反動言行是：

一、他親自帶林立去北京局放火，在未去該局前，即惡意散布對該局黨委書記劉國梁、局長王效斌等同志的流言蜚語。說：“王效斌很鬼，會拍領導上的馬屁”，說該局組織部長是劉國梁的“狗腿子”。揚言要對上述同志“整一下”。到該局後，一方面極力煽動北京局幹部攻擊鐵道部領導；另一方面又煽動北京

局处以下幹部攻击該局的領導幹部，他为了达到煽風点火的目
的，不惜採取了造謠、欺騙、“激將”等許多卑鄙手法。如他对
京局的幹部說：“鐵道部整風，放的太慢，我們想从下面‘轟’
一下”，“批評部長的稿子也要登報”。還說：中宣部已有指
示，報紙可以批評同級黨委了，並造謠說中央有文字東西。還煽
動說：有沒有顧慮？怕不怕？看你們不太敢放！又說：不要有顧
慮。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登報可以不登你們的名字。

劉萍为了攻击北京局的領導幹部，到处蒐集他們在生活作
風上的問題。从領導幹部住房、救濟，甚至睡不睡午覺，是否按
時上下班，都蒐集遍了。他還要鐵路醫院把北京局劉國梁等主要
幹部的醫藥費都計算出來。

劉萍搜集材料回報社后，除了親手寫了一篇所謂給鐵道部施
加壓力的稿子外，還将他蒐集到的所謂十三項特殊問題，口述給
編輯部副主任右派分子張如和。要張寫諷刺雜文，攻击北京局的
領導。

二、積極支持和執行反黨集團的反黨計劃，他批准召開了鐵
路女工團部分團員座談會（實際上是放火會），会后並由編輯部
整理成一篇抹殺成績誇大缺點，污蔑黨的領導的文章，在報上發
表了，劉還督促群眾工作部繼續召開同類性質的教師、醫生等座
談會。

三、經劉萍審查出版的四期報紙上，審發了許多惡意攻击黨
的報導和文章。如“設計總局對我們到底抱什麼態度？一工業設
計院的青年技術員請領導上回答”、“錦州局黨員幹部宗派主義
嚴重”、“第一設計院黨員幹部脫離群眾”等報導，多是誇大事
實，完全脫離黨報立場、帶有很大煽動性的。經劉審發的還有：
“談放火”、“解決問題的幹部”、“打破陋規”等帶有很大毒
藥的文章，並對右派分子張如和寫的大肆煽風点火的“談放火”
信加贊揚，說：“這篇東西寫得不錯，廣証博引”。

運動中的表現：完全否認他的一切反黨罪行，態度惡劣。

处理意見：建議开除党籍，撤消人民铁道副总編輯职务，留用察看，待遇由十一級降为十六級。

当否，請批示。

中央批示：开除刘澤党籍，行政上撤消原有职务，留用察看，由十一級降为十五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整風领导小组 对右派分子袁毓明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

袁毓明，男，四十二岁，河北省邢台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入党，历任太行新华日报校对科长，人民日报办公室主任，第一兵团新华分社社长，川北日报副社长，重庆新华日报总編輯等职。現任大公报总編輯。

主要右派言行：

(一) 誣蔑整風运动，說：“整風是一場混战，你在背后打我，我在背后打他，他又在背后打你，”“一九四二年整風运动伤了很多，到現在还不能忘。”

(二) 鳴放期間，为了轉移目标，張貼匿名条子，攻击謾罵几个党团员为“两面派”，“母夜叉”，並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大字报上签名，写道“这样揭發党内黑暗好得很”。

(三) 在报社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同右派分子肖离，肖鳳，朱啓平，单越，吳永云，謝牧等人談話，說“我到报社感到孤苦伶仃，沒有三亲四故……中宣部也沒有什么熟人”，“我也是有苦說不出来，大家感到苦悶我也感到苦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对肖离等右派分子討好，向他們說“对吸收你們入党的事我一直关心，……这回我替

你們負上責，加把勁，趕快解決你們的問題”。此外並將一九五六年黨組對他蜕化墮落思想的批評說成是“宗派傾軋”等等。

(四) 為了討好肅反對象，他說：“文化部在肅反問題上，曾經兩次通報批評我右傾，現在看來你們還是正確的。”對肅反對象蘇濟生說：“你們幾個人的問題是我當時盡量壓住，才沒有公開鬥爭。”

鬥爭中態度：經過鬥爭，低頭認罪，表示願意悔改。

處理意見：開除黨籍，撤銷大公報總編輯職，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職務。

中共新華社對外部支部委員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陳適五黨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共對外部支部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開支部大會，出席正式黨員十二人，預備黨員四人，右派分子陳適五本人也出席。

陳適五由於參加了右派分子陳企霞的反黨活動，並發表了右派言論，已墮落成為右派分子。全體正式黨員一致擁護中央關於黨內右派分子必須開除出黨的決定，通過了將陳適五開除出黨。全體預備黨員也一致擁護這一決定。陳適五當時未舉手，但發言表示贊成這一決定。

附：右派分子陳適五的政治結論

右派分子陳適五的政治結論

陳適五，共產黨員，男，四十三歲，浙江鄞縣人。家庭出身

破产商人，本人成份职员。原任新华社驻柏林记者，拟调任本社副社长。右派分子。

陈于一九三一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二年六月被捕后失掉关系，一九三七年七月又被捕一次。一九四〇年五月赴延安参加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入党。

陈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被捕后，有过告密行为。他在捕房中承认自己写标语，供出一起写标语的周芳奎同志和他的住址，並同敌人去周的住处，致周也遭逮捕。此事陈长期隐瞒，直到这次斗争中，才向组织检讨交代。

一、主要的右派言行

陈适五从一九五六年春天以来，一直参与了丁陈集团首脑之一的陈企霞的反党活动，与陈企霞共同攻击党组织和党中央负责同志，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企图为右派分子陈企霞达到翻肃反中受审查、文艺报工作中受处分以及关于丁陈集团的批判和斗争的案。其主要罪行如下：

1、为陈企霞出主意，直接参与修改陈企霞的三个反党文件。在三个反党文件中，陈企霞攻击肃反政策，诬蔑作家协会“无反乱肃”；攻击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反对中央对文艺报所犯错误的决定；反对作家协会党组对丁陈集团的斗争。陈适五完全赞成陈企霞这些反党文件的内容，并且还认为这些文件有的地方还“不够尖锐”，要求陈企霞“强硬一些”。同时还直接动笔修改，要陈企霞在反党文件中强调自己在肃反中被审查“是冤案而不是错案”，强调作协党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陈适五还为陈企霞递送信件，并先后将党内关于丁陈集团的传达及对于右派分子斗争的某些原则及右派分子的情况告诉陈企霞。同时还为陈企霞向作协党组继续探听过作协对陈企霞问题的看法，然后转告给陈企霞。

3、发表右派言论。陈适五曾认为“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有矛盾”，认为“中国用群众运动来搞肃反也要发生问题”。

4、支持和同情右派分子。陈适五曾附和、同情和包庇新华社极右分子李慎之的右派言论，在斗争李慎之时不揭发。他曾传播新华社右派分子袁传芳诬蔑新华社“私设公堂”的谬论，支持文艺界右派分子李又然翻肃反的案，并鼓励新华社右派分子何飞向组织上要回何在肃反中写的材料烧毁。

二、斗争中的态度：长期对党隐瞒，不作交代。在斗争中没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最后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三、处理意见：开除党籍，行政上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极右分子翟宜地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翟宜地，男，维吾尔族，现年四十一岁，新疆吐鲁番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反动官僚，一九四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一年入党。历史上曾任过：小学校长、翻译、伪副县长等职。参加革命后任过县长、新疆分局干部学校副校长。现任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党总支委员。

翟宜地在一九五一年，隐瞒了他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担任警察局密探（系盛世才在新疆执行六大政策的时代）和一九四二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区分部书记的反动历史，混入党内。这些历史问题直到最近对他批判时，才在证据确凿之下被迫承认。

主要反动言行：

（一）民族分裂主义的主要表现。翟宜地的民族分裂主义是极为严重的，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央公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时，翟就表示不满，反对党的区域自治政策，主张“建立维吾尔斯坦”，企图分裂祖国的统一。新疆建立自治区后，即对新疆这一名称不满，认为中央对“斯坦”有误解，经过“争取”，中央还会采取“斯坦”的名称。因此在整风前，一方面在新疆干部中散布“斯坦”没有政治意义，仅仅是地方的意思的谬论，同时经常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铁意等密谈“斯坦”问题，就是在整风运动中，也在继续这种活动。整风开始鼓动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铁意借“维吾尔斯坦”问题向党进攻，翟宜地夸奖他“放得很好”。对反对建立维吾尔斯坦的人进行打击，责问哈族干部：“有什么理由不同意维吾尔斯坦？”恶意污蔑民委党组书记汪锋同志讲“新疆人民不同意建立维吾尔斯坦”的话是“捏造”的。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阻挠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铁意的批判，对维文室同志说：“不要搞得太过火，以后还要在一起工作的。”污蔑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是对新疆干部的“攻击”。

维吾尔上古、中古史一书，主张维族同中国分离，是苏联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因内容有错误没有发行，但翟为了寻找分裂主义的理论根据，不惜采取耍手段，曾极力主张出版这本书。

（二）排斥汉族和歧视其他民族。对汉族人民在新疆所作的巨大帮助，抱排斥态度，污蔑人民日报介绍新疆生产部队的成绩的文章不是事实，是“夸大”，并且要去质问人民日报编辑部。说“人民日报记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报导汉族的成绩。”民族画报报道一位汉族女技术员，教一个吐鲁番的农民接葡萄枝的方法，翟认为是“看不起维族”，大为不满。反对汉族文艺工作者对新疆歌舞作整理加工，说“把优美的地方改掉了”。他并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要播送汉族演员演唱的经过加工的维吾尔民族歌唱片。在语言工作中，有意排斥汉族借词，在总结语言调查工作时，他指示木铁意在材料中将维族人民已经接受的汉语词汇都剔除，企图以此保卫维吾尔语的“纯洁性”。在语言研究工作上，认为“新疆十三个民族影响了维吾尔‘事业’的发

展”。歪曲历史事实。否認汉族历史人物左宗棠出兵新疆使新疆免于帝国主义奴役和免于从祖国分离出去的进步作用，贊揚英帝国主义走狗柯古栢政权。企圖寻找分裂祖國的历史根据。並企圖借此挑动民族間的仇視。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馬木提师长大为贊揚，說他是維族的領袖人物，对他要重新估价。

(三) 一九五七年五月利用职权在社內出版他自己整理的“維吾尔民間諺語和謎語”一書，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贊揚地主階級，辱罵劳动人民，破坏民族团結。在書里宣揚胡大(上帝)，如“只要要求胡大，一切都会到手”，“給你生命的胡大，总会給你活路”，“有胡大的地方沒有灾难”。污蔑劳动人民“外表黑的人，心总是黑的”，“穷光旦早上是穷的，晚上还是穷的”，“穷人一旦得到好日子，連白天也点着灯”、“穷鬼的肚子即是塞飽了，眼睛还是貪婪的”，“穷鬼的眼睛只盯着饅头，肚子飽的人才注意修养”，“头大作官，脚大为奴”，“別叫餓鬼去做飯，別叫受冻的人去生火”，“乞丐的口袋是装不滿的”。贊揚地主階級“有錢的人有智慧，高山也怕有錢的人”，“一两黄金一两智慧”，“有錢的人有面子”。恶毒挑拨民族关系“汉人坐着牛車捉兔子”(意即汉族慢慢会治死維族)，污蔑汉族“給肝就是阿不拉阿旬(意指好人)，不給肝就是阿卜拉黑大衣”(汉族——意指坏人)，污蔑蒙族“韃子的馬不会吃料，吃料就穿破嘴籠头”，污蔑回族“要發生的已經發生了，回族的鼻子已經打出血了”。还有很多污蔑妇女的，如“孩子好欺侮，姑娘好玩弄”，“有花斑的馬，不是好馬，年幼的女人，不是好老婆、狗是忠实的，老婆是累贅”。此外还有煽动階級仇恨的“不要把父亲的敌人，当作你的朋友”等。

翟宜地在平时对工作不聞不問，但对这本书的出版却抓得十分紧，經常亲自查問工作进度，並扩大發行一万五千册。

(四) 翟宜地混入党內以后，一貫进行反党活动。早在一九五二年在鄯善县任县长时，糾集地主流氓分子破坏該县第六届人

民代表會議，在会上反对汉族幹部，攻击县委会，攻击县委書記康东山和副县长李俊傑同志（都是汉族），污蔑他們是大汉族主义。对三反运动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污蔑，挑拨民族关系，阻撓了土地改革。辱罵共产党沒有一个好东西，都是穿破鞋烂套子的，和他們在一起嫌他們臭。指使和縱容維族的坏分子辱罵党和政府。以致造成該县歪風邪气，在一个时期內相当严重。

米民族出版社后，仍繼續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五六年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翟带头強調新疆幹部“沒有肉和奶就不能生活”，要求按新疆标准發工資。煽动群众对領導不滿，其个人主义欲望不能滿足，即对組織不滿，污蔑出版社領導有大汉族主义。污蔑民委党组，不批准节日放假是“干涉出版社的内部事务”。

翟的宗教观念也很深。一九五六年維族幹部阿不都拉巴海逝世，翟宜地主张写的輓詞是：“我們是屬於阿拉（即上帝）的，我們还回到阿拉那里去”（引自古兰經）。

（五）追求資產階級腐化生活。翟宜地早在地方上工作时作威作福，曾貪污群众斗争果实。到出版社以后，仍然追求个人享乐。三年多沒認真地审查过一本書稿，只是毫不負責任地、馬馬虎虎地看了一、二書稿。利用职权，讓工作幹部在工作時間給他整理“业余”稿件。“民間諺語和謎語”一書，用多算字数和重复內容、提高标准等非法手段，多騙取稿费二千多元。利用职权非法同时約两部稿子，騙取預支稿费約九百元（至今未交稿）。

“与習作者談写作”一書，他只看了一遍，就拿了二百五十元的审校費，不但沒有解決問題，相反地倒改錯了若干地方。翟虽然騙取了大量稿费，仍貪心不足，在約了两部稿子，預支了九百元稿费后，还要业余編“五体清文鑑”的索引，騙更多稿费。

去年赴苏訪問，把西装和帽子在苏联卖掉。向苏共中央聯絡部远东司的負責幹部索贈收音机，政治影响很坏。出国和回国攜帶行李都超重，仅回来时从新疆到北京就浪费運費三百多元。在

苏联境内由苏方负担的超重行李费更多几倍。

斗争中的态度：翟宜地的态度极不老实，对自己的反动言行不肯交代，对别人揭发的事实进行辩解，避重就轻企图混过关。领导小组和整风小组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的帮助，经多次开会斗争，但效果很小。仅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赖理屈词穷时，才表示低头认罪。但认识极不深刻。

处理意见：开除党籍。撤销原有职务，留用察看，给予相当于行政十五级的生活待遇。

中共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总支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平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李平，男，四十二岁，广东省澄海县人，一九三六年入党，文化程度中学，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五年调轻工业部设计公司任副经理，一九五六年任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院长、部党委委员、监委委员、院党总支书记。

李平在一九五二年任广东省汕头市市委副书记时曾犯过地方主义错误。他从一九五三年以来对过去所犯错误不但不能深刻认识，相反的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其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一) 污蔑党是宗派主义，取消党的领导，将党的核心领导称为宗派小集团。李平在任院长期间，他反对不懂技术的党员当科处领导人。一九五七年他在全院科长以上及工程技术人员会议上公开宣布：党过去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信任，现在要大量提拔。国务院有规定，将来要派资本家当司局长，不要党员当“政

委”。他主張取消專職總支副書記，削弱黨員副院長的職權，一切以技術人員作為領導核心，並宣揚：凡生產部門都要懂生產技術人來掌握領導，這是個基本轉變，是幾年來的經驗。又說：

“資產階級已成為勞動人民右翼，工人階級成為勞動人民左翼”。整風開始他不顧總支委員的反對，以個人代替總支委員會狂妄的向全體職工宣佈：“設計院的主要問題是黨的宗派主義”，煽動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充當了右派向党進攻的先鋒。

（二）李平在發展黨的工作上要吸收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入党，並主張降低知識分子入党條件，違反黨的組織路線。為了要吸收某些人入党，曾不擇手段，用行政命令的口氣批示“要總支在一定的時間給予解決”。他在出國時期，向蘇聯同志介紹代表團人員時說：朱伯源（非黨員、右派分子）是中共預備黨員。在幹部路線上憑私人感情的好惡代替組織原則，對工程技術人員採取封官許願，破壞黨群團結，甚至以物資進行拉攏。如李對本院第一副院長兼總工程師陳曉嵐說：“鄧院長（黨員）反對提拔技術人員”以此挑撥鄧、陳的關係。又如在蘇聯期間李批准了許乃文等工程師用五百個盧布買手表。他對工农幹部採取輕視或排擠。他稱右派分子王培年為中國“專家”，說朱伯源（右派）是成熟的發展對象等。

（三）洩露黨的機密。秘書曾群是國民黨員，歷史不清，但李平將黨內的機密文件交她保管，甚至將院內保衛工作總結的絕密資料也交給她保管，直到她離原職數月才交出。他在國外考察時期叫朱伯源參加黨的小組會議作記錄，保管出國一切資料。整風開始，李平聽了彭真同志關於整風的步驟和策略的報告，規定不許記錄與傳達，但李平不僅作了記錄，回院後還在非黨科長會議上作了傳達，嚴重地洩露了機密。

（四）公開進行煽動點火。當右派分子猖狂進攻時，李平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的一次技術人員會議上公開叫囂：“過去黨員

整你們（指三反、肅反運動），今天你們要整整黨員”。當右派猖狂的向党要領導權時，李平向右派宣稱：“這次我一定解決有職無權的問題”。在水管科号召大家“吐苦水”，並與黨外人士說：“設計院是科學技術部門，不要黨的領導行不行？”

（五）無組織、無紀律，與黨分庭抗禮。李平以老黨員自居，夸耀自己的革命歷史，向組織上要待遇、開工資，不僅在國內，在蘇聯考察期間，向蘇聯同志亦介紹自己的革命資歷，並說不滿二十歲就擔任地委書記了，對待蘇聯的招待服務工作採取不友好的態度。在院內一貫目無組織，出國時間不經組織批准超過了三個多月，公開的不執行黨的決議，任意取消一些黨員的權利，並實行家長式的領導。他喜歡奉承，拒絕別人批評，對幹部任意訓斥（如對原總支書記楊可篋同志，鄧毅同志經常要態度），發脾氣，打擊別人，抬高自己。

根據以上事實，李平的反黨不是偶然的，是有社會歷史根源的。李出身於地主階級，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雖然組織上參加了黨，但未經徹底改造，思想上並未放棄其原階級的立場。從他歷次所犯錯誤分析，李平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者，是混入黨內，篡奪黨的領導權，進行宗派活動，搞獨立王國的政治野心家。李平從一九五二年任汕頭市市委副書記開始，一貫是目無組織驕傲自滿與黨鬧獨立；在幹部政策上存在着嚴重的宗派主義，用人唯親，以私人感情的好惡來代替黨的組織原則。敵我不分，嚴重的洩露黨的機密，排擠黨員幹部；在組織路線上他主張吸收政治思想不純的分子入黨，降低入黨條件，並主張為五百萬知識分子着想，散佈資產階級“技術至上”的思想；拒絕黨的領導與監督，破壞黨的統一和團結。雖經黨屢次教育，都因他對黨一貫採取不老實的態度而拒絕了黨的教育，因而給黨的事業造成極大損失。這次整風期間，當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進攻時，李平起了向党進攻的急先鋒作用，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黨內右派分子。為了嚴肅黨的紀律，純潔黨

的队伍，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决定开除李平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院长职务。

中共建筑工程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永清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

陈永清，男，五十四岁，湖南人，没落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二年重新入党，原任建筑工程部计划司司长、部党委常委、部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兼整风办公室主任。

(一) 陈永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

陈在历史上曾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一九二九年第二次被捕后，自动供出了上海团中央两个信箱、省委上海通讯处、汉口通讯处（省委组织部长易足山因此被捕）、汉口一个团员及中共六代大会的情形，并随特务去捕人。后来他又向蒋介石的武汉卫戍司令部写呈文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不参加共产党”。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先后两次重新入党和恢复党的关系时，都隐瞒上述自首叛变的行为，直到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后，才坦白一九二九年曾自首。一九四三年抢救运动中才坦白一九二九年的自首叛变行为。在延安整风时，他说：“要么就做个保护毛泽东的人，要么就杀掉毛泽东而出名”（大意），可见他对党的仇恨是极端严重的。

陈在历史上除自首叛变外，还一再发生过政治动摇。如秋收暴动失败后，他躲在家中不愿出来革命；一九三三年被捕后，想进“反省院”；一九三九年因省委决定不发给家庭津贴等原因，

就消極回家，做了一年多的革命逃兵，后經組織上派人去找他，才于一九四〇年又回到桂林办事处参加工作。

（二）主要反动言行

一、反对党中央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其他右派一样，坚决否定建筑工程部几年来的工作成績。

1.說一九五六年盲目冒进，而盲目冒进的根源是由于领导特別刘部长好大喜功。陈永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集中表现在当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會議上毛主席批評了反“冒进”的錯誤，提出鼓足幹勁……多快好省总路綫、在最高国务會議上毛主席又批評了“好大喜功”的說法之后，陈仍頑固地坚持說：一九五六年是“冒”了，摊子这么大，还說沒有“冒进”。又說：“建筑工业化速度快了，規模大了，現在不是方向。”陈还說：“不能說社会主义的好大喜功就是好的”！

2.陈反对“瞻前顧后”和“难免論”的說法。陈狂叫說：“难道說顧后一顧就顧到一九五八年？推迟两年再搞不是更好嗎？”“我們要提倡可免論，讓可免論早点出現，不能今年难免，明年难免，后年还是难免”。

3.坚决反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提法。他硬說建筑业工作成績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問題，硬說建筑部是犯了“根本路綫上的錯誤”。他說：“几年来我部领导上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作風，这就是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指示，执行的不認真，不坚决”，“态度是敷衍了事”，“方法是拖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前面批評领导盲目冒进好大喜功，后又指責为“暮气、衰退”，是“政治上保守，业务上冒进”。

4.我部第一个五年計劃基本建設投資不过五亿元，他是計劃司长竟带头貼大字报說：“浪費了两亿三千万元”。以后上报中央数字又說“浪費了七亿余元”，（此数字上报时被領導小組予以糾正）以从根本上否定几年来的成績。他为了达到否定成績，

整垮領導的目的，還一再地寫大字報攻擊司、局、院長，要“司、局、院長大膽、堅決、徹底地揭發浪費和保守”，要“拿出浪費和保守的資料”來，要負“反浪費反保守深透之責”。企圖造成嚴重混亂的局面。

二、反對民主集中制，破壞黨的團結與統一，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1. 採用兩面派的手法，站在反對派的立場與黨對抗。他主張整風“只是挑毛病”，“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他一面親手簽發部整風領導小組討論的對整風運動的佈署文件；回過頭來又堅決地反對這個文件。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貼大字報說：

“我看草稿時沒有改去這句話，但我不同意這種作法”，“既要揭發缺點錯誤，那不是挑毛病是幹什麼？”。他給黨委貼出“緊急建議”的大字報，對黨委施加壓力，煽動群眾向黨進攻，企圖把黨組織搞垮、搞亂。

2. 利用整風辦公室主任的職位，煽動群眾向黨進攻，向領導進攻，他貼大字報說：“三句好話不如一馬棒，三句好話，不如一張大字報”，“大字報能夠發揮、揭發和攻擊缺點、錯誤和丑惡的作用”，“能組織和吸引群眾朝着一個目標進攻”。說：劉部長“對大字報不是促進派的态度”，是給了沒貼大字報的人吃了“定心丸”了，使他們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了。他把黨當成敵人，把大字報當成毒箭。他煽動群眾說：“欲破曹兵，須用火攻！”

3. 惡毒地污蔑、丑化和攻擊領導、攻擊黨組。他污蔑黨組對整風運動的領導是：“決心不夠，勁頭不足，方法不多”，是“以暮氣和官氣來反浪費反保守”，是“保守越揭發少越好，越揭發不徹底越好”，是“草率收兵”，“無動于衷”，是“鳴放無力”。他攻擊司、局長們說：“你們對於當前開遍了爛的政治思想之花，熟視無睹！”他把我部整風運動描寫成“漆黑一团”，辱罵部領導上在“促退”，在“提倡浪費”。

4.反对党对报刊的领导，主张批评自由。主张整风简报可以批评同级党委和上级党委。他的反党纲领是：“只要是事实就登”，他说：“假如我们内部的想法要一致才能登，那么整风简报就要停刊了”。在他反党纲领指使之下，部的“整风简报”在一段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他进攻领导的武器，他亲自指定把他和别人写的攻击领导的大字报登在简报的显著地位上，高文西恶意攻击刘部长的大字报“不能讚誉过早”，他不經领导批准就登在整风简报上。他主张只要暴露缺点错误，只要挑毛病，只要是对党对领导进行攻击就是好的，就“大有可为”，提倡“偏激也好！”

5.誹謗领导，散佈流言蜚語，进行非組織活动。他散佈說：“部领导工作上政治与业务沒有結合好”，“幹部政策有問題”，“有右傾”。又說：“刘部长不重視政治理論”，“不是个好人”。說：“部对大字报問題上認識不一致，我已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講刘部长不是促进派的态度，不管他愛听不愛听，我要写大字报”。又散佈說：“工作难办啊！”“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肃反运动， 包庇反革命分子，打击好人

1.整风开始时，正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肃反对象喊冤时，他煽动說：“大家不要有顧慮，什么都可以講，罵也可以！”又說：“办公厅肃反斗了七个人，結果一个也不是反革命，还說成績是主要的。”支持右派分子和企圖翻案的人向党进攻，否定肃反的伟大成績。

2.整风前曾抗拒保衛部門和中央监委的警告，把反革命分子金敏求由經建公司帶到机要部門（計划司），这是坚持用一位黨員科長把金換來的；包庇反革命分子陈一仁（原經建公司經理，是党的叛徒，反革命分子）；整风过程中，同情、支持反党坏分

子陈明善向党疯狂进攻，抗拒国家机关党委指示，坚持不把右派分子孔嘉作第一类处理（国家机关党委决定按一类处理），主张不把右派分子楊誠划为右派分子。

3.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三反”时派了一个贪污犯赵兴和去石家庄分公司领导三反运动，赵說：“陈老板給我的任务，別人不能干涉。”結果把三反搞糟了。又介紹他的老乡葛鳳書（国民党湖南省社会統計局的，有政治問題）到石家庄分公司工作，並給公司写信要葛当科长。

4.对給他提意見的同志实行打击报复，把宗世鑑同志（石家庄分公司經理）整的大哭一場；他任办公厅主任时，整走了两个副主任，胡弼亮同志調走后說：“我至死也忘不了陈永清。”陈对組織，对同志極其阴險，十分恶毒。

四、敌視党的領導，抗拒党的指示

1.党对陈的自首叛变問題作了寬大处理以后，十余年来对他仍給予了很大信任，但陈以怨报德，长期对党不滿，他不仅不感謝党，反而自命不凡，长期对党抱敌視的态度。他对級別、职务沒有提昇極为不滿，說：“别的司、局长都是国务院任命的，为什么我办公厅主任不經国务院任命？”与党离心离德。

2.工作一貫表現飞揚拔扈，一手遮天，独断专行，欺上压下，目无組織。在他脑子里，司局长中他为第一，对副部长他也看不起。整風前他會不經任何的集体討論，个人就决定某同志为党委副書記，或某一个副書記退出党委。中宣部和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各单位保証“业余大学的学习”，他抗拒說：“能保証就保証，不能保証就不保証”。在整風办公室工作时，副主任好几个，但很少耐心交換意見，發出的报告很少集体討論，他看了就批發，驕气十足，一手遮天。

3.一九五七年他是党委委員，党委因故未及时召开党委会，再加有一次听报告的票，按規定不应發給他，他对党委大發脾

气，馬上給党委写信說：“党代会閉幕已十多天了吧，新的一届党委至今沒有召开……你們忘記了，放棄了集体領導，这种情况必須迅速扭轉，否則，我再要求解除我这个‘有职无权’的党委委員了。”“昨天的报告票發的不当，这是个原則性的錯誤，我建議你們作检查，以免再重复这不应有的事故”。

以上种种事实充分說明了陈永清是隱藏在党内的大右派。

(三) 斗争中的态度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同志們开始对陈永清的右派言論进行反击时，陈的态度極為强硬，在三月六日党员司局长鳴放会上，繼續坚持發揮他的反党言論，經各大区局长、經理、司、局、院长进一步揭發和严肃批判之后，承認了一些錯誤。但在五月中旬和六月初，又連續地向党组和部长个人写信，不但从根本上否認錯誤，收回檢討，反而再次地發动猖狂进攻，力圖把党对他的严肃批判，歪曲为他和刘部长的个人之爭，阴谋混淆视听，进一步攻击刘部长。說他的問題“肯定不是大是大非，而是小是小非”，

“我陈永清是正确的，是你（指刘部长）領導錯了”。他还恶毒地污蔑参加批判他的同志們都是盲从領導，是“賈桂思想”。並狂妄地說：“这封信与其說是为了我自己，倒不如說主要是为了你，因为你是領導这场斗争的人，所謂‘解鈴还要系鈴人’就是这个道理”。态度極端恶劣。

六月底七月初，我部召开了群众性的批判大会，陈在会上仍是頑抗抵賴坚持反动立場。他說：“唯物論辯証法告訴我們，既不决定于贊成方面，也不决定于反对方面；既不决定于多数，也不决定于少数，就是說不决定于主觀思維以为如何如何，而决定于客觀存在的大字报本身。大字报是正确的，促进的，誰要反对它也不頂事。”說他的大字报和毛主席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根本拉扯不上。他頑抗地說：“要把我的这些言行划为右派，我並不后悔，大家都死不了，我还要活廿年，今后可以看出我究竟是不是一个‘金不换’”。

总之，陈在斗争中的态度，极端恶劣，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继续猖狂地向党进攻。

（四）处理决定

根据陈永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及其态度，經党委会討論决定开除陈永清党籍，並建議行政上从严处理。

中共地質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韻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

刘韻，女，三十九岁，山西人，家庭出身高級职员，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九月入党，同年参加工作，現任地質部資源計劃司副司长。

刘韻在整風中，带头縱火放毒，向党进行了猖狂的攻击，主要的有以下反党言行：

1. 整風运动开始，刘即积极点火，煽动群众，並且帶領其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散佈部領導对整風“沒有决心”的流言蜚語，攻击何副部长的动員报告“是这样的令人不滿”，說部領導“可能感到錯誤不严重，也可能觉得大家的意見不对，片面”，“使党外人士很可能觉得地質部的党不象話”，党外人士也可能抱这样的态度：“党自己不願整，我們又何必呢？”何副部长动員报告后，她就迫不及待地主张立即鳴放起来，在她的主张下，不顧其他同志的反对，召开了扩大的支部大会（即全司群众大会），她作了“啓發性”發言，散佈其反动言論。誣蔑攻击党委“是党組的尾巴”，要党委“不要再作党組的尾巴”，积极的主张“先整党組”。刘韻同时也在党内进行煽动和点火，她說：“党

員認識麻痺，不如黨外人士認識敏銳”（按指極右分子王銓的反動言論）。並說“不知黨員是否認識到這種嚴重性”（按指右派向黨進攻中提出來的問題），“黨內還有顧慮，有盲目的宗派情緒”，要黨員“不要怕喪失黨和領導的威信”。整風一開始，劉韻就極力煽風点火，把矛頭指向黨組。

2. 極力的攻擊黨組，丑化部的領導，進行改組黨組的反黨活動。她攻擊部領導“很難起到領導作用”，丑化為“不論從工作上、政治思想上、作風上、方法上，都是象推泥球一樣，大家推着滾着往前走”。對右派分子提出的部領導是“思想僵化”，“停留在一九五二年的水平上”，“上靠專家，下靠司局長”的謠言，表示欣賞，並到處宣揚。丑化黨組是“沒有領導核心”，“問題集中不起來”，“亂哄哄”，“人雖多而動腦筋的人少”；丑化部長是“不動腦子”，她狂妄的提出要黨組書記“自覺一點”；並曾提出過“成立黨組書記處”的荒謬主張；她認為“這一下子黨組非改組不可了”。她對本司有人提出的×、×等副部長不行，劉毅可以當副部長的錯誤言論不加批駁，並為劉毅鳴不平說“討論人家（指劉毅）處分時還沒讓人家參加”。她並在司內提出了“①取消黨的領導取消黨組；②加強黨的領導進行必要改組；③換人是否處分”三個問題要大家爭辯。以上充分暴露了劉韻企圖趁整風之機，攻垮黨組，達到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3. 誣蔑黨群關係。對右派分子提出的“黨員與群眾之間有牆有溝”表示贊同，並說：“領導與群眾之間還要爬座山”。她認為黨群關係不好的原因之一是“黨員的覺悟不高，盲目的相信黨的方針政策”，說：“黨員不能明辯是非，有盲目性，對黨的方針、政策、原則體會不了，簡單的認為都對”，並認為：“這與黨評價幹部進步與否的標準有關”。她認為黨群關係不好的另一個原因是：“比較負責的同志在取得政權後，当了官，很容易滋長特權思想，習慣高人一等，環境變了，思想也變了”，就“不

自覺了”，“就逐漸與群眾有了距離”。

4. 攻擊肅反發表叛賣言論，她在群眾大會上所作的“啓發性”發言，即將肅反運動列為當前的五大矛盾之一，攻擊“部領導肅反運動是有毛病的”，說肅反中反對右傾是“壓力很大”，因此就“不能冷靜，思想動搖”，“就偏重於有問題的一面去想”。她說：“被肅的人如果不是（反革命），當然會有意見”，她為肅反對象辯護，說：“因為過去說話不注意”，所以才“被肅”。她狂妄的提出三點質問部領導：“①地礦司肅反鬥了半年多，沒有一個反革命，部裡沒有交待，司裡對肅反究竟應該怎樣估計？②缺點，偏差的綫要劃清楚，鬥爭了不是反革命的如何向人家交代？③打擊報復問題（指肅反中有打擊報復，並舉例作証）如何處理？”右派分子攻擊我們“三批材料不能定胡風的案”，誣蔑我們“肅反運動是利用群眾”，她表示贊同，並到處宣揚。

5. 認為我國“國家體制及制度不合理，是官僚主義產生的原因”、“中央集中的過多，計委掌握太嚴、控制太死、管的過多”。

劉韻的反黨言行，是有其歷史和思想根源的。她出身於高級職員的家庭，長期受着資產階級教育的影響，入黨後，資產階級思想沒有得到改造。一貫表現了嚴重的個人主義，驕傲自滿，自命不凡，自以為是，蔑視領導，目中無人，把個人置於組織之上，要組織服從自己，甚至不惜出賣組織換取卑鄙的個人威信，拒絕黨的批評和教育。劉韻在整風前，即表現了其在政治上對黨的嚴重不滿，並有分裂黨的團結和削弱黨的領導作用的反黨行為。因此，在整風中就完全叛變了黨，墮落成為向黨瘋狂進攻的右派分子。

根據以上事實，支部大會通過，本委決定，開除右派分子劉韻黨籍。

中

子

刘毅，男，現年四十一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六年十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委書記、地委書記、地質部办公厅主任等职。

在这次党的整風运动初期，刘毅趁社会上資产階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利用党所給他的部領導小組成員和办公厅領導小組长的职务，大肆煽風点火，向党进攻。

刘毅一再在群众大会上攻击党組整風沒有决心，說党組对整風的認識“有天上地下之別”。向群众煽动“因領導太不自覺，不尖銳、不刻薄、不解決問題”。还說“威是威信，不是威势，几天来大家發言完全証实，大家越来越失望，（領導上）这又有何威信呢？”露骨地打击領導威信。在黨員司局长大会上，刘毅更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反党观点把办公厅放出来的一些丑化、謾罵領導和攻击党組的右派言論和錯誤言論加以系統化，向党組进行攻击。事后，还在群众大会上夸耀他的發言“震动很大”。

在小組会上，刘毅也不止一次地鼓动“有些同志發言尖銳一些，刻薄一些，我認為沒有什麼”。他还为有錯誤言論、右派言論的黑板报辯护說：“那不是謾罵，是反映了大家的願望”。公开支持攻击領導“不学无术”的謬論，說領導“連这一点都不承認还行！”当其他右派分子攻击領導是經驗主义，高唱“不調整領導成分不能改进工作”的濫調时，刘毅还嫌攻击得不够，他認為“这个估計过高”，而是黨員副部长“連个主意也沒有”。誣

蔑“黨員副部長是‘有職，有權，無責’，非黨員部長是‘有職，無權，有責’”。右派分子薛毅發表反黨的“改革幹部選拔使用制度的初議”以後，征求劉毅的意見，劉毅表示部分同意，並以提拔某副部長為例，來支持“初議”中所謂“選拔幹部沒有群眾路線，標準籠統”的謬論。他還主動找物探局右派分子錢寧談過話，鼓勵錢寧“鳴放”。

早在学习八大文件的时候，刘毅便有过醞釀改組黨組的活動，在这次整風初期他又和某些同志談部領導需要改組，並說：

“這不一定不是和風細雨”。

對待肅反的問題上，劉毅是附和肅反對象對黨不滿的情緒，一再強調黨對肅反中被審查的人傷了感情，要黨向他們“消除隔閡”。在群眾大會上公開說“肅反有偏差，有錯誤，應該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來吸取，這些偏差和錯誤應由部領導負責”，並將此說成和某部長等個人的作風有關。在支部會議上要肅反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作思想準備，使他們感到壓力很大。在辦公廳兩次討論肅反問題的支部大會上（他是支部書記），吸收非黨肅反對象參加，並一再鼓勵肅反對象發言。因此，這些人在會上向黨進行了猖狂的攻擊，否定肅反成績，誣蔑積極分子，也有少數“積極分子”在會上表現動搖，甚至洩密。劉毅對這些有嚴重錯誤的言論不組織批判，正確的意見沒有發表，實際上把黨的支部大會變成了反黨的“控訴會”，變成了肅反對象向黨進攻的工具。

辦公廳的反右派鬥爭，在劉毅擔任領導小組長期間，實際上只是批判了薛毅的“初議”，而對右派分子丑化、誣蔑領導的言論，沒有組織揭發批判，當領導小組其他成員提出這個問題時，劉毅反說“不要再批判了吧！再批判一次等於把領導又丑化一次”。鳴放初期，辦公廳黑板報登出了不少有明显右派性質的言論，劉毅不進行追查。整風初期，專家工作室有些翻譯醞釀鬧大民主；鳴放期間，也有不少人發表了右派言論和錯誤言論，劉毅

置若罔聞。在張華同志對此提出意見後，他也只是非正式的和專家工作室主任何棟同志談了一下，而對何棟同志提出的具體意見又不採納。在反右傾情緒時，劉毅違背部領導小組和國家機關黨委的指示，不聽取辦公廳領導小組其他成員的意見，提出“不追不批”的錯誤口號。劉毅在反右派鬥爭中的錯誤作法，使辦公廳的右派分子漏了網，中間群眾沒有受到應有的教育。

劉毅雖然入黨二十多年，但沒有很好的接受黨的教育，地主資產階級立場沒有得到改造。他在一九四六年任地委書記的時候，曾函告無極縣處死與被劉毅遺棄之妻姘居的農民劉德辰，一九五四年此事被告發，受黨內撤銷工作，行政上撤銷辦公廳副主任職務的處分。一九五二年任地委書記時，因包庇反革命分子劉承樑（劉毅胞弟），曾受黨內撤銷工作處分。但劉毅並沒有從上述兩次錯誤中吸取教訓改造自己，反而一犯再犯，在這次黨的整風運動中，趁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時機，他一方面背着黨組進行醞釀改組黨組的活動，一方面大肆攻擊黨，丑化領導，煽動和率領右派向黨進攻，企圖攻垮黨組，篡奪領導，實現他個人的政治野心，並利用其領導小組長職權歪曲上級黨組織的指示，使辦公廳運動搞得不深不透。以上充分說明，劉毅是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為純潔黨的隊伍，決定開除其黨籍。

中共石油工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楊海鵬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楊海鵬，男，四十四岁，山东省菏泽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菏泽地委書記，新乡市委書記，中央燃料工业部計劃司司长等职，被开除党籍时任石油工业部計劃司司长。

一九五五年楊海鵬調任石油工业部計劃司司长后，就开始进行反党活动，与张美璠、苏鳳結成右派反党集团（楊是这个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在整風期間，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反对中央和石油工业部党組，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力圖篡夺领导权，妄圖以资产阶级的面目来改造党。

一、楊海鵬积极反对部党組和中央。他以討論党的方針政策問題作为幌子，用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手法，顛倒黑白，拨弄是非，向党猖狂进攻。他在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問題上大作文章。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天然油与人造油並举时，石油部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而楊却无中生有的来攻击党組，誣蔑党組不执行中央的方針，不重視人造油的发展，“在人造油問題上是促退派”。楊海鵬对抗中央关于勤俭建国的指示，部党組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認為可以节约投資百分之二十五，而楊却反对，並組織計劃司“算账”，企圖找到反对中央方針的“論据”。当計劃司算出可以节约投資百分之二十八时，楊故意隱匿不报。

楊海鵬在群众中制造反党輿論，在高級幹部哲学自修小組中

他提出軍人不能領導石油工業的反動論調，公開叫囂要“轉業軍人回去”。這和社會上右派分子所說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反動論調如出一轍，其目的就是要搞垮石油工業部黨組，要共產黨下台。

楊海鵬對部黨組的成員都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在司局長以上幹部中進行挑撥，煽動群眾攻擊領導。

二、楊海鵬與張美瑤、蘇風等人結成反黨小集團，竊據機關黨委常委（他們是五個常委中的三個），把持了機關黨委會，作為反黨的障地，乘整風之機，明目張膽地向黨進攻。他們在黨委會上利用合法形式，相互勾結，一唱一合，壓制民主，將別人意見頂回去，以達到向黨組進攻的目的。他們在整風運動各個階段都對黨組攻擊，誣蔑黨組反右派有右傾情緒，在黨委會上公開要求檢查黨組，誣蔑黨組整改是“整下不整上”。當他們的這些反黨活動受到周副部長的制止後，就大為不滿，貼大字報攻擊周副部長，並揚言不參加黨委會，以示對抗。他們排擠孤立黨委專職副書記，背着副書記開小會。總之，他們把持黨委會，企圖與黨組分庭抗禮，作為他們反黨的障地。

三、楊海鵬積極支持包庇牟杰右派反黨集團，作為他們向黨組進攻的打手，以達到攻垮黨組的目的。在整風第三階段，在部長秘書中暴露了牟杰、凌歐等右派反黨集團。這個右派集團趁雙反之機，貼了很多惡毒地攻擊黨組的大字報，楊認為這些大字報“有力量”，是“對整風領導的鞭策”，備加贊揚。並叫牟杰“不要在小問題上打圈子，應該在方針政策問題上着眼”，這實際上是指示牟杰右派反黨集團進攻矛頭對準黨組。當黨委討論牟杰向中央寫的攻击黨組、誣蔑“石油部領導是陰暗角落”的匿名信時，楊表示同意牟杰的論點，要黨組進行檢查。當黨委討論牟杰右派性質時，楊多方為牟辯解開脫，並與張美瑤、蘇風等勾結，阻撓對牟杰的鬥爭。當牟杰反黨活動已很明顯，並調离部長秘書職務時，楊仍要牟杰到計劃司當副科長，以此包庇牟杰，對

抗黨組。

四、楊海鵬在整風反右派中包庇右派分子，進行煽風點火，封官許願，培植個人勢力，和右派分子一起向党進攻。楊海鵬在整風一開始就認為向党進攻的時機已到，積極進行反黨活動，他在整風大鳴大放時帶上行李，由城里搬到郊外，住在部宿舍，積極進行煽風點火的活動。他找肅反對象、对党不滿的分子談話，煽動他們向党進攻。反右派開始時，他即聲稱“計劃司沒有右派”，公開散布右派分子“有好右派”，“個人主義出發的右派分子，不一定就是反社會主義”，“反右派也不能說共產黨沒有缺點”等反動論調。在反右派過程中，一貫為右派分子辯護。他還對儲安平的反動言論，表示同情。

楊海鵬為了培植個人勢力，對有嚴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百般遷就，封官許願，並且公開鼓吹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宣揚“集體主義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沒有個人要求，就沒有集體要求”等反動觀點，為他們的反黨集團在群眾中製造思想基礎。

五、楊海鵬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不僅在石油部，早在他任荷澤地委書記時就一貫右傾，敵我不分。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荷澤地委書記期間，把一些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吸收到機關中來；一九五〇年初該區土改時，楊站在地主、富農的立場，誣蔑土改幹部“左傾殘余思想嚴重”，把土改運動全部停止下來，使該區土改很不徹底，給該地區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整風前後，他還積極支持山東的荷澤地委屈國華右派反黨集團，向山東省委進攻。他鼓勵反黨分子屈國華等要和省委及荷澤地委鬥爭到底，“骨頭要硬些”，“不要讓步”。

楊海鵬還有反對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反對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言行。

楊海鵬是個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在土地改革中，他就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關頭，他背叛了

党，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决定开除杨海鹏的党籍。

中共建筑材料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新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

陈新，男，46岁，河南省新郑县人，大学程度，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工作。原任建筑材料部地质局副局长。极右分子。

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十月曾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禁闭受审。保安处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结论是：

1、陈新与陕公一期学生常流等嫌疑分子，坏分子组织的反党组织“卡尔学会”没有组织上的关系，而是思想紧密结合，言行赞助关系。

2、陈新在河南新郑发展我党过程中，存在严重错误。在建党的组织路线上，将地主绅士派、国民党分子、CC分子、复兴分子、自首分子、半官半匪分子拉入党内。在政治路线上，使新郑党陷入新郑地主绅士派的斗争。

3、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延安后，对领导不满，说党的干部政策是“重德轻才，任人唯‘牛’。”

一、陈新的主要反动言行是：

1、攻击党为统治者，並说：“党不能客观的发现自己的缺点。”“群众要起来革我们的命。”

2、为右派分子抱不平，說：“說人家是反革命，还不知誰是反革命呢。”

3、擅自在地質局群众大会上宣布汉奸李海鴻不是反革命分子，还在大会上代表組織向李海鴻道歉。

4、說“中国沒有地主”。

5、反对整風中的专案小組由党员来領導，主张由非党人士領導这项工作。

6、扩大宣传肃反的缺点，否定地質局肃反成績，同意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反动言論。

7、誣蔑党的历次运动“都是左的开始，右的結束，糊里糊塗的下台，这就是我們（指党）运动的規律”。

8、反对党的幹部政策，說：“一百个工农幹部，也不如一个知識分子。”几年来一貫无原則的信賴旧知識分子，輕視和排斥工农幹部。

二、斗争中的态度：被迫低头，承認錯誤。

三、处理意見：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設委员会 整風領導小組对于右派分子罗維的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罗維，男，三十八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小資產階級，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九年参加工作，原任国家建設委员会燃料局副局长。

罗維的主要反动言行：

1、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和肃反等运动。

(1) 大肆攻击人事工作，在全局鸣放大会上，罗维说：

“人事科长有些是负责同志的爱人，这种情况很多，做人事工作往往也是提升的捷径，有时为了工作，有时是为了凑数，就把自己爱人填上。能力又不强，分配工作上不懂业务，乱点鸳鸯谱，有时滥用党的威信，给你唸上个金箍咒”。又说：“我发下狠心，我的爱人决不让她做人事工作，要她憑本事吃饭”。会后佈置局内干部摘录上述内容在委内张贴“罗局长鸣”大字报，影响很坏。

(2) 攻击肃反路线，否定肃反成绩，並同情肃反对象。在六月十一日燃料局党支部大会上，罗说：“我们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搞肃反，亦有問題，打中的命中率不高，我认为应以科学的方法来搞”。又说：“肃反对象是否一律要搜查，我們不是公安人員，前去搜查是否合法？”並在会上要别人为肃反审查对象罗新说情。

(3) 在鸣放期间，当局内其他右派分子大肆攻击老干部时，罗亦说：“老干部不称职是有的，有的身体坏，有的文化低，有的摆得不当，不能担任工作。”又说：“职与级合一是耽误工作的，因此职与行政级别应分开。”

2、縱容与支持其他右派分子和煽动一些有錯誤思想的干部攻击党的领导，特别是国家建設委员会党组和党委。积极主編了两期“燃料局論壇”反党大字报，支持右派向党进攻。认为局内刘影（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論有思想性，拒不原文披露刘影的反党言論。罗还洩漏了局长、支書联席會議上不应外传的一些情况。支持燃料局干部出“向党組呼吁”的大字报，並說“應該大喊大叫”，于是引起局内干部思想混乱，紛紛指責党组、党委領導整風不力，甚至有人在听了罗的煽动性的談話后，想要向国务院写請願書。

3、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共鳴。罗說：“人民大学有个講师

（葛佩琦）說：現在的党群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他說得很中肯”。罗对“电影锣鼓”、“新西遊記”都感兴趣，認為有道理。

罗維在斗争中的态度：在听了六月十八日王副主任在全委黨員大会上指名批評燃料局領導有問題后，才开始察覺到自己有問題，向領導上承認自己有錯誤，但对錯誤的严重性認識很差。在斗争初期，罗的檢討仍避重就輕，躲躲閃閃，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經過多次的批評和斗争后，对其反党言行逐漸有所認識，表示低头認罪，願意悔改。

处理决定：开除党籍。降职、降級、降薪，由副局长降为科长級，由10級降为14級。

中共城市建設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牟宜之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牟宜之，男，49岁，山东省日照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旧官吏。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县长、支队长、軍区參議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軍区敌工部部长、北京市建設局副局长、林业部經營司副司长等职。一九五六年二月調城市建設部公用局任副局长。

牟宜之曾于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脫团，經国民党中央委員丁惟汾（牟的姨夫）介紹去日本留学，后任过国民党山东日报社經理兼編輯，外交部額外科員，乐陵县长，后經我党爭取起义。

主要反动言行：

1、誣蔑毛主席。

2、不同意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誣蔑人民代表大会說：“人代大会是对共产党歌功頌德，代表則是检查錯誤。”还反对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

3、誣蔑我們的工作說：“成績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並說：“农业合作化后产量降低了，农民生活仍然很苦。”說城市建設部是：“离心力大，向心力小，若說一声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便会一哄而散”。

4、誣蔑苏联說：“波匈事件是因为大国欺負小国，苏联駐軍軍費就地筹給，軍紀不好，引起人民不滿的結果”。說“苏联出兵是干涉匈牙利內政，要栽大筋斗”。說苏联专家的建議不值得學習。斯大林一点成績也沒有，真是一塌糊塗。

5、否認历次运动的成績說：“三反、五反錯誤很多。延安整風偏差很大，如果我参加了延安整風运动，一定把我整成太阳牌的日本特务或整成青白牌的国民党特务，或双料的。”

6、留恋剝削生活，对现实不滿說：現在的生活不如当国民党的县长时舒服，現在的生活好比无期徒刑，象坐“囚籠”。

7、贊賞“花丛小語”說：其中写的詞很好，不同意有人写文章批駁。認為“草木篇”不一定是坏的。說民用設計院極右分子王功溥在辯論会上猖狂向党进攻是“真有勇气”。

牟宜之的这些反对党的政策，否定社会主义建設成績，誣蔑党的領袖，誣蔑苏联的言行是右派言論，是屬於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質的。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划牟宜之为右派分子，因此經部党委討論决定开除牟宜之的党籍。

中央批示：同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开除右派分子牟宜之的党籍，行政上降职、降級、降薪的处理意見。

中共水产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 極右分子刘乐川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

刘乐川，男，四十二岁，山东省邹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加工作，同年七月参加共产党，历任山东第三支队司务长，渤海军区二团供应处长，渤海行署工商局副局长、进出口管理局长，山东省貿易总公司副經理、商业厅副厅长，中国油脂公司經理，中国水产供销公司經理，一九五六年五月来水产部任党委書記、供销司司长。中共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山东代表。

主要右派反党事实：

(一) 積極組織反党宗派活动，拉攏邵春三、郭宝德、袁汝信等，作为反党骨幹，利用黃滌塵、王能貽、楼惠芳、何志枢、刘光世等一批右派分子作为積極分子，而且企圖把他們拉入党內。整風鳴放中，向党猖狂进攻，有組織地在群众中散布反党和污蔑領導的言論。宣揚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說高副部长是搞輕工业的，张副部长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隨商业。他把供销局与部的关系看成是“主要矛盾”，以煽动群众。他大力制造党组有宗派的謠言，說部里“經常三三两两决定問題”，把一九五六年“八大”學習会上对他的批判說是以高副部长为首的“宗派集团”有意的整他。他对部党组成員进行人身攻击，背着领导和組織在宗派集团中醞釀改組部的党委，同时阴谋控制部的人事部門。

(二) 積極包庇右派。利用职权，操縱組織，为已經暴露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掩盖罪恶，或減輕罪責。他对右派分子王

能賄的反動信密而不宣，排隊中又把他划為“左派”。人們揭發右派分子黃滌塵的反動言論，他不加理睬，最後也把他划為“左派”。在研究右派分子樓惠芳的問題時，他主張只能划為“中右”。黨內右派分子何志樞也是划為“中右”，許多黨員認為何志樞無論如何是不夠預備黨員資格，堅持取消他的預備期，但在劉樂川等的操縱下，不顧其他同志的反對，支部仍然把他留在黨內。右派分子劉光世的許多反動言行也被劉樂川等所掩蓋，在處理中，他又極力主張由二類降為四類處理。右派分子兼反革命分子張燧，部五人小組按照中央十人小組指示精神認為應予開除、勞動教養，在征求供銷司支部意見時，劉樂川堅持按“中右”處理。並說：“張燧的言論只是發牢騷，不能作為右派言論”，又說：“他是一個老右派，你排他也是右派，不排他也是右派，算了吧！”。

（三）挑撥團結，製造分裂，玩弄手段。劉樂川利用水產部幹部來自各方的特點，進行挑撥，在領導人頭上划框框，把高副部長和張副部長分為“輕工業部來的”和“商業部的”兩個“對立面”，他把張副部長同意高副部長的意見說是“倒在高副部長那一面去了”。他用歪曲事實來挑撥水產部與商業部的關係，把水產部對供銷工作的檢查，說成是“否定商業部過去的一切”，並指使親信在群眾中散布。他在供銷幹部中暗中組織脫離水產部領導的非組織活動，在各地供銷系統內挑起對部和對地方黨委的不滿。他把支部組織作為反黨的工具，他的反黨言論和包庇右派等活動，大都是先在黨支部委員會研究討論過或作出正式決定的。

（四）全面反抗黨的政策和部的決定，製造獨立王國。近兩年來，水產部根據上級指示精神，對供銷工作作了許多決定，但劉樂川一向不貫徹執行。例如：水產部決定供銷企業下放，劉樂川抗拒了一年不執行；水產部在執行國務院決定開放國家領導下的水產品自由市場時，劉樂川初則消極抵抗，繼則到黃海、渤海

沿岸省市大肆宣传放任不管，提倡“随行就市”，主张“乱它一年再说”。水产部决定水产供销企业不搞零售，以免和地方有关商业部门发生矛盾，而刘乐川则在各种会议和群众场合上大作扩大零售的宣传，并亲自到天津、浙江、上海等地指示当地公司经理开展零售，经地方党委反对，而仍然坚持。在海上收购、划片供应、利润等问题上刘乐川也同样采取反抗的态度。

刘乐川在党的帮助教育下，也曾作过一些工作，也曾受到党的提拔，但他思想上有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平时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屡教不改，把党的提拔看成是实现个人野心的机会，把为党工作看成是升官的手段。从一九五六年末当上部长助理以后，即开始对党不满，到处发牢骚，讲怪话，进而对党抱着仇视的态度，一直走上反党的道路，堕落成右派分子。

刘乐川在斗争中态度是极不老实的，猖狂的，当被揭露之初他就在司内宣布：“我们不是躺下了，而是站起来了”，继续鼓动群众向党进攻，接着三次与邵春三订立攻守同盟，抗拒交代。以后虽然在大量事实面前，作了几次检查，承认了某些错误，口头上表示愿意悔改，但仍然是避重就轻，没有主动交代任何材料，并无真正悔改的表现。

鉴于刘乐川的情节严重，拒不悔改，决定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按二类处理，监督劳动，并建议撤消其中共“八大”代表资格。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子敬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六日)

张子敬，男，四十四岁，山东单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入党，现任农业机械局局长。

一九三九年在湖西地委肃托事件中被停止党籍，一九四五年恢复。土改时贱买群众斗争果实，并利用贪污的过期粮票一千五百斤，买大车一辆，受劝告处分。一九五一年在天津农垦局工作时与特务分子索影、嘉璇乱搞男女关系，并相约保守秘密，后因对方自杀未遂，交出证件，张才承认，受劝告处分。三反时，因贪污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被停职反省，因病住院未作处理。

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张子敬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附和并支持右派分子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撤销党委书记、副书记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职务的主张，并且认为“部长听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司局长听部长的，这样农业部是否需要存在？”他在幕后为其他右派分子出谋划策，煽风点火，公开向右派分子表示志愿当“参谋”。包庇右派分子杨锦湖，打击积极分子，阻止反右派斗争。平常一贯对党不满，向党闹独立性，经常在非党人士面前散布他过去在“湖西肃托事件”中曾受冤屈，从而说明党在肃反中的错误，影响很坏。在局整风动员会上说：“八大”后阶级斗争消灭了，资产阶级是阶级兄弟，民主党派是兄弟党派。在反右斗争中态度不好。

根据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决定开除张子敬党籍。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孙森甫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孙森甫，男，现年四十五岁，河北省武邑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一九三一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被捕向敌人自首，并在北平晨报上登过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启事。一九三八年又混入党内，现任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党委副书记。

孙森甫虽入党多年，但始终感到自己曾经在历史上自首变节，平时总怀疑党对他不信任，因而，离心离德，对党不满、面目灰色阴暗。在人事司工作期间，与司内一些政治不纯、历史不清的人形成小宗派，互相吹捧，对领导阳奉阴违，在执行干部政策中表现了“不问政治”的资产阶级倾向。他曾说：“老干部不行了，不能担当建设任务，应大力提拔青年大学生来代替。”又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谁还没点问题！”所以，用人不看档案，不加审查。俄文翻译史珊因其父亲是军统特务，未被批准出国，孙不满意地说：“人家父亲是军统，女儿也是军统吗？就不让人家出国！”对于保卫部门提出的将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而需要调出四十余人的意见，也一再拖延，不予处理。

此次整风期间，孙森甫又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纵容右派分子点火向党进攻，当部内大量出现反党大字报的时候，孙仍在司内提出“大鸣大放，迎头赶上”的口号，并暗中煽动写丑化党员的大字报；赞许右派分子要求撤销党委书记左叶和副书记谢文景的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职务的主张；他身为农业部党委副书记与统战委员，竟然同意农业部四个民主党派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及

民革支部要求參加整風領導的荒謬建議。

四月三十日在民主黨派聯席會上，右派分子說：共產黨有“三付鏡子”（看近不看遠的近視鏡，看人一團黑的墨鏡，找小毛病的顯微鏡）和使用黨外人士的“三個頭”（用時磕頭，不用時搖頭，用完后殺頭）。孫說：“三付鏡子”、“三個頭”使我們很清醒，教育意義很大。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孫又違背黨的指示，按兵不動，推遲和阻礙了人事司內的反右派鬥爭。

以上事實說明，孫森甫已經由平時的對黨懷疑不滿和在執行幹部政策中的一貫右傾而墮落成為反黨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根據黨對右派分子的政策，決定開除孫森甫黨籍。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普通班 第七支部委員會關於極右分子 徐盈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簡 歷

徐盈，四十四歲，山東省德縣人，家庭出身小資產階級，本人成份學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前長期在大公報作記者，在入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以前，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副局長，現為高級黨校普通班第七支部學員。

二、主要錯誤事實

（一）徐盈有系統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即“新聞自由”、“同人辦報”和“尊重報人”。他認為現在的新聞“不自由”，

主張新聞不需經過黨委審查，黨組討論，要求記者採訪不通過組織，報道應當“暴露陰暗面”，“而且不要怕片面”，並且說中國新聞的傳統，就是“放”，就是“反”。他反對新聞事業的計劃性，主張自由辦報、自由採訪、自由發行，到處稱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徐盈的所謂“同人辦報”，“尊重報人”就是主張辦不要黨領導的報紙，要尊重像徐鑄成、儲安平、王芸生等所謂“老報人”，並且應給以不受干預的權力。總之徐盈認為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新聞政策、辦報路線以及有計劃的統一管理等都是錯誤的，應在新聞事業中，全面恢復資本主義。

（二）徐盈參予章、羅聯盟在新聞界的右派集團，充當新聞界右派向黨進攻的幕後“軍師”。徐盈與彭子岡（徐妻）兩人，跟儲安平、浦熙修、徐鑄成等人，互相串連活動，密謀篡改光明日報、文匯報的政治方向，並且“與王芸生勾結，對大公报也要撈一把”，奪取黨的領導權。在“鳴放”期間，徐盈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跟儲安平一起，商辦報方針、改版方案、派人到九大城市“點火”、成立小組，以及排擠報社內全部共產黨員，重用右派分子等一系列反動的計劃與步驟，都進行了密謀。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當晚王芸生、浦熙修等又齊集徐盈家，共同研究了對策。

（三）反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否定當前階級鬥爭的存在，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說：“不懂理論，學了理論，拿到就用，要犯‘教條主義’，學多了就會向修正主義發展”。他認為“英美有政治民主”，中國的民主黨派，應該和共產黨“平起平坐”，“不必受共產黨領導”，“不必改造”。並認為階級鬥爭已經過時了，目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只是人與人的關係”。他贊成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認為國務院“應有幾個非黨副總理”。他反對黨領導科學和大學學校。

（四）徐盈否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

他不承認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他到农业展覽会去，专找农业增产数字有多少“虛假”，还到党校附近的大有庄进行了調查，訪問了一个“单幹”戶，說这个“单幹”戶“地里活作的好”，“合作社不务正业，所以不参加”，以此来宣传“单幹”的优越性，他在調查以后为两个劳改的地主“抱不平”，借口他們曾作过頤和园导遊，認為应把他們調回頤和园，使之“人尽其才”，他也同意李景汉的北京郊区“調查”，怀疑“今天不如过去”。徐盈埋怨党的肃反政策和对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認為：“把他們斗得太厉害了”，“他們心中害怕”，“写不出文章来了”，党应給他們“学术自由”。徐盈对計劃供应和取消蔬菜自由市場也極其不滿，認為这是“物資少了”等等。

(五) 有計劃、有預謀地利用整風机会，攻击党校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脱离群众”，污蔑党的高級幹部已“腐化堕落”。徐盈認為“克服三个主义需要用‘棍子’，就象列宁反对馬赫主义，对黄鬼綠鬼要一棍子打死，勢不兩立”。他无数次攻击党校是“教条主义”，並且說应請党外社会名流参加教研室。他污蔑党校对郭大力教員是“宗派主义”，並且特地訪問了郭教員的家屬，进行挑拨，更企圖借此煽动同學們向学校进攻。同时他还到永利农业社“調查”农民对学校盖房子“佔用土地的意见”，“調查”学校幼兒園的經費开支情况，來說明党校“脱离群众”。他还到衛生科、儲蓄所等地方进行一系列的“調查”，甚至硬把学校附近小舖的營業額，也跟高幹的“特殊腐化”联系起来。更恶毒的是与其妻子彭子岡两人捏造事实，由彭子岡出面向校长写信进行攻击，並且別有用心地提出整風应以整“校風”与高幹的“腐化堕落”为內容，企圖借此轉移反右派斗争的鋒芒。

三、錯誤的根源

徐盈之所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是有其社会、

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个善于伪装与进行政治投机的个人野心家，就是一贯崇美亲蒋反苏反共和忠实于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

徐盈在学生时代，即深受“平民教育会”的影响与奴化教育，形成他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技术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一九三七年他进了大公报社，投靠国民党政学系，积极为政学系的“政绩”和反共作宣传，并且一连写了“旧匪区的新印象”等反动透顶的通讯多篇。当他一九三八年混入共产党以后，曾与扫荡报记者军统特务王乃昌、伪中央社记者田玉振成立“记者联谊会”，并且于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连续著文为蒋介石、蒋经国、韩德勤、杨森、张群、吴鼎昌、薛岳等反共头子歌功颂德。咒骂“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等，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徐盈更多次进行恶毒的反共宣传，同时为“第三条路綫”宣传。他曾污蔑共产党“不守信义”，歌颂国民党的“建设”是“养鸡取蛋”，骂共产党的政策是“杀猪拔毛”；并且曾宣传美军到东北，“不是为了参加战争，而是为了播种和平”。在这个时期，徐盈是储安平、费孝通、王铁崖、楼邦彦、张东蓀等“观察”小集团中的一员，跟钱昌照、吴景超、肖乾等“新路”集团的关系，也极深厚，特别跟胡适的往来极为频繁。这些人都是以“第三条路綫”为标榜的，徐盈除大捧胡适、李宗仁并且宣扬他们的主张外，还大捧司徒雷登，宣传他的“中国需要新革命运动”的反动谬论。这样徐盈除以国民党政学系做后台外，又多了个“第三条路綫”的靠山。

徐盈一贯为官僚资本、资产阶级辩护和吹嘘。他认为官僚资本应该叫作“国家资本”，把官僚资本的垄断，说成是：“有计划的工业化”，把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主权的行为，说成是“利用外资”，“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对资产阶级同样歌頌备

至，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任何銅牆鐵壁也阻止不住的。他把資本家都形容成是“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偉大實業家”。一九四八年更刊發單行本“當代中國實業人物志”，為張嘉璈、翁文灝、盧作孚等買辦、官僚、資本家捧場頌揚，而徐盈自己，一九四七年又成為大公报和“觀察”的股東了。

徐盈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天津解放以後，仍然堅持他的反動立場，始終與黨對立。如北京解放初期，他不僅未給黨提供旧新聞廣播事業的一點線索，還企圖探听我們接收的策略步驟。天津解放以後，他不滿意黨把天津大公报改為進步日報，而企圖把進步日報改變成為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服務的報紙，並且企圖利用銀行貸款，進行新聞紙的投機。當這些行動受到黨的批評時，他就更加懷恨，認為他是“有職無權”，“處處不自由”。

徐盈的入黨以及他為黨做的一些工作，只不過是為了掩護其反動面目而已，二十年來他的反動思想與立場，從未有過改變，甚至在全國解放前夕，仍然認為“共產黨管理不了中國”，將和“李自成一樣的要腐化和失敗”。特別是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和“匈牙利事件”以後，他就以為蘇聯“不行了”，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行了”，而且中國“也要變”，因此他就不顧一切地參加了資產階級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復辟”活動。

四、對錯誤的態度

反右派鬥爭以來，徐盈一直避重就輕，裝老實，裝糊塗，在關鍵問題上狡辯抵賴，企圖蒙混過關。但在同志們的揭發與批判下，他在事實面前，也不得不低頭認罪，承認他一系列的反黨活動罪行，並願意重新作人，可是他在重要關鍵問題上，如新聞界右派集團的具體活動和他個人野心方面交代的還不夠徹底。

五、結 論

根據以上事實，說明徐盈是一個採取兩面手法，披着黨員外

衣，一貫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混入党內的階級異己分子。远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已表現了他的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面目，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就更加仇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就更露骨地大肆活动，成为資產階級右派向党进攻的内应和新聞界右派集团的“軍师”，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据此，他是一个党內的極右分子。

根据以上結論，支部一致通过对極右分子徐盈給予开除党籍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財政部整風領導小組 对右派分子齐佩軒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齐佩軒，男，四十六岁，河北平山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小学教員。共产党员。原任財政部国防司司长，一九五六年到高級党校学习。

齐在一九二八年曾参加国民党，一九三二年脱离关系，已有結論。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在鳴放期間，为河北石家庄市郭幸光貪污案件呼冤翻案，並查出他在一年前給中央和有关領導同志写了四封匿名信，在这些信件里，对党和領導进行了恶毒地攻击。

(1) 他說：“郭幸光实际上沒有貪污，是公私不分”，誣称郭幸光案件是“冤獄”。

(2) 污蔑郭幸光是在河北省委指示下打成大老虎的。並把

領導打虎的幹部和積極分子說成是“別有用心，感情用事”，把這些人比作湯勤，說他們“比湯勤還壞”，“因為這些人把郭辛光打成了老虎有功，有的升了官，有的落個積極分子”。並污蔑造謠說：石家莊市委有宗派主義；定案結案不積極；不准郭向中央申訴；中央監委處理郭的申訴時“拖拉，官僚主義嚴重”；並無中生有地說：“這種例子在黨內不是個別的”，攻擊中央不能毅然決然的處理問題。

2，歪曲事實，他認為黨中央對一九五三年在財政工作上犯錯誤的有關幹部的處理不公平，他說：“×××同志受批評以後，卻坐了直升飛機，×××倒受了處分。”

3，反對黨的民主集中制，認為八大選舉辦法不民主。

(1) 說：“指名選代表就是不民主的表現，去年（一九五六年）財政部指名選八大代表是中央領導同志不民主，不從團結出發……”。並說他的意見可供九大參考。

(2) 攻擊中央負責同志，說：“××同志在糧食統購統銷中一句錯話——免不了死人的——有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之威”。

4，支持右派言論，攻擊黨的領導。

(1) 說：“國務院付總理那麼多，沒有一個民主人士，應該增加黨外付總理”。稱贊右派分子章乃器“有本錢”。說：“林希翎不是反革命，根據我們的經驗，反革命不會這樣幹！”。

(2) 他看了右派分子張軫對賀龍同志的攻擊後，就把我黨的高級幹部和黨組織的作風概括為“盛氣凌人，宗派主義”；他還借黨在肅反中對傅鷹的處理來攻擊我黨的基層組織。

5，否認黨領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確性和成就，懷疑糧食增產、農民生活提高，黨能代表農民利益。

(1) 他說：“合作化以後，農村問題嚴重：統購統銷有付作用；合作化冒進；社大幹部弱，當不了家；工農待遇懸殊，農

民生活苦，有病看不起，上不起学”；“从农民那里拿的多了些，农村老百姓普遍不满”；“农村不太平，我们专政是不容太平的，如不警惕，有流血的可能……”。

(2) 他认为现在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

(3) 他认为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数字不实，连一百亿斤也达不到，他说：“下边随便报上来的数字，领导上轻易相信了”。並要追查数字不确的责任。

(4) 他说：“工业化快了些，预算上积累多了些”。

二、在批判斗争后的态度：在斗争初期，态度不好，甚至大发脾气，谩骂给他提意见的同志；斗争后期，表示低头认罪。

三、处理意见：开除党籍。行政上降职、降级、降薪。

中共司法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极右分子王怀安的结论及处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王怀安，男，现年四十三岁，四川省自贡市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分学生，大学肄业，一九三七年参加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零年到延安后曾任延安市青年联合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法院审判员，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处被审查。一九四六年到东北后任过哈尔滨市法院院长、东北司法部秘书长，一九四九年调司法部任办公厅主任，党内任党组副书记。现为司法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兼普通法院司司长。王怀安入党后，隐瞒了他在一九三六年冬或一九三七年春会见川大军训主任刘某以及一九三九年未经党的允许会见川大校

长程天放（CC大头子）的政治历史問題，直至今年全国司法會議批判斗争时，他才作了交代。

王怀安是个徹头徹尾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司法部反党集团”的“軍师”。其主要右派言行：

一、全面的一貫的反对无产階級专政，篡改人民法院的性質和任务。他在起草法院組織法过程中把法院是“階級压迫的工具”篡改为“与一切违法現象作斗争的工具”，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幹部。在他所写的“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歪曲和扩大事实，說“站在法庭面前受审判的对象——刑事被告已由敌对階級分子旧社会渣滓占絕大多数的情况一变而为劳动人民占絕大多数的情况了”，企圖把敌人当人民加以寬縱。他把党对刑事罪犯的“惩办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篡改为“教育与惩办相結合”。他还把少奇同志一九五零年对律师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指示，篡改为“为被告服务”。強調律师防止錯案的作用，提倡律师以办刑事案件为重点，主张院长不能干涉律师办案，到处宣揚律师是检察院的“反对派”。在律师組織建設上積極主张一下鋪开。

二、強調“审判独立”，恶毒的攻击党的領導，污蔑党有“惩办情緒”。他說：“党自执政以来，就濫用专政武器，乱打一起，将已低头的人拿来再打；也将有历史污点的人、甚至思想落后的人拿来狠打，有专政过头的。”在他写的“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公然煽动“司法机关必須坚持原則，依法办事”，“对来自某些幹部和某些部門的惩办情緒的要求不要迁就”。他污蔑“党委对业务不够熟悉”，並利用講課和检查工作的机会到处煽动法院幹部“不能当豆腐院长”，“要有包拯、况鍾精神”，律师要“骨头硬”“有胆量”。王怀安对党委审批案件非常反对，为了寻找反党根据，拟制調查表調查党委錯批的案件。在四川大邑检查工作時，他污蔑大邑县委領導的鎮反运动是一团糟、“拒絕坏人向善，树敌过多”“坦白不从寬”“立功不

折罪”。攻击审判人员不执行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合议庭”，疯狂地辱骂司法干部“不守法”“无法无天”“独裁”“野蛮”剥夺被告辩护权，“品质恶劣”“加油添醋”“为了戴稳自己的烏紗帽，求得一时的安宁，不惜让别人坐牢”。他还污蔑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公、检、法统一对敌的作法是“一杆子打到底”。

三、狂妄地攻击党中央。他恶毒地说“错案是普遍的，如非来自中央那才是怪了哩”。他攻击镇反“运动指导有问题”，是“主观布置数字，扩大敌情，致下边有的为了凑数，硬找专政对象”。

四、拚命地攻击公安，说“审判机关解决具体案件的作用没有发挥，案件的命运掌握在公安，似乎审判是手續。”

王怀安在斗争中的态度及表现：

从去年九月后，党一再让他好好检讨，他却狡猾低赖，企图蒙混过关。经四届司法会议及广大干部的揭发，彻底暴露了他的右派面貌。经群众多次批判，王怀安已经低头认罪，愿意悔改，写出了检讨，向党请罪。

对王怀安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王怀安是一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自党审查他的历史后，就一直对党仇恨，但表面上却伪装积极，骗取了党的信任。公然扛着旧法大旗，认为自己是“法律内行”和“权威”。对待干部恶霸作风，稍不如意，即加训斥和攻击，整得干部伤心流泪。最近几年给郑绍文、陈养山出谋划策，充当“军师”，更加疯狂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参加司法会议的同志反映，他比下边司法干部中的右派要恶毒的多。王怀安在检讨中也承认自己的反动思想是系统的，罪行是恶毒的，流毒是深广的，是一个极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依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共产党员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党籍”的指示开除其党籍，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机关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按二

类“监督劳动”处理。

中央批示：王怀安是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中共監察部第一司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極右分子李沐英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

李沐英，女，五十五岁，湖南省岳阳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六年入党。反右派斗争前任監察部一司司长，党組成員。三十余年来，党培养教育她，委之以重要的工作，而她却一贯对党不满，散布反党言论。从李沐英的自传、平日的言行和同志們揭發的材料証实，她的反党行为，是一貫的、全面的、系統的，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極右分子。

李沐英反对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否定社会主义建設的成績：她誣蔑历次运动是“只要任务，不要政策，宁左勿右”；搞运动“根本不是办法”。她說我們在“各个时期和各項工作中都是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国家化錢不少，而群众受益不多，甚至反而受害”。她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幹部政策和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反对粮食統購統銷和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她誣蔑領袖，誣蔑中央說：“集权时，中央什么都統，分权时，則放任自流”。他說領導不民主，“集中近乎专制”。她認為服从党的领导和坚持原則是对立的，主张監察机关和党分庭抗礼，並誣蔑党組織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是“看中央的眼色行事”，“生怕违反领导意图”。她将国家幹部說成是爭权夺利，互相排挤和欺压群众的人，說积极分子是“品質恶劣”的人，对这些人，他进行打击。

刁难，主张惩罚。而对反革命分子则千方百计的庇护；在旅大工作时，她将国民党骨干分子李际閔、逃亡地主彭一心，引进国家机关工作；在肃反时，为反革命分子尹恒、胡清华等辩护，向他们通风报信，并搜集不确实的反面材料，与组织对抗，企图否定这些人的反革命事实或减轻他们的罪责。

对于李沐英，党的组织和领导同志，曾多次对她进行教育、批判，并曾予以党纪处分，她始终拒不改正。当整风运动开始后，即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攻，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为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

中央批示：开除李沐英党籍，行政上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整风领导小组 对右派分子王善玲的处理结论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王善玲，女，三十八岁，山西省左权县人，家庭出身中农兼小贩，个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入党，现任劳动部工资局副局长。

历史上的关键问题：王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本人幼年亦系天主教徒。

主要反动言行：

1.丑化党内生活：（1）她说：不仅党群之间有墙有沟，党内上下之间亦有墙有沟。等级制度是产生墙和沟的原因。并造谣说：劳动部科员对科长，科长对处长，处长对司长，司长对部

长，層層有意見。（2）高級幹部特殊化，吃得好、穿得好，小汽車、小公館比国民党还多，真是小公館林立，小汽車川流不息。說高幹生活尤其要降低，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3）高幹換老婆之風盛行，比国民党作官的还坏，国民党作官的多妻还要养活，而現在高幹換老婆，丢了什么也不管。（4）党内存在着打击报复現象，有时不在形式上，而特別在調动工作，或評級的时候給小鞋穿，实际上是言者有过。

2. 攻击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政治运动：她說：（1）中央政策左右搖擺，工作忽左忽右，……一些运动初期总是反右，中間就左了些，后来又糾正。（2）土改斗争了知識分子。我認識的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同学，后来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关起来了，有的自杀了。据說那时在本地工作就危險，离开本地工作就好些。

（3）肃反工作准备不够，就拿劳动部來說，排队不仔細，結果斗争面很大，時間拖长，方式也有点过火。（4）国务院發言人說的話（关于物价問題答記者問——注）不符合实际情况，縮小了缺点，缺乏自我批評。硬說物价沒有漲多少，这是不說实話。

3. 对中央負責同志的講話妄加批評。她不同意康生同志所說一九四二年整風时，党就採取了“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認為“事实不是这样”，“估計过高了，夸大了成績，沒有自我批評，不能以理服人”。

4. 同情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言論，認為龙云所說幹部子弟学校学生生活特殊是事实，指責一〇一中学学生在报上反駁龙云的信“与事实不符”。

斗争中的态度：在反右派斗争初期检查很不深刻，后来当运动繼續深入，党組織指名要她进一步检查之后，态度較好，檢討比較深刻，表示誠意悔改。

处理意見：同意高級党校开除党籍的決定，根据高級党校的建議：因王善玲态度好，決定行政上給予降职、降級、降薪的处分。

中共北京劳动幹部学校委员会关于开除 右派分子罗青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

罗青、男、五十七岁，江苏江都人，出身于富农兼工商业者家庭，个人旧职员成份。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现任北京劳动幹部学校校长，系极右派分子。

罗青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前，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改组派江苏省会特委书记，石友三部八师秘书长等职。写过“在显微镜下的共产党”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反共文章。

一九四七年因伪造历史，贪污腐化，包庇帝国主义分子和地主，及反党反领导等错误，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全国解放后，包庇过反革命分子。

主要反党言行：

1. 积极参与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活动、吹捧右派分子陈达，为其人口论文主持座谈会，並修改资产阶级右派阴谋复辟社会学的六九会议记录，支持右派分子袁万在劳动幹部组织劳动问题调查研究组等非法活动。

2. 煽风点火、向党进攻。擅自在学校教员中抢先鸣放，制造声势，向党领导施加所谓群众压力；对右派分子蔡尚忠说：“你不是对肃反有意见吗？讲吧、我给你撑腰”。给领导上写信污蔑说：“在党中央各部及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部长级党员负责干部中，骄傲自满，用人唯亲，对中央报喜不报忧，工作上不称职。在党内不得人心者，太有人在”。

3. 极力包庇右派分子，打击反右派积极分子，不执行劳动部

領導小組指示在幹校抓緊時機大鳴大放，而按兵不動，並把一部分教員分散下廠實習，或回家探親。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在校作報告時說：“幹校還未發現右派分子”，“資產階級思想不一定全是反動的”，並打擊反右派積極分子，為陳達、袁萬等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行辯解。並為陳達代寫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檢討書。

4.歪曲黨的辦學方針，破壞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在幹校提出“為教學服務實質上就是為教員服務”，用所謂教員高人一等，用名譽、地位、物質享受拉攏教員。還說：“工农出身的老幹部，沒文化、沒用處，最好派到殖民地國家幫助那裡的共產黨和人民打游擊”。

5.製造宗派活動，破壞黨內外的團結。他常在教學人員中，散播流言蜚語，無中生有地把部的領導分成若干小集團；在幹校製造宗派活動。他在教員中散布說：學校主要矛盾是黨與知識分子的矛盾，是工农幹部與知識分子的矛盾，並說其他領導同志是外行，不能領導教學工作等。

6.羅青在一九五一年包庇贛南血案殘殺陳贊賢同志的禍首反革命分子倪弼，在整風期間替浙江馬文車（極右分子）呼吁處境不好，要求在北京安排其工作。

羅青的態度不老實，一面承認是右派分子，一面又到處寫信喊冤求情。一面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面不承認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機。

根據上述一系列的事實說明：羅青是一個混入黨內的官僚政客，階級異己分子，個人主義野心家，是個極右分子。對於羅青的處理，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經過幹校教職員支部大會通過，並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黨委會決定，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並建議行政上給予應得的處分。

中央批示：開除羅青黨籍，行政上撤銷其原有職務，留用察看。

中共對外貿易部機關委員會 關於开除右派分子郭超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

郭超，男，五十歲，湖南岳陽縣人，家庭出身貧農，本人成份職員。一九二七年入黨。一九二七年廣州暴動時被捕入獄。出獄後找到了黨的關係，後因逃回家鄉與黨失掉關係。一九二九年三月在鎮江恢復了黨的關係，七月又被捕入獄。一九三二年三月釋放出獄後回家，一九三八年恢復黨籍。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在延安黨校學習。以後歷任稅務局副局長，華北貿易總公司會計訓練隊辦公室主任，中央貿易部人事司處長、副司長，反右派鬥爭前任中國畜產公司副經理。

郭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要言行：

(1) 公開誣蔑和破壞黨的農業合作化政策和統購統銷政策。說：“據我了解，目前農村中沒飯吃的農民佔了五分之四。其原因一是定量太高；二是留糧不合理；三是農業社辦快了”。

“農民在搞互助組的時候，勁頭都很大，生活也過得富裕，搞了合作化，生活下降了”，“入社家家沒飯吃，單幹年年有餘糧”，“合作社搞得太性急了，有些冒進”。郭超還瘋狂地向中央建議：“從目前起，對農村糧食一定要放寬些，保證大家吃飽飯”，“對那些要求退社的可以進行慎重的客觀的審查……可以視情節批准個別人員暫時退社”。

去年四月，郭超返回湖南岳陽老家探親期間，曾接見了四、五百個農民，其中不少人是地主富農和上中農，郭超對五戶不滿合作化的富裕農戶說：“可以退社。如不讓你們退社，就可請願

喊冤，他們也不能把你怎样”。郭超曾为他表弟李巨清写信給乡人民委员会要求退社。他写道：“我同意李巨清退社，是否乡政府同意”。郭超还为地主劣紳李正国写信向乡人民委员会要回房子。由于郭超的慫恿和煽动，地富分子顿时耀武揚威地鬧起来了，要求退社，要回房子。当地主李正国沒有达到要求时，曾經煽动了七、八个落后农民企圖鬧事，並揚言不給房子就要打。

(2) 郭超造謠說：“农村中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人心动荡不安”，“現在真是搞得天怒人怨，怨声載道，十个人有九个怨”，“民有飢色，民有憂容，也还潛伏有憤懣之情”。“我在乡下接触过的农民不下四、五百人，說好的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其余多有意見”。並且在乡期間，公然为管制分子郭池生申冤翻案。郭超質問合作社的支部書記說：“为什么你們將他管制起来，这太不合法了”，致使管制分子郭池生驚張地說：“我再不服从你們限制了，再也不怕你們了”。

郭超还造謠說：“中国是否会發生波、匈事件，在城市看不会有，但在农村就不一定，农民似乎想动。在农村那个地方打了幹部、打了党员，那个地方就高兴。农村情况是不稳的”。

(3) 郭超誣蔑“日前乡社幹部是一些好吃懶做的人，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乡社幹部工作作风很坏，贪污很严重，比国民党还坏”。

(4) 配合其他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郭超写了一篇題为“答傻瓜同志”（即答右派分子，“傻瓜”是右派分子王書林的笔名）的大字报公开表示支持。他写道：“这不是个人的荣辱問題，而是党的生命問題，是六亿人民貧劣与富强的問題”。当右派分子攻击我們沒有法制观点时，郭超立即表示同意，並說：“现在比过去好多啦！过去在延安整風时沒搞清問題的人都要劳动改造。我在延安参加整風三年，由于历史复杂一时搞不清而整了三年，实际是劳动改造……”。当大多数党员对右派的进攻表示憤怒时，郭超立即提出“要反对变闹

的压制民主”，並說：“多数同志对群众的批評受不了，从对我自己提的意見来看，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憑良心，我們那个称职，……象王書林（右派分子）这样的人不是多啦，詞句冲一点有什么不好呢？”

經過两个多月群众性的揭發、批判，郭超的上述反党罪行完全确实。在真理和事实面前，他已經低了头。但其檢討極不深刻，強調“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有利于党，有利于整風，但从效果上看是不利于党、不利于整風”。

郭超虽然入党将近三十年，由于他一貫对党不滿，以至最后發展成为右派分子，这絕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远在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时，郭超貪生怕死就曾在街上喊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二次被捕后，承認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了领导人陈一亨和他的住址，（据郭說他供出陈一亨同志的时候，陈已被敌杀害了。另有两人証明与郭述的相符）並且写了一篇讚揚三民主义的文章。他对一九四二年党对他的审查，一直心怀不滿，入城后对他自己的所任职务也不滿意，对工作一貫消極疲沓不負責任。因此，为了純潔党的队伍，經中共中国畜产公司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通过，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郭超的党籍；我們完全同意該支部的决定。

中央批示：开除郭超党籍，行政上撤消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十一級降为十六級）。

中共第二商业部机关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华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朱华，男，三十五岁，地主兼商人出身，商人成分。一九四三年三月参加工作，同年八月入党。历任区助理员、区长、总务科长、机关商店经理、专区贸易公司副经理、冀东贸易公司副科长、华北合作货栈任秘书。一九五〇年因霉坏玉米的失职错误，曾受党内警告处分。一九五一年调任全国合作总社粮食经理部副经理。一九五三年任供应二局（现生产资料局）肥料处处长。一九五六年八月入高级党校学习，一九五七年五月任财会局副局长（未到职）。

朱华在整风鸣放期间是以两面派的手法向党进攻的。他在党校伪装积极，而到机关则纠合党内外右派分子、对党不满分子和肃反对象组成一撮反党力量，进行阴谋活动，出谋划策，蓄谋推翻党的领导，达到其个人野心的目的。是该局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

一、整风开始，朱即找生产资料局党内右派分子罗文辉（付处长）密谋数次，朱提出生产资料局的整风重点是“群众对党组织的离心离德”，“过去有威风的人，这次要挨一下，过去低着头的人，这次倒痛快”。他认为把过去的問題摆出来“姜紹奎的总支委员、支部書記都当不成了，通过这次运动一切問題都解决了”。他们为了煽动群众，对可以掌握利用的对象，都一一进行了分析，确定联系谁，如何联系，如何在鸣放中提問題。並教給罗进攻的策略“要看群众如何提意見，看领导表示什么态度，然

后再分析批判”；“提問題要在适当时机和适当的場合，要看領導的態度辦事”。鼓勵羅說：“你看問題客觀，有批判能力”，

“這次整風反不到你，這些問題也聯繫不上你”；“運動中有個規律，開始都得冒一點，三反運動中正是因為你堅持事實求是，才撤了你的職。現在大鳴大放，過去的問題是會重新做結論的。”但又囑咐羅說：“三反問題，你自己可不要提出，提了是站不住腳的。”朱在勾結右派分子羅文輝的同時，也曾與對黨不滿分子梁玉（因腐化墮落判刑一年，緩期二年執行，並受黨內留黨察看二年處分）四次密商改組黨支部和攻擊行政領導的問題。

朱、羅反黨陰謀被揭發後，朱為了抗拒黨的檢查，分別與羅、梁訂立了攻守同盟。並指示羅：“要積極參加反右派，以免領導懷疑。”

二、幕後策動右派分子丁瑞祥（肅反對象）、對黨不滿分子王中濤（其父被我鎮壓）、薄育華（肅反對象）、于仁德（國民黨員）等向黨進攻。大鳴大放時期丁瑞祥是生產資料局向黨進攻的急先鋒，丁的很多意見是取得朱的支持以後才鳴放的。朱鼓勵丁說：“我們能夠相互交換意見，這是我們的統一戰綫。”有些問題，朱指到那里，丁放到那里。于仁德對評先進工作者和評級不滿，朱對於煽動說：“局內處理這些問題和黨的原則是相違背的”，鼓動于大鳴大放。並要于向領導上說明“這幾年不是在消極抵抗，而是正常忍耐”，“你提出來，支部不敢找我”。朱並指示于鳴放這些問題時“要求主任、局長、團總支和群眾參加，要求組織上給你恢復名譽，對你重新評價”。肅反後朱與薄育華接觸少，鳴放期間，朱親自找薄到他家，朱說：“過去來往少是有某些客觀原因”，“希望今後多加聯繫”。薄對補助不滿，朱挑撥說：“對你的補助問題組織上有缺點，但我在裡面是很難說話的，想你可以諒解”。朱還煽動王中濤說：“這次整風我很輕鬆愉快，那些作風惡劣，做過見不得人的事的、有個人企圖的就會害怕。”因此，王更加攻擊黨支部有宗派，認為朱受了“屈”，並

積極向群众传播。

朱华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反右派中，查出他隱瞞地主出身，和商人成分；偽造学历和入伍、入党時間；隱瞞入伍前參加日偽新民会受訓，並为新民会監督民工挖封鎖沟和充當愛护队聯絡員的一段历史。朱华在參加工作后一貫堅持与党对立的立場，政治品質極端恶劣。他在十二地委任总务科长、机关商店經理时，曾貪污四、五千斤小米，还向敌区販粮走私，曾用槍威胁群众，並毆打村农会主任。一九四八年还用貪污粮款貸給商人生息。他在农村工作期間，曾四次包庇地主逃避农民斗争。一九五〇年他在华北合作貨棧时，介紹有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參加工作，並視為亲信。有意識地为章田隱瞞三青团員身分，介紹入党。朱华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非常严重，一貫驕傲自滿，目空一切，对領導上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別人，抬高自己。一九五三年粮食經理部改为供应第二局后，焦玉波同志任副局长，他任肥料处长，朱即認為业务都是他搞起来的，到处拉拉扯扯，制造糾紛，並惡意地損害焦的領導威信。一九五三年年終鑑定和一九五五年检查支部工作时（当时朱任支部書記），曾对其进行过批評，后即选姜紹奎同志为支部書記，便極表不滿。整風开始后，利用整風的机会，进行了反党活动。

根据朱华的反党言行，在整風中暴露的历史情况及政治思想品質看来，朱华实际上是一个混入党內未經改造的地主、資產階級分子。除依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則，在行政上給予撤职处分外，經生产資料局党支部大会通过，部党委会討論决定，开除其党籍。

中共衛生部机关委员会 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齐仲桓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齐仲桓，男，現年四十九岁，一九三七年参加新四軍，一九三八年逃跑到重庆、昆明等地，一九四一年又回到新四軍，一九四二年入党。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衛生部部长助理，部党組成員。

衛生部党組織在整風第四阶段的后期，揭發和批判了齐仲桓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罪行，認為他是混入党內的階級異己分子、極右派分子。他的罪恶事实如下：

一、反对党的领导，認為外行不能领导內行，在几項重大的衛生工作方針政策上，一貫的和党对抗。党提出“政治掛帥”，齐仲桓認為政治不能领导业务，要政治为业务服务，宣揚“搞好业务就是最好的政治”，“衛生部不是政治少了，而是政治多了，技术少了”。主張衛生部应請“专家”来担任领导工作。

党的衛生事业的基本路綫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开展六亿人民的衛生运动。齐仲桓則是反对党的领导，不要群众，技术至上，单纯依靠专家和专业机构。如在防疫站問題上，党組主張：为了便利統一领导、密切結合以及更好的發揮医务人员的力量，基本上应以綜合机构为主，开展群众性的衛生防疫工作。齐則坚持主張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种疾病的防治机构分別建立，从省到县一竿子設到底，专业多、分科細，着重搞技术，不作群众衛生工作。为此长期和党組相对抗，不听党的話。为了抗拒党組，竟在右派向党进攻时，召集所謂“专家座談会”（其中不少人是有派分子）座談防疫站問題，寻找反党資本。一九五七

年六月齐参加卫生部鸣放会后，对右派分子进攻卫生部的言论大加赞扬，要党组进行“全面检查”，和右派的进攻相呼应。

在医疗预防工作上，一九五八年党指示要以医院为中心开展预防工作。党的这一指示对改革过去卫生机构的治病与防病分割的不合理现象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齐却公开抗拒，到处散布不满情绪。

在节育问题上，齐仲桓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观点篡改了党的计划生育的精神实质，认为人多是灾害贫困的根源，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全国节育工作彙报会议上宣扬这种反动观点，极力主张妇幼工作大跃进就是开展节育工作，提出要“恒定”中国人口，实质上是使中国人口走向减少和灭亡。

齐仲桓还利用卫生部的机关报——健康报发表了很多与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相违背的社论和文章，引起了下面的思想混乱。

齐仲桓对中央决定体制下放的方针也进行抗拒，他说：“卫生部直属单位下交不是发挥地方的独立性与积极性，是丢包袱的思想”。并阻碍党组有关下放机构的决议的贯彻执行。

齐仲桓对于党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的执行上也是阳奉阴违。如一九五七年注射脑炎疫苗发生了重大的死亡事故，党组责成他负责检查处理。但他却极不负责，致使这一关系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的重大问题拖了一年，既没有作出结论，也不向党组报告。

二、齐仲桓攻击、污蔑党组领导，制造党的分裂，破坏党组团结，进行阴谋活动，企图篡夺党的领导权。齐仲桓的反党手法是阴险毒辣的，善于伪装自己，玩弄两面手法，他常用所谓下面的意见来攻击党组说：“卫生部不重视业务，党组不解决问题，不起作用，卫生部可有可无”。他对国务院也进行了恶毒攻击。

在整风运动中齐仲桓借机煽风点火，向党组进攻，企图整垮党组。整风运动初期，他一直在党组会上散布对党组整风“没有

信心”，要求“中央、中宣部派人来领导”，一面对攻击肃反与部里不重视业务的右派言论大力赞扬。在整风大鸣大放初期，以及反右斗争期间，齐仲桓利用职权，曾在北京及上海召集了两次所谓“专家座谈会”，支持卫生界中的右派言论，向党进攻。齐仲桓在当时已经做了卫生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幕后策划者。

三、一贯排斥打击老干部，任用坏人，培植自己的势力，与党分庭抗礼。齐仲桓在中南卫生部工作期间，安排了大批国民党卫生署的官员、政客。在中南地区各省市卫生机构中他也安置了不少国民党的卫生官。这批人大部分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有血债，民愤极大，有的在解放后群众曾要求斗争他们，但都被齐掩护包庇。许多科长、科员也是由四面八方搜罗来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嫌疑分子。当时中南卫生部有“国民党管共产党”的说法。

齐来卫生部后，还多方设法推荐他在中南卫生部的心腹来卫生部工作。肃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斗争后，齐对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仍是十分重用。

相反，齐仲桓对忠实于党的老干部却一贯进行打击排斥，污蔑老干部是“土包子，怎样拉屎都不知道”。齐对党的干部工作和保卫工作也十分仇视。

此外，齐仲桓在生活作风和道德品质上也极其腐朽堕落。

齐仲桓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在思想上有其系统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在政治上一贯的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在组织上一贯依靠国民党卫生部官吏，包庇肃反对象、右派分子，打击老干部，挑拨离间，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篡夺党的领导。其性质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分子，中共卫生部机关委员会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决定将齐仲桓开除出党。

中共辽宁省委员会第八次 全体會議关于开除坏分子、 右派分子阮途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通过)

阮途，原名阮社泰，男，四十五岁，安徽省銅陵县人，汉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旧職員。一九三五年曾在无錫市万源染織厂当工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鋤奸科員、科长，軍区保衛部副部长、省公安处副处长、省公安厅厅长、东北政法委员会秘書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今任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内是省委委員、省监委候补常委、省检察院党組書記）。

整風运动中，經同志們揭發，並經組織調查証实，阮途有包庇与放縱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行。其主要事实如下：

（一）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分子。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一年，正当第一次鎮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期，阮途利用身为辽西省公安厅长的职权，包庇从其故乡为逃避鎮压逃来辽西的亲属、同学等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达九名之多，其中三名反革命分子是阮途亲自盗用公款东北幣近两千万元接来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和逃亡地主来到錦州之后，即亲自向阮途介绍了反动身分，阮途却故意替他們加以隱瞞，将七名反革命分子和一名逃亡地主，私自介紹安置在我厂矿机关内部，有些甚至当了幹部股长、劳改队管教幹事。一九五二年阮途接到銅陵县公安局来通报追查这些反革命分子之后，竟私自将通报隱匿起来，繼續加以包庇，給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損失和極坏影响。几年来曾多次被检举，阮途始終对

党进行欺騙。

(二) 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篡改检察机关性质，为反革命分子翻案。阮途自从担任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以来，即从其反动立场出发，多次假借传达中央、最高检察院指示名义，贩卖个人私货，散布反动论点。一九五六年他公然在检察干部会议上造谣说：“中央负责同志指示：检察院、法院两院要保护反革命”，“法院没有判决之前，不能以反革命分子看待，不能叫罪犯，应该叫被告”。而且说：“不能认为党委已批准定案就不会出问题了，要在通过检察院履行法律手续这一关口时闹住。……”一九五七年又捏造说：“今天刑事犯罪性质有所改变，因为都组织起来了，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因此今后打击刑事犯罪不能搞运动了。……”他以这些反动论点，在实际上篡改了检察机关性质，极力将检察机关的锋芒指向人民内部，处处设法干涉公安机关的业务活动，束缚公安机关对敌斗争的手脚，甚至将检察机关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和党对抗。

阮途在任省委肃反五人小组定案组长期间，也曾多次在肃反干部中散布：“要保护反革命”，“历史罪恶不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参加我们工作多年了，现在把他们定为反革命分子，对我们不利”等反动论点，极力为反革命分子辩护。阮途根据这些反动论点，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撫順市检查肃反定案工作时，一次即将该市已经正确定案的十五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提出翻了案。同年十二月下旬，又乘省委五人小组定案组原主持和参与定案的专职成员不在时，利用履行法律手续这一关“闹住”，将原已正确批准定案的八名反革命分子，又亲自主持重新定案，全部翻了案。

一九五七年夏，阮途公然反对省委关于在十个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的决定和对检察机关有倾向的批评，並捏造事实，到最高检察院座谈会上作假汇报。六月間返省后，便在全省各市检察长会议上，以其自己的反动观点，篡改最高检察院指示，明目张胆地

与省委分庭抗礼，污蔑与反对省委的决定和批评。同年八月，省委四次全会，曾对其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阮途竟污蔑省委对其批评是“打落水狗”。在今年六月下旬开始的省委扩大会议上，许多同志对其错误作了进一步揭发批判，阮途反而制造流言蜚语，企图对积极揭发他错误的同志打击报复。省委扩大会议后，又经过省政法联合党组扩大会议与全省政法干部会议及这次省委全会，进一步对其错误耐心而又严肃地加以批判，阮途始终毫不讲理，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百般抵赖，态度十分恶劣，毫无悔改之意。

根据上述事实，充分说明，阮途是长期混在党内并窃据重要岗位的坏分子、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省委全会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有关机关，撤消其党外一切职务。

中共辽宁省水利局总支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宗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刘宗义，男，四十五岁，原籍山西，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五年入党。历任工程股长、省农业厅副厅长、省财委秘书长，原任辽宁省水利局局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 包庇右派分子，同意并补充右派分子论点，保护右派分子过关。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局整风办公室即将封文炳列为右派分子，並提請領導小組討論決定。先後經過五個多月的時間，十幾次領導小組會均未定案。其原因是：由於劉宗義利用黨組書記，領導小組長的合法取權想盡一切辦法，千方百計地加以包庇的結果。其包庇封文炳不僅是為了了一個人，而是有意識的以此來保護所有右派平安過關。

主要事實根據有如下幾點：

1、欺騙領導，進行假彙報。

劉宗義對封文炳幾次鳴放的材料是非常熟悉的，但其在省人委領導小組會上當仇副省長詢問封的材料是幾次鳴放的？劉則顛倒黑白的回答說：是一次放的（實際是三次放的）。其所以這樣說目的很明顯，是企圖說明，一次放的內容有好有壞不左不右，可以不定為右派，以此為其開脫罪責。其次劉在同次會上又說：封的問題，我們黨組研究了，滕奇去北京，韓青同志不在家，蘆秉春、吉凱我們三人研究過啦，都認為不夠右派……。實際上韓青同志在家，吉凱同志來局不久，蘆秉春同志剛從北京學習回來，不了解全面情況，其所以不讓韓青同志參加會議，是因為韓青同志同意定封為右派分子，可見劉的手段多么惡劣。劉為了替反革命分子——封文炳翻案，曾放棄局內急待處理的工作，而親自到省委甄別定案組，為封翻案，並向該組的同志宣揚，封文炳如何進步，局領導小組成員如何片面……。千方百計的說封不夠右派，你們也不要定他反革命。當時定案組同志回答說：不定右派，是不是反革命，我們還需要研究。而劉回局以後，在領導小組會上捏造說：“定案組說啦，封文炳我們不定右派，他們就不定反革命。”

2、利用各種手段對堅持封為右派的同志進行壓制打擊。

劉宗義公開宣揚：“封文炳的材料，一不准分析；二不准加帽；三不經我許可不准上報。”有一次拿着封的鳴放材料對吉凱同志說：“老吉！你看這能夠右派嗎？將來非得好好整整他們不

可”，並对坚持定封为右派的同志进行威胁，說什么：把封定为右派是我錯了，还是你們对了？这样下去对你們沒啥好处，更会助长你們处理問題“主观片面”。同时曾不止一次的利用指示的手法，对整風办公室有关同志說：“你們处理問題总是有一种情緒，对人（指封）不能有一成不变的看法，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你們不要驕傲，別認為領導上重用啦！提拔啦！看問題就全面，就認為自己了不起啦。……”当首次會議研究封的問題时，韓青同志發言說：“这个材料（指封的書面鳴放材料）无头无尾，够不够右派还得研究。”而刘竟有意識的在同次会上表揚韓青同志說：“韓青同志看問題全面。……”但后来韓青同志根据材料的分析，認為封文炳应当定为右派，从此以后刘却在背后散布說：韓青同志怎样不好，如何无能。此外刘曾公开揚言：“水利局民主太多，集中太少了。……”並經常对有关同志談，“你們应好好看看十五貫”。言下之意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冤枉了封文炳。当有一次局整風办公室向省直党委反映局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时，刘却大加指責說：“你們反映情况通过我了嗎，讓省領導上知道對我們会有什么看法，你們反映情况應該实事求是的。（所反映的情况确是事实）刘所以这样講是企圖來說明我們向省人委領導小組所反映封的反动情况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以此来有目的地捏造事实，为封文炳辯护。

3、有意識的进行包庇活动。

刘宗义恶毒的攻击說：定封为右派，主要是滕奇同志的意見，因为滕奇同志先發言，所以其他同志就随之同意了。並曾不止一次地到处散布說：“滕奇最近看問題有些片面，並帶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緒”。有一次找王兴玉說：“我讓你和滕局长到統計局去看中右标兵材料，不是讓你走形式去了”。这主要是因为王兴玉同志根据中右标兵情况仍坚持定封为右派，而引起刘的不滿加以指責。又对韓青同志說：“对封文炳這個問題，我們应很好的考虑，我是要坚持，不坚持我怕犯錯誤”。言下之意是告訴

韓青同志不要再堅持定封為右派，如果再堅持將會犯錯誤。以此來有計劃的威脅領導小組成員，達到孤立滕奇同志和包庇封文炳的目的。更為嚴重的是，當水利局黨組決定在水利局全體幹部中開展大鳴大放時，劉竟利用黨組書記合法職權，借故開水利會議，有意識的阻止鳴放；並揚言“是省長同意”的，經再次追問無言可答，可見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右派分子平安過關。

4、同意並補充右派分子封文炳的反動論點，劉公開說：封所放的材料是有所指的，是一種對組織上不滿情緒，那些問題放在你們那個黨員科長身上也是一樣。他不滿是由於我們工作上有毛病給造成的。同時對封的反動論點都條條作了安排。說什麼：我們提拔幹部有的確實提拔快了，甚至越級提拔了，有的提拔後，就送黨校學習。這些事實是有的，怎能讓封沒有意見呢？和他一起參加工作的，有的當了科長、處長、主任，他是個秘書你們還給弄沒有了，放在誰身上也會有感覺。封文炳攻擊我們社會制度說：“肅反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呈現着冷若冰霜的現象”。劉則說：這是指本人講的，由於其肅反被鬥，確實和同志的關係不如從前了，如無緣無故的就給他降級，怎能讓他沒有意見呢？封說：原具有活潑亂跳性格的人，肅反後也郁郁不樂。劉又給安排說：這是指其愛人王瑤說的，封說：“有的黨團員為了討好領導加鹽加醋的向領導反映情況”。劉說：這個問題我們也確實有這樣的事，封說：“肅反過左”。劉又給安排說：“我們向省委報封的結論材料時也確實把他說得不象樣子（事實並非如此）”。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大鳴大放初期，當整風辦公室負責同志向他反映，現在有人（指封）攻擊我們幹部政策說：“肅反幹部個個提拔，人人高昇是宗派主義”時，劉回答說：“人家有意見，還能不讓人提嗎？我們確實有宗派主義”。劉為了達到包庇封的目的竟無恥的在黨的支部會上說：“過去有個青年幹部×××因提拔太快，擔負不了任務自殺了。又有×××因提拔太快，犯了錯誤最後槍斃了。……”。劉宗義其所以闊談這

些言論，主要是為封開脫罪責，從思想上同意封所說的，黨員提拔高人一等，不稱職的也可以提拔的反動論點。上述事實不僅証實劉完全同意了封的反動謬論，而且在某些方面還做了若干補充和發揮。

總之，劉宗義所以千方百計的利用各種卑鄙的惡劣手段進行包庇右派分子封文炳的活動，不僅是為封一個人，而是企圖包庇住封文炳可以保護茹丕顯、范智陞等其他所有尚未定案的右派分子（現均是右派）安全過關，掩蓋自己的反動面目以繼續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目的。

（二）為右派分子出謀劃策。

在去年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劉曾親自找右派分子茹丕顯到局辦公室談話，並為其出謀說：“你應當積極一點……”當聽到滕奇同志進來的腳步聲，談話沒完即中止了。又對右派分子封文炳說：“你不要有什麼顧慮，應當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據此可以看出，劉宗義已經成了其他右派分子的軍師。

（三）包庇反革命分子，鼓動肅反鬥爭對象上告，並有意識的煽動學生鬧事。

劉宗義在整風運動中親自對王積心（肅反鬥爭對象，有重大特務嫌疑）說：“你的問題不大，不要着急，組織上會給你弄清的，你要積極些，同時你可以給省委五人小組寫一封信，但千萬可不要說，是我讓你寫的……”。其次當省委五人小組批准封文炳為反革命分子，並判處三年管制，送勞動教養以後，劉對肅反幹部說：“等蘆局長回來（當時蘆在北京學習）讓他親自組織重新調查，看看封文炳到底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並指有關同志說：“對封的問題我們決不能草率從事，先不辦法律手續，我再研究一下”。公開的抗拒省委五人小組的決定，為反革命分子進行翻案。劉在肅反運動中也是千方百計地進行包庇反革命。如特務分子王鳳書，在肅反運動前先後已有五份歷史旁証材料証明該人定是一個特務分子。而劉看看王的材料以後硬說，王沒啥。並

为其辯护說：“思想傾向参加特务組織了，但因四平解放較早，实际还不等于参加”。当省委农林水口决定对特务分子王鳳書进行斗争时，刘不滿的說：“斗他我没有意見，看你們能斗出个啥来”。在肃反运动中，当許多同志提議应确定封文炳为肃反斗争对象时，和此次定封为右派一样他想尽一切办法，对上級和同志們进行欺騙說：“封工作一貫积极，历史是进步的”。更为严重的是对封自己交待的匪三青团区队长和模范国民党員的問題始終不相信。反之对特务分子王鳳書的假坦白則信以为真；在肃反运动中对封，一貫主张一不搜、二不斗。当肃反幹部提出应当搜查封文炳时，他蒙蔽欺騙的說：“我的意見不搜，以后我和‘口’里再說說，看他們的意見怎样？”但据事后刘根本没有把此問題向“口”里談过。而是以此来欺騙肃反幹部。在肃反中，当滕奇同志向刘反映群众对不斗王鳳書有意見时，刘却粗暴地說：“誰有意見，把名单拿出来”，以此来明目张胆的有目的地威胁肃反幹部。对反革命分子王化的处理刘也有意見，从思想上不同意，对組織有不滿情緒，因此則毫无根据的公开的为王化喊冤，說：这样处理他，今后技术幹部还能敢做工作嗎！言下之意是不应法办。在肃反运动中其为了包庇反革命而有意識的对肃反幹部宣揚說：“肃反是人命关天的事，誰給我搞錯了，誰就給我翻案去……”。在肃反运动结束后，刘还揚言：“我对肃反还有意見，肃反有些事得开会說一說，有些同志（肃反幹部）真不像个样子，封文炳根本不够反革命，硬往上定……”。其次，在一九五六年秋末因市建筑公司承包建筑的水利学校学生宿舍工程，沒有按时竣工，当时师生居住在席棚里，因此意見紛紛鬧的很凶，这时刘宗义对滕奇同志說：“派几个学生代表到公司交涉……”企图乘这混乱之机，煽动、組織学生去請願鬧事，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四）攻击延安整風运动，否定延安整風成績。

有一次和刘煥本（肃反五人小組、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同志

下乡，在旅館交談肃反运动情况时，刘宗义恶毒的說：“滕局长沒經過延安整風，不知道那个滋味，只知道整人家，不知道被人家整的那个滋味。我是知道那个味道，延安整風把我也整了，还弄个警察看着我。延安整風有些人被整疯了、傻了；有的被整得妻离子散……”。对延安整風的伟大成績則一字不提，有意識的进行污蔑。

（五）污蔑合作化运动，反对統購統銷政策。

刘恶意的攻击合作化說：“合作化好是好，就是农民沒有粮食吃……”，並說：“現在連人情味都沒有了，吃米、吃油都有数来个客人都沒法招待”。

（六）反对和歪曲党的幹部政策，提拔重用反、坏、右分子。

几年来，刘除亲自为反革命分子封文炳填写幹部任免呈报表外，还有經過他提名，已提拔或企圖提拔的幹部，其中就有反革命分子5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人；普通反革命分子1人；右派分子4人；党内坏分子1人；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4人。在併省前他就一直很重用这些人，併省后虽經同志們多次提出意見，而他仍置知不理，坚持重用。尤其在整風运动中，还企圖叫当时的疑似右派分子封文炳到新建之渾沙工程处担負領導工作。为了达到扶植反坏右分子目的而經常散布說：“他們这些人有能力，使用他們出不了大問題”。又揚言：“現在使用幹部还不能无产階級化；技术幹部提拔有“才”就行，当一九五七年春天局內有些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攻时說：技术員不能領導工程师，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謬論后，而刘宗义大加支持說：本来就是嗎？技术員怎能領導工程师呢？这实质刘宗义从思想上是同意了右派分子关于党天下的党論（我局土工試驗所长是技术員共产党员）。刘宗义对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不但加以提拔和重用，而且还經常有目的地美化他們說他們是德才兼备的好幹部。在群众中給反、坏、右分子树立威信，以阴谋扩大他的反党陣地，达到其反党的目

的。

(七)挑拨是非，打击报复，分裂团结。

在精简下放干部时，刘公开说：“封文炳你们给判了三年，还把他老婆放下去，这样作是有点太狠了”。在动员党团员带头报名上山下乡的大会上说：“我们有的同志参加了领导小组会，心里有了底，这不一定，不能这样想……”。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先放人家（包括其爱人冯英在内），将来我可以放你们。又说：“你们（指整风办公室）处理问题要正直无私，不能让人家说出话来，处理不公平，人家不服……”。其次，当确定普通反革命分子韩丽珠退职时，刘说：“他年青，工作还不错，还可以留下做点工作”。我们回答说：“退职是合适的，长期患病，又有些历史问题，否则将来也得清洗”。这时刘接着说：“那就算了吧！退职比清洗强”。在双反运动中刘为了打击一些同志而有计划的在群众中散布说：“滕局长无原则，武国强主观片面，韩青无能，刘煥本不服从领导……”。在精简下放期间找王兴玉同志谈：“陈尚义调出人事科，武国强主观片面，你应该照顾人事科工作。又对武国强同志谈：“陈尚义调水文站去了，人事科就剩你一个人啦，中央意见水文站要交了，你千万不要对陈尚义讲啊！”

上述同志均系整风领导小组成员。逢甲说乙，遇丙论丁，有目的进行分裂活动，从中挑拨是非，对领导小组成员实行拉打结合的对敌斗争方法。在一次斗争会后，刘公开的讲：别人揭发我没意见，那些人（指王大军、刘文华、谢振武、王恒太同志），过去我待他们比我儿子都好，这回还给我提意见，真气死人！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刘宗义的反党宗派思想已达到高峯，同时也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二、日常表现和斗争中的态度

刘宗义远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因当时与特务分子关

系密切而被列为斗争对象。一九四七年土改运动有意识地给地主隐藏物资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三反运动中因其岳父又被群众所斗，对组织表示不满。在伟大的肃反运动期间百般地包庇反革命分子又受到群众的严厉批判。这次的整风运动又施展其反动的才能，千方百计地包庇右派分子，为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开脱罪责。因此，刘宗义在政治上一贯与党对立。

在工作中常常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上，唯我第一，目空一切，存有极为严重的骄傲自大思想，对同志态度一贯的蛮横无理，冷酷无情，表现是盛气凌人，对党组织或局务会讨论的决议，他个人不同意就不执行。对全局性的工作计划、总结和重要报告，不但不过问，而且完全依靠其亲信反革命分子封文炳去做。对来自群众的批评、建议和同级干部的意见从不很好考虑，反而以粗暴的方式加以指责和拒绝。对上级机关的检查如提出缺点和错误时，就背后加以恶意攻击。对上欺对下压乃是刘的惯用手法。

刘的反动言行经过群众的揭发和斗争，承认了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但对一些事实仍百般地进行狡猾抵赖，拒不交待。后经群众的反复揭发对证和严厉的批判，在铁的事实面前，才不得不低头认罪，但至今交待的尚不够彻底，态度很不老实。

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标准定为右派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研究开除其党籍，请党委批示。

中共辽宁省气象局支部关于 开除右派分子李敬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敬，男，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高中毕业，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五区黄庄村人，一九三九年四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辽宁省气象局局长兼沈阳中心气象台台长。

简历：历任区队长、教员、厂长、省府科长、区长、副县长、县长兼法院院长、东北气象处副处长、省气象局局长。

平时表现：在工作中很少对工作上的重大问题进 行 布 署、检 查、总 结，表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领导作风上独断独行，态度蛮横，家长式的领导，在召开局务会议上不是广泛地进行讨论，而以个人代替集体，对上级不请示不报告。长期利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如不顺他心的干部——张文立、陈光则进行刁难，以致最后排挤走；而对其亲信干部则无原则的提拔重用（如张彬、刘德浩）。违犯党的规定，丧失立场，私自录用人员有十人，其中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有杀父之仇严重对我不满的分子即有数人、亲属五人。一贯对抗上级领导，目无组织，当上级批评他的工作没搞好时，即散布不满地说：我是个黑局长。当上级检查局的工作时说：省委书记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同时在群众场合公开的说：支部的决定我可以不执行。在历次运动中一贯表现右倾和丧失立场，在镇反中对已被处理的反革命分子表现惋惜的说：这都是上级找到了他们的头上，点着了他们的名，我李敬认为过几年和平了，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工作。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右

傾被撤消了三反的領導職務。在辦公時間曾先後叫幾個女同志剪指甲，群眾反映極壞。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主要反動言行：

一、在群眾鳴放會上煽風點火，挑撥黨群關係，如公開煽動地說：“黨的整風方針，虽然是‘和風細雨’，我看用暴風驟雨也行”。又說：“對老技術人員和黨外人員，我是一貫重視的，而黨委強調‘政治可靠’‘歷史清楚’，結果把他們調來調去，不信任他們，這不是黨的宗派主義是什麼？”並說：“原省財委檢查總結是宗派主義的排內性和排外性，黨的宗派主義有兩重性，一是排內性、一是排外性；排內性比排外性更嚴重”。右派分子周琳說：“使用幹部有宗派主義情緒”，而李敬接着說：“這不是存在於一個人、一個單位，而是由來已久”。並說：“我們黨內也冷淡，沒感情”。在黨外人員座談會上說：“現在社會是不敢說心裏話，同志之間不親熱，沒人情，总觉得冷冰冰的”。並把黨員說成是“特務”、“狗腿子”。平常常說：“政治工作人員起不了好作用，政治工作盡背後嘀嘀咕咕，就知道匯個報，背後‘鼓搦’人，賣狗皮膏藥”。

二、否認黨對科學技術部門的領導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白帽子不能領導業務”。

三、攻擊肅反運動，否認肅反成績。說：“搞了一年肅反，佔了好幾個人，有什麼成績，能說對工作不誤嗎？”“如實事求是的說，肅反沒斗出反革命就不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常說：“肅反是沒事找事，勞民傷財”。煽動肅反被鬥分子齊惠民（右派）上告時說：“你有什么意見，你寫，只管提，我支持你”。在一次肅反對象座談會上說：“老齊你冤枉了，這純粹是唯心主義所造成的”。

四、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否認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說：“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進了，我們的事業計劃也冒了。工業、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面都冒了”。

五、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争，在斗争右派分子大会上，向大家宣布，要注意方式，和风细雨些。并为周琳（右派）策划如何过关。

并利用整风领导小组长的职权，包庇了张秉芝、齐惠民过关（已定为右派分子），并将张彬（右派）吸收到整风办公室。

李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揭发后的表现和态度：

反右派斗争中虽向领导上承认了错误，但检查不深刻，经多次批判后逐渐有所承认。但在关键问题上推脱责任。但在群众围攻下，才不得不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在斗争中的态度不老实，听到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则规定后，表示愿意悔改，到劳动中去改造自己。据此，李敬确系党内的右派分子。经过支部党员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全体正式党员十八名，参加会议的正式党员十二名，全体通过（本人也举手表示同意）。

中共东北工学院委员会 关于极右分子王铭勳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

王铭勳（曾用名太田章博），男，四十岁，一九四八年入党，台湾省嘉义市人，出身自由职业，现任东北工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机械系教授（三级）兼系主任，党内任沈阳市委候补委员。极右分子。

主要的右派言行：

1、王系机械系右派集团的为首分子，鸣放期间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党进攻，支持以排斥党的领导为目的的“改选中心组”

的阴谋活动，积极要求召开凌驾于党之上的具有行政权力的“教
职工代表大会”，积极带头闹事，支持并带头签名掀起“八十二
名教师签名请愿”的事件，签名请愿要求中央检查市委工作。并
当选为教师代表去向市委第一书记和省委第一书记请愿。

2、王铭勳是反党的“机械系大字报”社长，“机械系大字
报”煽风点火特别猖獗，在全院起了极大煽动作用。该报反党方
针，右派分子分工都经他同意，并亲自批改稿件“下一步怎么
办？”在其中加进“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执行上犯有严重错误”一
语。

3、本人怀有反党的个人野心。他散布“康院长（兼党委书
记）不懂教学，怎能领导教学，东工没有希望”，主张“沈阳是
机械中心，应该有个机械学院”，积极策划三系代表团到北京请
愿“脱离冶金工业部领导”等活动，并在教师和学生中散布对党
不满，煽动学生出大字报签名请愿。反右后他说：“这次是大石
头没搬动，反打了自己的脚”。

4、为右派打气，助长反党气焰。在鸣放会上煽动说：“我
们应当将斗争坚持下去，认识这次斗争的艰苦性”，给右派分子
打气，坚定右派的反党决心。

斗争后的态度：经斗争后基本上低头认罪，承认了一些反党
罪行，但交代检查不深刻。

处理的意见：经党委讨论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薪给
人员中的右派分子处分原则规定，王铭勳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表
示愿意悔改，本人在技术上尚有专长的极右分子。给以开除党籍，
撤销本兼各职，留用察看的处分，由三级教授降为六级副教授。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曾軍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右派分子曾軍原系本校普通班第二十二支部學員。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第二十二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曾軍的很多極為严重的錯誤，經過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學員的批判討論，業已徹底揭露曾軍的右派面目。第二十二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曾軍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過严肃慎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二十二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沈阳市委的意見，得到了沈阳市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二十二支部关于右派分子曾軍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曾軍，男，現年三十七岁。陝西藍田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延安入抗大，同年十一月入党。来校前任沈阳市物资供应局副局长。現为本校普通班第二十二支部學員。

二、主要錯誤事实

1、攻击污蔑和企圖修改党的幹部政策。曾軍在大鳴大放期間，污蔑“沈阳市委在使用幹部上有宗派主义，唯唯諾諾是好幹部，客觀上是这样”。他說沈阳市委“所謂幹部的德就是人云亦

云……。現在是人云亦云，上呼下應的人就是組織觀念強，好幹部，對那些敢提意見的，就是主觀片面，驕傲自滿，組織觀念不強。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他污蔑“有些幹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像豬一樣”。他攻擊幹部級別制度，說：“不能從級別上看誰的質量高低”，“職位、級別不能決定智慧真理”，“中央也有犯錯誤的如高崗、饒漱石。鄧子恢也犯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再如山東分局的向明等”。他說：“以級別來衡量幹部的好壞，那是扯蛋”。曾軍又說：“關於德、才和評級的标准無統一的东西，有人爭这个东西，也可說是個人主義，但是不爭也不一定完全合理，可是有人一爭，不管合理不合理，就批評是個人主義。

“德”是什麼？有好幾種解釋，執行時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我說共產黨今天有黑暗，但是面不大。黨內的黑暗面是正直者受罰”。

曾軍在攻擊、污蔑黨的幹部政策執行情況的同時，在瀋陽地區整風座談會和小組鳴放會上向中央提出了如下的建議：第一，“建議中央今後應規定各級黨組織領導人，不得隨便說反黨、不尊重黨和驕傲自滿的口頭話”。當小組同志們質問他是指個別組織還是指全黨時，他很激憤地說：“我就是指全黨、各級黨的組織都包括在內！”第二，“進一步明確規定德才和政治覺悟高低，思想意識好壞，組織性、紀律性高低的標準，在黨內要提倡堅持真理，不屈服，不怕掉腦袋的精神，對那些唯唯諾諾的人硬要批評，對過去敢于堅持正確意見的人要提拔”。第三，“為了防止宗派主義，任人唯親，要改善了解幹部的方法”。除了聽組織的反映和到幹部工作的地方去了解之外，他提出“根本一條，是在一個重要問題的討論時作記錄，以便事後考察那個幹部正確。……不是單純地聽組織上講。對那些敢于逆水行舟，提出自己見解的幹部，應看成是好幹部”。第四，“中央組織部應在全國抽查幾個地區、幾個部門執行幹部政策的情況”。“黨應總結一下提拔幹部的工作，那些是該提拔的，那些是不該提拔的，吸取經

“驗教訓”。“对那些吹嘘拍馬的就要降下来”。

2、对于他过去历次所犯的錯誤，党組織对他的教育批評处分，实行全部翻案。曾軍在沈阳地区整風座談会上，对于自己在一九四二年平北挺进军第十团工作时，因违抗命令，反对領導，受党内警告处分；一九五一年沈阳市召开防空會議动员布置防空工作时，因有恐美情緒，受了批評，一九五三年沈阳市委常委会討論他主持草拟的副食品供应計划方案提出些不同的意見，他竟要挾領導拒絕前往国家計委开会，因而受到支部批評並責令他写書面檢討；一九五六年沈阳市人委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他蔑視支部提他为代表候选人的決議，受了批評后，在支部大会上无理取鬧，因而受到支部的严厉批評等，都說成是党組織对他的打击，而他自己却没有錯誤。他把中央組織部的同志来参加会议比作“十五貫”中的“况鍾”下乡，在會議上歪曲事实，申“冤”告状，推翻党組織对他历次所犯錯誤的处理。根据各方面的調查材料証明，多年来有关党組織对曾軍的批評教育和处分，都是正确的，必要的。而曾軍在鳴放會議上所表現的态度，恰恰証实他是屡教不改的人。

3、歪曲党的民主生活和攻击党的組織。曾軍在沈阳地区整風座談会上說：“沈阳市委領導上执行民主集中制有問題，不够民主，誰对市委冲一下，誰就馬上受到批評，調动工作”。曾軍这种歪曲沈阳市党的生活不民主，实际上是为他的无組織、无紀律，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反党行为辯护。例如：在一九五三年他不同意沈阳市委会对他主持草拟的副食品供应計划方案提出的意見，他以“我不能去說我不同意的意見”为理由，拒絕前往国家計委开会，以后又拒絕支部的批評教育，坚持不写書面檢討。又如一九五三年他不同意苏簡同志为市党代表候选人，当选举时，便不参加党的會議，而去看电影。再如，一九五六年他拒絕支部提他为沈阳市人委机关党代表候选人，並在支部大会上无理的要求支部書記收回对他的这种錯誤态度所作的正确批評。这些

都是曾軍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行為。

他攻擊黨組織說：沈陽“市委喜歡聽好的，不喜歡聽壞的，已成為習慣”，“愛說優點，不愛說缺點是一貫的”。他列舉郊區鎮反、三反等事例來捏造、夸大沈陽市領導上的缺點和錯誤，對自己的錯誤看法，則只字不提，反而把他自己吹噓成為“一貫正確”的。並屢次自我稱贊為“誰都敢頂”的幹部，“是一匹好馬，就是騎不了”。他甚至說：“我學習回去後，一年不講話，不提反面意見，誰說我曾軍進步啦，我就說操你娘”。這說明曾軍仇恨黨的情緒，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

三、錯誤根源

曾軍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有其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由於他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家庭，並在舊軍隊里沾染了一些壞習慣，抱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目的參加了共產黨。多年來黨組織針對他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腐朽思想進行過嚴格的批評教育。但是，他卻把黨組織對他的改造看作對他的打擊報復，反而埋怨黨組織對他提拔不夠，長期對黨不滿，以致發展到這次大鳴大放期間竟與資產階級右派里應外合，惡意地攻擊污蔑黨組織，向黨進攻。

四、對待錯誤的態度

曾軍的反黨言行，經過了黨組織和同志們向他進行了將近兩個月的批判和幫助，但曾軍的態度始終是極不老實的，一直是抗拒的。他首先企圖否定在“鳴放”時他在地區整風座談會議和小組會上的錯誤言論的記錄。當同志們對他進行嚴肅批判和耐心幫助之後，他曾在支部大會上承認了某些錯誤事實，但他在後來的檢討中特別是書面檢討中卻避重就輕，對其主要錯誤事實進行狡辯和抵賴，企圖蒙混過關。尤其態度惡劣的是，對其錯誤言行的材料，經過小組和支部與他逐字逐句反復對証後他已簽字同意，隨後卻又提出聲明，進行翻案。並在最後寫的所謂“我的反省”中，對他的反黨錯誤事實作了修改，幾乎全部推翻。曾軍這種流

恨无賴，出尔反尔，无理取鬧的恶劣行为，虽經支部大会严肃地批判和幫助，但他仍然蛮不講理，坚持錯誤，拒絕改造。

五、結論

曾軍具有極端严重的資产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品質恶劣，屢教不改，长期对党不滿，在大鳴大放期間，公开向党进攻，攻击党的領導，特别是攻击党的幹部政策，歪曲党的民主生活，对他过去历史上所犯的錯誤，实行全部翻案，以致走向反党的道路，墮落为党內的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支部大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議行政加重处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二十七日人全体通过）

中共鞍山市委組織部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董惠民党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

根据“右派分子董惠民的反党言行及处理意見的报告”和董惠民在反右斗争中所采取的态度，經过支部大会討論，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开除董惠民的党籍。

附：对右派分子董惠民的反党言行及处理 意見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八月）

董惠民，男，三十三岁，山东省文登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填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〇年一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委組織幹事，区委書記、县委組織部

长、县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科长、处长、组织部副部长。

一、历史問題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風，因伪造参加民先履歷，受到审查，心怀不滿。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时期）随五师南下，一九四六年，在罗南留地方工作，后由中原单身突围未带組織关系，其中經歷尚未查清。

董惠民家中共有土地六十多亩，房二十二間，牛、驢、騾各一头，长期僱长工一个半（到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土改时由于董惠民兄董崇实任村长，将其家庭成分定为富农。后在一九五一年土改复查时定为地主，並將董崇实开除党籍，管制生产。这个問題董惠民从未交代，填表时一直写富农成分。

二、日常表現

工作表現一般，在基層組織建設工作上，有右傾表現，一貫驕傲自大，自以为是，好固执己見，好从反面看問題。

三、在鳴放、反右前后的反党言行

1、認為胡風是反革命的根据不足，怀疑中央把胡風問題搞錯了。当大鳴大放时期，大連右派分子张国琮向党进攻提出：

“說胡風是反革命，不能令人信服”时，董就表示贊揚說：“真有敢幹的”，他說“用反革命的老匡子套胡風套不上，感到有距离”，他認為“张国琮的話直得考虑”，他認為对胡風处理的結果應該公佈。当有人指出“三批材料”上說明胡風不仅是反革命，而且也是特务时，董又說“那指的是胡風集团，不是胡風本人”。

2、否定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大發展的成績与合作化的优越性，董認為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高潮是“冒进”了。当他与組

織處幹部一起學習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他針對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一段講話說：“一九五五年一下子都合作化了有問題”，“如果再穩一點，發展一批巩固一批，是否會更好些”。董說毛主席說的合作化後第一年就增產了“不能說服人”，“糧食增產了，特產作物減產了，總產值不一定增加”。還說：“我的估計沒有毛主席估計的那麼樂觀”，他認為市場供應緊張，主要不是由於人民購買力提高的結果，是合作化後帶來的。他說：“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五年相比，人民生活就不能說提高”。他還說：“從職工收入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七年是多，一九五七年物價有的又調價了，生活顯得比一九五六年低了”。

3、贊揚、同情、支持右派的言論；為右派辯解。大鳴大放時，他一方面埋怨中央不交底，“是由上而下的自己整自己”，認為中央沒有預料到整風會發展到這種程度（指右派猖狂進攻），“是自己把自己搞被動了”。但另一方面，他又贊揚右派分子張國琮關於胡風是反革命不能令人信服的謬論是：“真有敢幹的”，“值得考慮”，他還說十二個副總理沒有民主人士，說是黨的領導，“太簡單，不能說服人，中央各部、各省，也是黨的領導，都有民主人士”，“十二個副總理中，有一兩個民主人士沒有啥”。他說：“學校實行黨委制需要研究，照這樣領導下去，是不行的，領導幹部不懂得教學技術，沒有辦法領導好學校”。他還為章乃器不勞而獲的謬論作辯解，說“不勞而獲，不一定都是剝削，我們在銀行儲蓄，利息也是不勞而獲”。當鞍山極右分子姜健群，在市委宣傳會議上向黨發出狂妄的誹謗言論時，一般同志聽了都非常氣憤，而董卻說：“不是事實人家還會說”。他與部內右派分子單維本日常最接近，也最了解，在鬥爭單的過程中，自始至終不但不揭發，不批判，還為其辯解，開脫，進行包庇。

4、對革命導師和人民領袖的信念發生動搖。他說：“引証領袖的話，當作千真萬確，這是個人崇拜”；“馬克思也不是都

正确，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国胜利的问题，后来就证实是错误的”。他把对马克思的信仰说成是“个人崇拜”。在胡风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整风鸣放等问题上，都表现了他对中央和毛主席的不信任，怀疑和攻击。在学习刘少奇同志关于一九五七年停止接收新党员的讲话时，董说：“要发展时，就那样讲，不发展，就这样讲，不是实事求是”。

5、攻击市委领导，他说：“市委委员的选举，也不是走群众路线的”。“市委对依靠厂处长这批骨干缺乏具体措施”，董特别对第一书记杨士傑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他说杨书记民主作风不够，“要求简单化”，对干部批评较多，“不是谆谆善诱，有些粗暴”；董惠民甚至还用一些自己也不知来源的材料，向领导攻击。为了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曾向部内干部处打电话；到兵役局收集杨士傑同志的材料。

6、董认为我们的人事制度实行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有问题，他主张人事自由市场，“需要就招，不需要就解雇，愿干就干，不愿干就可辞职”，边远地区没人愿去，“可用高工资的办法去鼓励”。

董主张婚姻绝对自由，他说“资本主义国家都能作到，为什么我们作不到”。

7、董对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不满，他说他的脑子有时剧痛，是那时造成的。他曾向单维本（右派）和门海陞同志说过，“一九四二年整风搞的可厉害了”，“不拘什么问题就一直怀疑”，“是康生搞的，那时康生在中央可红了，以后他就犯错误了”，一九五三年董在自传中写道：“我经过了延安的伟大整风运动，我受了委屈，党对我实行了逼供”。

四、董惠民在斗争中的态度

在去年八月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部处长七人参加），暴露了董惠民认为“胡风是反革命材料不充分”的认识之后，市委组织

部的正副部长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说明他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認識的严重性，並指出他一貫好从反面看問題的錯誤思想。第一次他表示願意檢討，並要求給他两个星期的時間深挖思想，但在第二次作檢討時即改变态度，不但不檢討，反而一口否認，进行反噬，說他向來对“胡風是反革命”不曾怀疑过，是李建梓同志未把情况弄清楚即向市委彙報，他是不滿意的。以后連續开过四次小会，均无結果。直到这次市委扩大会上他的問題被提出后，經過書記及同志們再三耐心教育仍拒不交代，直至三月十五日，在摆事实証据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認了以上情况和若干反党事实，三月二十四日作了極不深刻的檢討，但三月二十七日写信給書記处，对極不深刻的檢討又企圖推翻。此后，又进行了多次个别与小会的批判，虽也作了一些交代，但仍極不老實，始終与党对抗，不願低头認罪，直到現在沒有自动交代过一个問題，甚至在确凿的証据下，仍矢口抵賴，态度極為恶劣。

根据以上事实董惠民在若干重大政策問題上，与党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对党中央負責同志以至毛主席表示不信任，对共产主义革命导师馬克思也表示怀疑，在鳴放反右期間与党外右派分子共鳴，同情、支持和包庇右派，攻击市委領導。

董惠民出身于地主家庭（一直欺騙組織，填表写富农），参加革命不是出于自觉，在去延安途中，曾有过开小差的思想。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風时，由于自己假造履歷，受到党的审查，心怀不滿，曾后悔不該去延安。好从反面看問題，好在党内找黑点子，但平素靜默寡言，很少暴露，在苏共批判斯大林同志的錯誤之后，受到修正主义者叫嚣的影响（董在三月二十四日自己說是受修正主义的影响，但以后又不檢討）董的反党思想有所發展，在整風鳴放期間，他这种反党情緒就比較集中的而又是点点滴滴連續不斷的暴露出来。

根据以上事实和分析，我們認為董惠民的問題是严重的，应划为党内右派分子。

处理意見：开除党籍，撤銷职务，降五級（由十二級降至十七級），是否有当？請市委审查。

中共鞍山市文化局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楊东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

楊东昉，男，四十八岁，辽宁省辽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二年入党，原任鞍山市文化局长，極右分子。

一、楊东昉主要的右派言行

楊东昉对党一贯不滿，利用整風鳴放机会，積極煽动群众並組成反党小集团，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1、鳴放期間在文化局和基層鳴放会上，煽动群众反对党，亲自带头写題为“到底誰說了算”的大字报，恶毒地向党进行攻击。同情和支持剧团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在他煽动下，使本市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反党的逆流。

污蔑和反对党的领导。他把党的领导說成是“以感情代替政策、独断专行”；把党的领导比喻成旧社会封建家庭里的“恶婆婆”，把自己說成是一个上下受气的新媳妇；把市委保留歌舞团的決議，說成是“以党代政”。他还主张撤銷剧团现有一切管理制度，实行所謂“民主选举团长”，企圖推翻党对文艺方面的领导。在反右派动员会上說：“我要碰一碰”，又說：“我要叫法院留张床位，准备犯錯誤去住”，“鞍山日报要給我留点地方，我要鳴一鳴，放一放”，决心要和党較量一下。

污蔑鞍山人事关系是：“尖酸、苛薄、嫉妒，病态的关

系”。又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是賞罰不明，幹部工資、使用、提拔存在宗派主义”，並以此来反对党的領導。

否定党对鞍山文艺事业領導的成就，把鞍山說成是“只有鋼鐵，沒有文化”，把鞍山文艺界說成一团糟。

2、楊东昉与右派分子陈宝書、成千万、寇冠結成反党小集团，楊东昉是反党小集团首要分子。他們謀划将文化局和戏曲剧团一些黨員幹部和積極分子搞走。並積極为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而被开除党籍的陈宝書翻案。在反右派期間，将文化局反右派斗争的計劃和右派分子名单，全面洩露給他的反党集团成員，並訂立反党攻守同盟，抗拒反右派斗争。

二、楊东昉在斗争中的态度

初期表現不老实，中間曾以自杀抗拒斗争，自杀未遂，恢复健康后，对党表現極為仇恨和不满，經領導帮助和多次党的會議的批判，态度有所較变，初步检查了本人的反党言行。

三、处理意見

支部全体黨員一致同意开除党籍。

中共旅大市委扩大會議对党內右派分子 王輔民、黃易明問題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通过)

根据市委文教部的检查，大連医学院党委的报告及到会同志們的揭發，會議一致認為：大連医学院前任党委書記王輔民（行政上是副院长）及党委第一副書記黃易明，确系隱藏在党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們在担任該院領導工作期間，喪失立場，投降資產階級，一貫反抗党的領導，攻击党的政策，破坏党的威

信，成为資產階級路綫在大連医学院的忠实执行者。

在政治上，投降資產階級，反抗和污蔑党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方針政策，充当了資產階級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应。王輔民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不断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頑固派喊冤叫屈，認為运动“产生了副作用”，“伤害了知識分子自尊心”，並屡次要求党承認“錯誤”。对于肃反运动，王、黄一致誣蔑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有錯誤，是“主观主义”，說中央对敌情估計高了，發动运动急了；黄还認為党的十人小組名义發有关肃反政策的規定，和五人小組出面給非党人士做政治結論不合适，應該由国务院和政法机关出面，實質上就是否定党的領導权；他更否定肃反成績說：成績和偏差相比是“平分秋色”，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在整風鳴放中，王、黄和党外右派一唱一合，互相呼应，一致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对于党的反右派斗争号召，一再抵抗，按兵不动；对于右派的反动言行，不是尽力掩盖，就是積極辯护，企圖为他們开脫罪責。对于党的知識分子政策作歪曲解释和片面执行，只講團結，不求改造；不是按照无产階級的面貌去教育改造知識分子，而是无原則地迁就，牺牲党的利益。此外在教学医疗工作中，他們对于长期所实行的資產階級路綫，从来都是采取鼓励与支持态度的。

在組織上，一貫反抗党的領導，破坏党的紀律，並实行資產階級的組織路綫，自成“独立王国”。王、黄一向目无組織，目无紀律。遇到上級检查工作，則态度厭煩；遇到上級批評，則借詞反駁。对党的指示和决定，有的是敷衍过去，有的就頂回去，甚至公开誣蔑攻击。如王对思想改造問題，就是不顧中央的明文指示和市委的屡次批評而一再公开散播反动言論的。他們極端狂妄，不仅惡意誣蔑市委領導人，甚至还胆敢攻击党中央及毛主席、周总理。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竟采取卑鄙手段，利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提意見”为名，向党施加压力。在幹部工作上，亦是貫徹資產階級的路綫，以資產階級观点提拔和使用幹

部，單純強調业务能力，不看政治質量，任意排擠和歧視政治質量較高的幹部。同樣，在發展黨員上也不注意考察政治歷史與階級立場。對黨外幹部，不注意依靠廣大的進步教職員工，而是實行所謂“名教授”路線。此外，對兄弟單位，採取極端本位主義，甚至不擇手段，企圖吞併鐵路醫院。

在思想上，王輔民、黃易明披着偽裝的“馬列主義”的外衣，到處販賣修正主義貨色，否認階級鬥爭。他們主張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以進行“和平改造”，反對發動學生批評教師。他們主張進行“和平肅反”，反對在肅反中發動群眾鬥爭。在建黨和幹部政策上取消階級界限，在黨內生活上取消思想鬥爭。王還散播：“堅持真理和服從組織有矛盾”，“民主和自由沒有階級性”，“士為知己者死”，“士可殺不可辱”等謬論，黃並認為匈牙利事件是“內因為主”，否認是反革命製造的暴亂。

上述事實說明王、黃已經墮落為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王、黃二人的錯誤程度和問題重點雖有不同，但他們都是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投降資產階級向黨舉行猖狂進攻的。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造成了嚴重惡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巨大損失。某些階級異己分子及其他壞分子混進了黨的組織和幹部隊伍，許多重要部門被右派分子所操縱，醫學院黨的某些組織，已經蛻化變質，黨內外政治思想非常混亂，在很大程度上黨已喪失了对學校的領導權。

市委擴大會議全體同志對王、黃的反黨言行極為憤慨。並認為：這次會議對王、黃反黨言行的揭露和鬥爭是我們黨的一次重大勝利。鑑於醫學院黨委所存在的問題的嚴重性，擴大會議決定：

一、貴成醫學院黨委按照市委擴大會議的精神，採取適當步驟，發動全黨對王、黃的反黨罪行進行全面揭露與嚴格清算；並在清算之後，作出適當的組織結論報市委。我們相信醫學院的大多數黨員是能夠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明辨是非，提高覺悟，徹底清算王、黃的反黨路線的。

二、医学院党委应从彻底清算王、黄的反党言行中，全面地检查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以来的工作，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办学路线；特别是肃反、审幹、反右派斗争必须进行复查，把隐藏在党內外的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三、李震勋同志身为市委委员、医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党委常委委员，对医学院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不仅负有领导责任，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和王、黄站在同一立场，对党的许多重大政策同党也有严重分歧。医学院党委对李震勋同志的问题应当彻底进行检查，李震勋同志也必须向党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四、市委文教部、监委和有关部門，必須組成工作組，在市委领导下，协助医学院党委深入工作检查，从思想上清算王、黄的反党路线，从組織上純潔党的和幹部的队伍。

中共辽宁省妇联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立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

李立，女，三十四岁，山东莱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区委書記，市委組織部副部长，辽东省妇联主任，东北妇联秘书长。反右派斗争前任辽宁省妇联第一副主任。

李立積極参加了张烈反党的活动。以省妇联为陣地，勾結反党分子林鏡清，施展各种阴谋手段，有計劃、有目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宗派活动，她反党活动的主要事实是：

一、自始至終積極地参加了以张烈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是张烈反党集团中的骨干分子。李立参加了八月十九日晚张烈召开

的反党集团的秘密会议，当省工会副主席傅承铭同志到她家时，李拼命阻拦，使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人得以跳楼逃走。事后，李立又到徐忠岳家，嘱徐不要说出秘密会议的内容。在张烈草拟向省委进攻的发言稿时，李为张烈出谋划策，指点他如何谈起。张烈写检讨时，李要张注意分寸。当张烈私自修改过去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时，李动员记录人不要暴露。李立还亲自出马给张烈反党集团分子布置任务。

二、李立在併省时，不满省委对她的职务的安排，拉拢反党分子林镜清，打击李紫辉和李田同志，企图将她们挤走，以达取而代之的目的。李立为骗取全国妇联的信任，利用张烈分工领导妇女工作的身份，张烈到全国妇联造谣说：辽宁省妇联其他主任均不能担当工作职责，只靠李立一人支持工作。以后乘李紫辉同志休假之际，张烈支持李立、林镜清，不经党组研究，私自决定检查工作，煽动群众向领导提意见，以打击李田、李紫辉同志。张烈在省工会干部大会上污蔑省妇联工作贪多贪大，计划像网领，工作是青蜓点水，干部下乡是散兵无统，有兵无将等。以此来破坏李紫辉同志的威信，抬高李立的身价。李立、林镜清还企图给李紫辉同志扣不执行省委决议的帽子，并从各方面打击、丑化李紫辉同志。李、林互相吹捧，李宣扬机关工作离了林镜清谁也作不好，林则宣扬李立稳重、老练、朴素、能幹，那一点也不弱于李紫辉主任。李立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都背着其他主任，先和林镜清商量好，再拿到会上讨论。有的问题不经党组讨论，擅自作主。当李紫辉同志不在时，李立就操纵党组，以宗派观对待与她的意见不同的人。李立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任意破坏党的纪律，抵制省委和全国妇联的指示，背着李紫辉同志，决定将她和林镜清的工资级别提高，省委没有批准，她们就大发脾气。李、林在干部中极力搞宗派活动，喜欢奉承，厌恶批评，拉拉扯扯，作风极不正派，对坚持原则不同意她们意见的同志，一律加以打击、排斥。

三、極力歪曲黨的婦運方針。李立污蔑婦女工作可有可無，不作也塌不了天，婦女工作沒有歷史，沒有前途等，渙散了婦女幹部的事業心。李立在婦女工作中還販賣張烈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思想。把貫徹黨的政策和走群眾路線對立起來，說：光強調國家政策，就要脫離群眾。

四、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包庇反革命分子，散佈各種荒謬言論。她否認肅反運動的成績，說：“省婦聯機關沒有搞出個反革命，有啥成績。”匈牙利事件發生後，大肆宣揚鬧事聲勢，製造緊張空氣，說：“群眾鬧事找黨員時，黨員應帶頭參加。”反右派鬥爭開始時，李散佈說：“省婦聯機關沒有右派”，極力包庇右派分子王欣明。張烈和李立還千方百計地包庇反革命分子、惡霸地主李雙林，吹噓李雙林的技术如何高明，為李出謀劃策，污蔑工會黨組違反中醫政策。

黨組織為了挽救李立，一年來一直是耐心教育和幫助她，但是她一直以極頑固的態度對抗組織，不作徹底交代和檢查。直到這次會議開始，還企圖蒙混過去，後經過與會同志揭發、批判，反復交代政策和耐心幫助，才交代了反黨罪惡活動。

根據以上事實，支部大會認為：李立已完全背叛了黨、背叛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為張烈反黨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因此，決定開除其黨籍，並建議撤消其一切行政職務，生活待遇由十一級降為十五級，參加勞動，進行改造。

中共吉林省林业厅机关委员会关于 开除坏分子、右派分子王其清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

王其清（原名王亨华），男，三十七岁，汉族，山东省黄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店员，一九四四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五年在来东北途中入党。参加工作后，任过教员、文警、科员、矿务局长、县委秘书、区书兼区长、科长、採伐大队长、林务分局长、东北森工总局副处长、森工局长、森工管理局副局长。反右派斗争前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一九四七年因犯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的错误，党内受过警告处分，一九四九年为工作失职，记大过两次，党内再次受警告处分。

整风运动中，经揭发并调查证实，王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其主要事实如下：

一、一贯同党对抗，积极活动妄图取消党对企业的领导，恶毒攻击，诬蔑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

王其清一贯认为党不能领导企业，他说：“企业党委官僚主义，只能听彙报，作用不大”。同党一直是采取对抗的态度，远在一九五三年在大石头任森工局长期间，一直是抗拒党委的领导；在党委会议上经常大吵大闹，拒不执行党委的决定，粗暴地推翻党委的决议。百般刁难、压制和打击党委书记，甚至当面辱骂党委书记是：“饭桶”，“什么也不准干”，并积极活动要从根本上取消党的领导。鼓动撤销各森工总支委员会，成立相当于科室级的所谓“政治分处”，由副局长兼任“政治分处”的主任。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减少非生产开支为借口，上害党中央提

出在全国森工企业中削減党群幹部百分之九十。当党中央决定在企业里要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时，王表示强烈的反对。並歪曲和攻击党中央的决定，“不符合列宁主义原则”。直到反右派斗争中还百般袒护极右分子殷潮等关于取消森工党委的反动言論，並一再阻撓党组织对这种反动言論的批判和以此作为定案的根据。

王其清不仅一贯地抗拒党的领导，企图取消党的基层组织，而且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也是经常恶毒攻击和无耻的誹謗。一九五四年調森工管理局以后，对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党委书记也常常公开的或以傍敲影射的手段冷言恶語地諷刺和打击。並乘調整工資的机会公开地挑拨党委副书记对党不滿。在整風期間，他的問題开始暴露时，暗地里搞非組織活动，妄圖轉移鋒芒，煽动群众，攻击党组书记。王对上級党委的某些負責同志也是不分场合地进行誣蔑和攻击，在群众中制造流言蜚語，捏造事实，混淆是非，有意降低领导同志的威信，特别是对那些对他有过批評的負責同志攻击的更加恶毒。他誣蔑党内不民主，並上書中央要求在党内建立“党员来信来访的机构和制度”以使党员充分的表达“个人意見”。对党和国家的方針、政策指示、決議也拒不执行。一九五三年王以妨碍生产为借口拒絕省工会組織的吉林市文工团在林区职工中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一九五七年拒絕执行森工部和煤炭工业部下达的关于坑木支援的联合指示，並狂妄地說：“中央有指示也不行，部长没什么了不起的，决定問題一样有錯誤”。后来省委工业部对坑木支援規格比例又作了規定，王仍不执行。經省委工业部，肖部长再三指示，党组作了决定才勉强执行。当时已严重的影响了煤炭的生产。但背后还說怎么能这样批示呢？这是什么原則？一九五八年十月省委組織收听小平同志在辽宁省委扩大會議上的录音报告。会后吳書記指示：关于辽宁省委出現反党集团問題，在沒有公开发表以前不准講，可是王不顧党的决定就对別人講。

肆意破坏党和国家的整体事业，一九五六年军区后勤部和志愿军营防部，为归国志愿军建造营房，急需手車鋼軌，經省里有关會議研究向原森工局借用。而王却借故搪塞，加以拒絕。一九五七年汛期全厅幹部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正冒雨乘車准备开往現場搶修河堤，然而王不顧河堤决口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危險，硬把司机扣下来，为他自己开小轎車送他回家过礼拜六。

二、敌視排斥和打击工农幹部

王其清一向敌視工农幹部，对工农出身的同志，經常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排斥和打击。一九五三年大石头职工医院院长韓明同志（农民出身，党员轉业軍人）因坚持医院制度，拒絕付給王大量营养藥品，遭王报复被撤职。第八場主任邢升庆同志（工人出身，党员）屢遭王的斥責，最后借故撤了职。邢被逼曾一度想要自縊。王对工农出身的党委書記王超海同志，特別对副局长王相臣同志的欺压，已达登峯造極的程度。迫使王相臣同志不得不在王其清午睡时給他“打更”，夜間給他送手电或雨伞。尽管如此，王仍然是欺压他。王相臣送文件給王其清閱批，王接过来就摔在地下，並声色俱厉地訓斥說：“你連这点事都幹不了，你还能幹什么？”。类似这样粗野行为，真是司空見慣不胜枚举。王相臣在临死前还气愤地說：“王其清我死也不能和你算完”。对党委書記王超海的凌辱和欺压也是很严重的。王超海同志时常流露“真別气”。

三、橫行霸道，以势压人，品質恶劣，流氓成性。

王其清的国民党作风十分严重，飞揚跋扈，胡作非为。一九五八年三月旅大疗养院派人把患神經病的呂世夫同志（原汪清森工局长）送回长春。王借口呂的病沒好，蛮橫地拒絕接收，当时疗养院的同志解釋說：“我院不能治疗，这是組織上派我們来的，有意見以后再办，先把病人安置下来要紧”。王当时气势凶凶地破口大罵：“你們疗养院是共产党領導的？是国民党領導的？就是国民党！”，“你們疗养院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你

們根本沒有救死扶傷的革命人道主義”，“我懷疑你們有政治問題……”。他不僅狂妄地辱罵旅大療養院組織，而還命令招待所的同志通知派出所把療養院的同志都看起來。逼得護送人員找省委，當省委組織部陳部長，工業部肖部長接見護送人員後，決定由森工管理局將病人收留下來，王開始還拒不收留，不得已收下來，還表示對肖、陳部長不滿。

王其清這種惡霸作風是一貫的。早在一九四八年在伊春當採伐大隊長時，就曾帶領一些農民不顧主管單位的阻止，打開林務局倉庫，強索材料。把作業所長的行李扔出去，強占所長宿舍。領款時，門衛要出門証，王掏出手槍奪門而出，並多次持槍威吓農民。一九五〇年美溪作業所一個電話員，就因沒有及時給王掛通電話，被王開除。

王其清也曾用过最卑鄙無恥的手段玩弄、奸污女人。遠在一九四六年在鶴崗工作期間，曾嫖娼宿妓，胡作非為。一九四七年在鶴立縣工作時到處亂搞女人，連江口區有不少婦女遭到王的侮辱，其中有农会主任，區幹部的愛人，也有老百姓的女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當縣里領導幹部都分頭下鄉，搞土改和鎮反之際，王乘機奸污了縣公安局長、獨立團長、羅北縣長的愛人，以後又調戲副縣長的愛人才被揭發。一九五〇年在伊春夜里打電話以送腊為名，把女電話員騙到室內，拉拉扯扯，企圖強奸。

四、抗拒改造，敵視整風運動，頑固地堅持反動立場，死不悔改。

王在歷史上犯過許多錯誤，黨組織不斷地對他進行過教育，但他始終無動于衷，屢教不改。一九五八年整風期間剛作完自我檢查不久，就發生了旅大療養院事件。事後不但拒絕檢討，抗拒省委工作組檢查，反而要流氓，詆詐和威脅組織，對黨組成員施加壓力，抵制對他的鬥爭。

當省委布置繼續深入整風時，王極力反對在各局深入整風。並叫囂：“解決各局問題，解決不了糧食，鋼鐵翻番問

題”。積極主張把整風鋒芒移到上邊去，企圖逃避對自己的鬥爭，向省委，省人委掀起一場進攻的風暴。深入整風期間，揭發了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以後，王不但拒不交代，相反地却強詞奪理，狡辯抵賴，企圖掩蓋他的罪惡活動。當在省直機關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揭穿了他的花招之後，他就惱羞成怒，捏造事實，向黨進攻。並諷刺和反擊代表們對他的批判。最後拒絕參加大會，拒絕檢查。

在停職反省期間，不參加機關勞動，不寫檢討書，並誣蔑大家對他的揭發是“乏味”，“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黨委的同志催他寫檢討，他又挑釁地說：“請黨委轉達省直黨委和黨代會，快點處理，我什麼都準備好了，就等進法院了，最好馬上就來逮捕我，越快越好”。

王其清一貫仇視黨，長期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並不是偶然的。王出身於中農家庭，長期受地主資本家親屬的影響，在舊商人的堆子裡又作過几年的特殊的店員。其資產階級思想是根深蒂固的。王帶著這種思想在抗日戰爭接近勝利時混入了革命隊伍，不久即鑽入黨內。雖然經過十几年的教育和歷次政治運動，但其資產階級本質沒有改變，特別近幾年來却越加發展。所有這些惡劣行為足以說明他是一個混入黨內的品質極惡劣的壞分子，同時又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為了純潔黨的組織，黨委會決定：開除壞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王其清的黨籍。建議行政撤銷其一切職務，以法懲辦。

中共長春市委員會

關於極右分子范政的結論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范政；男，三十四歲，共產黨員，一九三八年入黨，現任長春市委宣傳部部長。極右分子。

一、主要反動言行

1、經常散布對黨中央、黨的領袖和中央許多負責同志的誣蔑性言論，製造和散布流言蜚語，破壞中央威信，對於中央對高崗問題的处理，心懷不滿。對蘇共中央及蘇共領導同志也經常誣蔑，極力貶低蘇聯成就。

2、常在反教條主義的藉口下，以修正主義的觀點來曲解和攻擊黨的某些重要的方針政策。如曲解和攻擊黨的文艺方針和向蘇聯學習的方針，實際上也反對黨向右派分子鬥爭的方針。反對黨的組織原則，反對黨的紀律，攻擊黨的幹部政策，丑化老幹部，要用文艺形式挖“老幹部的靈魂”。

3、進行反黨的宗派活動。早在沈陽、哈爾濱等地工作期間就與右派分子劉賓雁、張震結成反黨集團，范是其中的骨幹，調動工作後仍不時來往，進行反黨活動。來長春後，又同部內幾個右派分子糾合一起散布對黨不滿的言論，破壞市委領導威信。

4、為人虛偽成性，狂妄已極，在生活上則是腐化墮落，驕奢淫逸。據交代的材料，在近幾年來前後曾與十四個女人發生不正當的兩性關係。

二、反黨的思想根源

范政虽然是在党的直接教养下长大的，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过严格的斗争锻炼，思想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进入城市后又沾染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以至使他成为品质很坏和一个具有野心的人。再加上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他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相反的在他父亲李常青（註：李是高岗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整风运动中定为反党分子，已开除党籍）的影响下，又助长了他对党的仇恨与不满。因此范政今天成为反党的右派分子、右派的骨干分子并不是偶然的。

三、斗争中的态度

他的问题被揭发以后，态度尚好，经过斗争，对他反党的言行基本上作了检讨和交代，并有决心悔改和重新做人的表示。

四、处理意见

开除党籍。留用察看，参加农业劳动，进行改造。从原来的十一级降到十六级。

鉴于范政曾任过市委宣传部长，其言行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拟连同其他两个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在一定范围的干部会议与报纸上进行批判，以教育干部，肃清影响。

长春电力设计院整风

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张涛的政治结论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

张涛，男，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份学生。山东嘉祥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现为长春电

力設計院院長、黨委常委委員。

主要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

(一) 以修正主義觀點，改造黨的面貌。

(1) 否定黨的領導作用說：“黨委不懂業務，不懂技術，怎么個領導法呢？對生產很難討論”，“五年總結都是技術問題，我也沒看，黨委討論也沒有什麼”。“我們這個單位同大學差不多”；“大專學校黨委制是值得研究，學校要黨委領導，校長幹啥呢？馬寅初幹啥呢？”“象我院這類機構……行政上搞的計劃、設計等工作，黨委不能去搞，所以在我院如何領導應當研究”。“黨就不能在一切工作上發號施令！”

(2) 污蔑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說：“黨是民主制，不是什麼長制”，“黨的書記嗎，就是把大家的意見記錄一番，書記書記就是記記錄，這就是黨的民主”，“黨務工作不能由書記一人負責，大家都是黨委委員，都有責任，都能決定問題”，“不是非得書記出面才是黨的領導，行政幹部出面也是黨的領導”。

(3) 成立非法組織，代替黨委領導，說：“黨是管黨員政治思想的，行政也有一套系統作政治思想工作”，“象我院這樣機構，應當有一些人組成的會議，來討論一些重大問題”。一九五五年初他來院不久就倡議成立了既脫離上級領導又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幹部小組”，“交流思想，交流情況”。一九五七年夏，又成立了院務會，在此會議上討論的問題，事前不向黨委請示，事後也不報告黨委。特別是讓黨委書記參加這個會議，說什麼：“黨委書記應參加院務會議作為成員，否則在會上說話別人愛聽不聽，蘇聯赫魯曉夫是第一書記，又是主席團委員，德國烏布利希是第一書記，又是副總理”。此外，還繼續實行代替黨的領導的“黨政工青婦入會”“核心小組”認為這是黨的領導的一種形式。

(二) 污蔑省、市委，抵制派遣幹部，赶走党委書記。

(1) 污蔑省、市委說：“市委开的会不够劲，能解决啥問題？这是水平問題。”“市委怎能領導人大、师大、六五二呢？我看这是省委客气，饒斌、程仿吾、匡亚明都是怎樣的幹部，还是省委領導好”，“市委工业部只抓些工厂……不了解我院的业务”。

(2) 抵制市委派遣幹部說：“省委还能給我們派来好幹部？”“市委只照顧自己”，“一定是市政府缺幹部，由下边来抽調”。为拒絕执行市委的决定，还给电力部基建总局打电话、打电报，誹謗說：“市委調走楊林，派来一名駐长部队同志的爱人作党委書記那行？”，“新来的女同志能否胜任尙屬疑問”，“根据‘八大’精神应加强党委，若如此調动，似乎削弱”。以后借着張松林同志同意黨員出坏分子魏丰年的大字报之机大肆攻击，說“市委說加强我們这兒党的領導，張松林也不长气，看市委怎么办吧”，“现在鸣放嗎，对市委放一下，問題是有，当然市委是了解的，而在許多問題是是非問題，市委是不知道的。这段工作也有很多缺点，市委督促检查不够，过去一年来我們吃了亏了”。“蔡部长（检查組长）你是代表上級党委来的，要講正气”。同时在背地里进行活动，說：“先把張松林这个事搞一搞，剩下的事再同市委弄一弄”，“我昨天晚上在会上發脾气，蔡部长講的不够劲，張松林一点也未檢討，因此我生气了”。

(3) 企圖赶走党委書記。張書記尙未到职前，他就極力誹謗貶低，以“部队同志的爱人”，“女幹部，水平又低，又在家住”等等作为理由拒絕前来。到职后則糾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千方百计地企圖赶走。先是背地議論“張松林根本就不行，水平太低，差的太远，作不了工作，一天淨出事”，“去市委反映情况片面，传达市委指示片面，不知云了多少內容”，“开会三言两語，归籠不起情况来”，“那次会也沒有提出个象样的东西来”等等，以制造不良气氛，制造赶走張的思想准备。繼之公开出

秀“面对面斗争”。在第二次鸣放前夕，鼓动地说：“对张书记的意见和看法问题，在整风时好好整整吧！”当张松林同志同意党员出了魏丰年的大字报，他们几人就立即议论，“这张大字报不是打击报复吗？这样的大字报不好，影响鸣放”，在去市委回来以后又议论：“市委说影响大就处理，怎么算影响大呢？”于是背地或公开的散布起来“影响还不小呢！”“翟部长已经定了，就是打击报复”，“明天开会不要有顾虑，有啥讲啥”。在市委来人参加的党委会上他攻击说：“张松林本身来说，是个人独断，并不重视党的集体领导，别人意见也不听取”，“情节非常严重，非常恶劣”，“党委本身是气愤、等待、洩气、走了算了、不幹、不滿，何必在这幹呢？”“一年来没开个好会，过去的会大都是不是吵架，就是湊湊”，最后詭称对张的检讨气愤，“我代表设计院的党员不能不对此歪风邪气斗争到底”。会后有人指出他的言论使张松林今后不好工作，他狂妄地说：“不好工作就滚蛋唄！”

（三）阻挠反右斗争，袒护右派分子。歪曲反右方针说：“反右生产两不误，反右为了生产，生产也是为了生产，生产忙可以请假”，並屡次向党委要积极分子名单和斗争计划。还认为当时查出二十二名右派分子多了，主张查错。除在时间和数量上限制斗争以外，还指责搞臭右派的作法说：“这东西画的不象样子，你们根据什么画的？”“什么时候揭下去？”对右派分子百般袒护，坚持不定刘玉庭为右派分子，竭力推翻已经市委批准的右派（关晋昌），公开批准已斗争的极右分子凡尚新、陆诚三出席重要会议。

斗争中的表现：

斗争开始，訂立攻守同盟，避重就轻。经过几次斗争后，承认了事实，低头认罪，願意悔改。

結論及处理意見：

张涛出身于富农家庭，反动立場沒有根本改变，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沒有徹底改造。几年来，生活上斤斤計較，思想上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竭力吹嘘自己，貶低別人，只能領導別人，不服別人領導，工作上独断专行，严重右傾，用人不問政治，組織上进行宗派活动，拉攏臭味相投的人，打击不順心願的同志。他这种思想、言論、行动受到了限制，便对党不滿，尤其近一年来更为囂張，正如他自己說的“今年情緒就更不好了，听到个事，情緒就来了”。在这次大鳴大放中，原形畢露，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成为極右分子。

处理意見：开除党籍，撤消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待遇（十一級降至十六級）。

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整風領導小組 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章洛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历史情况

章洛，男，三十五岁，广东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一九四〇年八月参加共产党，一九四四年十月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到新华社工作，先后曾任过記者、組長、新华分社社長。

章洛历史上曾失掉过党的关系，章的家庭系惡霸地主，土改时，其父亲被我判处死刑鎮压。

(二) 反党言行

(1) 章洛誣蔑省委“瞞上压下”、“报喜不报憂”，他自称是“中央記者”，有監督省委的責任和義務。他以歪曲的事實寫信給黨中央，他認為“這樣才能使中央了解省委的真實情況，好來糾正省委的錯誤。”在行動上，違背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進行非組織活動，反對省委領導。集中表現在“此風不可長”反黨事件后和省委領導的較量。

(2) 章洛誣蔑“省委政治思想領導是抽象的，省委不懂新聞業務，地方黨委不能領導新華分社向全國報道，向省委請示只是走走形式”。

(3) 章洛誣蔑省委一貫“不民主”，批評不得，一批評就炸。他追求資產階級民主，反對民主集中制。

(4) 章洛誣蔑黑龍江省千百萬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為“一般化”，他認為中共黑龍江省委應有自己的“新創造”，而省委卻是“照抄中央的東西。”

(5) 章洛丑化與攻擊省委領導核心，誣蔑省委領導水平低，他說：歐陽同志頭腦不太健全，喜歡作長篇報告，但內容一般化，沒啥新東西，發了脾氣亂罵人。

章洛對省委另外四位書記和宣傳部于林部長也都有過丑化和攻擊。

(6) 章洛誣蔑省委領導“特殊化”的“此風不可長”反黨稿件，是他反黨活動的集中表現和總爆發。“此風不可長”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是章洛把黑龍江日報“內參”（按指“此風不可長”稿件）轉給新華總社內參組，他並附信說如不能用請轉給人民日報而引起的，特別是他抗拒省委對這個反黨事件的批評與省委分庭抗禮，採取非組織活動與省委較量。在他領導下的幹部中，散布對省委抗拒情緒，他表示不當社長也要和省委爭清楚。

(7) 章洛在“肃反”、“整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喪失立場，向斗争对象洩密討好。

肃反运动中，章洛对确定王良为肃反对象思想不通，一九五七年五月，大鳴大放期間，王良来哈尔滨时（王已調北京总社工作），带着对肃反不滿的情緒，曾質問章洛为什么斗他，章洛向他表示道歉說：“我对你是了解的，斗争你是省委决定的”。

章洛对分社在斗争右派分子任永达的紧要关头时，又对任洩密討好說：“我們有右傾思想，确定你为右派是省委文教部帮助确定的。”

在肃反、整風、反右派运动中，章洛包庇黃沙（黃沙是章洛的妻子）。肃反运动时，章洛曾为黃的历史作过辯解，整風反右运动中，章洛身为分社整風领导小组組长，对黃沙的右派言論，曾向整風领导小组成員作过开脫性的解释。

（二）章洛的态度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章洛和于长欽在总社談分社过去存在的問題时，总社领导同志指示，回分社在省委领导下把問題搞清楚。章洛先回分社，他立刻便把在总社談的情况向編委作了简单的传达。同时，他认为这次批判是于长欽在整他，並以挑拨离間手法，把于长欽在总社說过韓之非（分社編委）思想落后有問題等情况，在韓之非面前全部講了出来，造成很坏的影响，当时章洛还說于长欽可能回分社工作，影响韓當場表示了“他回来我就走”。

經過初期的批判揭發后，章洛开始認識自己的反党的右派罪行。但是存在一定僥倖想法，态度不够好，表現了不誠懇，不老實，患得患失，有时有对抗情緒，經過领导同志多次个别談話和大家的批判，在揭發出的大量事实面前，开始低头認罪，並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开始有了交代和檢討，在处理过程中，有放下架子服从改造的表現。

(四) 結論和处理决定

根据章洛上述反党言行和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分社整風领导小组决定把章洛划为極右分子。

根据章洛的实际情况（妻子黃沙是右派、身体很弱、四个小孩，监督劳动很难自食其力）和他身体較弱等情况，分社整風领导小组决定：按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标准的第四类处理，即：开除党籍，行政撤消职务，降級、降薪，由原十二級降为十六級，另行分配其他工作。

中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右派分子 閻伟鋒的反党活动和处理意見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閻伟鋒，女，四十一岁，官僚破落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历任小学教員、区妇救会主任，热西分区妇联会主任，察哈尔省妇联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民庭副庭长，一九五四年調我省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十一級。

一、閻伟鋒的主要反党事实

1. 煽風点火、包庇右派，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閻伟鋒在整風前夕，就和省院肃反中被触动的现在是右派分子陈光伟、吳玉嵩、宋惠之和疑似分子李文珍以及张庆云等人糾合在一起，向党展开了进攻，攻击肃反运动。一九五七年春乘机关处理张庆云、刘巩問題之机，在机关墙报上書写了不少反动稿件和漫

西，誣蔑誹謗黨沒有民主、肅反是打擊報復、領導無動于衷、人面兽心等。當時的反動氣焰極為囂張，曾引起了廣大幹部的義憤。而閻偉鋒（黨支部書記）和他們糾合在一起興風作浪，批准反動稿件的刊登。當邵中堂、張安重等同志向她反映壁報稿件有問題，並要求對反動稿件進行批判時，閻偉鋒別有用心地說：

“人家這是正義的批評，壁報是自由園地嗎！”（指反動稿件）。陸檢察長對反動的稿件提出批判，閻偉鋒更不惜使用卑鄙伎倆加以反對，一面指示辦公室主任劉玗同志，出面答復接受反動稿件的質問，一面背地散布王副檢察長違犯機關制度，支持右派分子對王副檢察長的攻擊。當陸檢察長發現這些問題即進行不斷批判，並不准劉玗答復時，閻偉鋒即公開蠻橫地說：“我說話還不如放屁哩”。在黨組會上研究反革命分子陳鉄农的肅反結論時（陳鉄农現已逮捕法辦），她明目張胆地為反革命分子開脫罪責，她不僅反對五人小組將反革命分子陳鉄农的反黨反領導的現行破壞的事實寫在結論中，反而旁敲側擊誣蔑肅反是打擊報復，在會議上她公然說：“我不怕說我右傾，也不怕和我算老賬，有人打擊報復我”。機關整風運動進入反擊右派的階段後，閻偉鋒常不參加領導小組會議和反右派的鬥爭，反而打擊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去年六月下旬，省院整風領導小組開會劃分右派分子時，再三地請她，拒不參加，故意刁難整風領導小組。對右派分子召開辯論大會，因陸檢察長參加省人代會議，王副檢察長到高檢開會，整風領導小組研究決定由閻主持這個會議，當時陸檢察長指示：“要作好准备工作，一定要將辯論會开好”。她即當場拒絕陸檢察長說：“現在不開等人代會結束後，你回來再開吧！我看你是對我不放心”。由於閻偉鋒在整風運動中身懷鬼胎，則不惜採取一切卑鄙的手段，監視領導，打擊積極分子。有一次開整風領導成員會議後，閻見到黨支部副書記楊庆浩、王生光同志，從陸檢察長屋裏出來的晚了些，閻隨即追問陸檢察長：“楊庆浩、王生光和你說什麼來？”陸檢察長說：“搞大字報的問題，我叫他

們和你商量”。这时閻即威胁說：“支部工作我不管了，支書我也不当了”。当郑江同志（五处处长）到王副檢察長屋內請示一个問題出来时，閻又将郑叫去質問：“你和王檢察長說什么来？”不仅如此，在反击右派斗争时，閻伟鋒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轉移群众的斗争視線，而包庇右派分子南星更为突出。丁石川（副处长）同志将张丽芳同志反映的右派分子南星抵抗反右派的斗争向閻彙报后，閻即指責說：“这是对领导的态度嗎？”指示丁石川同志要批評张丽芳。整風办公室将群众揭發南星的問題向閻彙报后，她即指示办公室主任說：“要和他们說一下，别反到好人身上来”。閻恐怕群众斗争的鋒芒指南星而烧到自己，她極力向陆檢察長說：“你給张安重他們談一下，别反到好人头上来”。当南星反党的丑恶面目暴露后，即向閻要求休假，她为了袒护南星过关，使其逃避运动，便替右派分子南星向陆檢察長請示休假，当陆檢察長不准时，閻伟鋒即不滿地說：“你不要替人家考慮問題了，人家的問題个人会考慮”。

2. 捏造事实，制造分裂，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一九五七年整風前夕，省委指示：由省院党組討論提出对刘巩、张庆云同志問題的处理意見时，她在会上却公开地反对省委指示，讓党組进行討論，並荒謬地說：“过去处理张庆云，支部参加与否我是参加了，那时我没有坚持意見，盲目地跟着党組跑了，今后要接受教訓，支部不能跟着党組跑了”。閻这一阴谋失败后，便进一步地捏造事实向党进攻，向陆檢察長說：“裴仰山同志給我打來電話，要在党組会上討論你的思想”。尤其在整風运动中，閻怀疑人事处楊庆浩同志，向省委反映了她的問題。她借着省委指示要从省院調一名处长的机会，又捏造了省委決定，向陆檢察長說：“王志杰同志对我說，省委決定調楊庆浩，不能变卦”。更不可容忍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她借向高檢彙报工作之机，在牛喜珠案件上，捏造了张老的指示。张老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对牛喜珠案件要抓紧处理”。但閻从高檢回来后向陆檢察長传达时即捏

造張老指示說：“牛喜珠案件不管林鈇檢討不檢討，我張鼎丞要檢討”。陸、王檢察長將她捏造的這一指示向明河同志作了彙報，當時明河同志指示：“要閻寫個文字材料報省委”。閻偉鋒不但不寫，反而抵賴說：“我對明河同志有意見，你們（指陸、王檢察長）都去北京開過會，為什麼不讓你們寫材料，偏讓我寫，這是不相信幹部”。閻偉鋒憑借副檢察長的身份，獨斷專行，抗拒黨委的決議、指示，為時已久。一九五七年整風初期，承德地委為了及時打擊現行罪犯，經研究決定將逮捕拘留條例第五、六兩條（包括對現行犯的批捕權限），下放到縣委。而閻同年六月到承德檢查工作時，以她檢查出的所謂“八起錯案”為根據，即指責分院對批捕權限控制的不嚴，縣里超越了職權，亂行逮捕，不依法辦事，擴大了現行犯的范围。公然推翻了地委的決定，並指示分院：“將審查批捕的權限仍控制地委，各縣不准隨意擴大現行犯的范围”。早在一九五六年冬季，閻偉鋒聽到省委決定要從省直各部門抽調幹部到專縣檢查工作的消息後，閻即秘密告訴南星將三處人員趕快分散下去，逃避省委抽調幹部。同年河北幹療院，有一住院的黨員幹部身死，省委電話指示：要檢察院立即解剖查明原因。而閻偉鋒多次抗不執行，反而再三追問省委何人打來的電話。有一次當省委召開會議時，閻去聽報告，被服務人員查問了一下，她回機關後，即大發雷霆，罵河北省排斥外來幹部。一九五七年七月高檢指示，糾正過去各地參與公安機關偵察、現場勘驗、搜查逮捕，扣押等監督，而閻偉鋒拒不執行，企圖把專政矛頭指向人民內部，擅自將自己搞的違背高檢指示的材料通報各地。當時丁石川（副處長）同志再三向她建議，此材料不必通報，她不但不予考慮，並蠻橫地說：“我說發就得發，有錯誤我負責”。此外，閻偉鋒攻擊黨，誣蔑領導的事實是帶一貫性的，如誣蔑陸檢察長無能，說話抓不住中心，愛拌舌頭。陸檢察長有一次批評省院幾個同志要求退出工會不換工會証，她即散布說：“陸檢察長給工會學腰，多管閒事，事務主義”。並誹謗

說：“工会对我沒福利，我对工会不感兴趣”。在伟大的肃反运动中，省委通知各机关五人小組成員去省委开会，陆檢察長指示，讓她参加省委召开的肃反工作會議，她拒不参加。一九五六年省委和省人委在一天召开三个重要會議，須要三个檢察長去参加，当陆檢察長征求她的意見参加那个會議，她毫无理由的拒絕說：“我那个會議也不参加”。

3. 散布流言蜚語，污蔑工农幹部，品質恶劣，作風蛮橫。閻平时对处长一級的幹部，經常进行誣蔑、誹謗，她散布郑江（五处处长）不象个处长样子；赵佐臣（办公室副主任）办事办不好，連个会也开不了；楊庆浩（人事处处长）沒能力，作不了人事工作。並誣蔑寇庆水（副处长）同志拙嘴笨舌，說話說不出一个原則来；馬庆瑞（副处长）不行，幹不了工作。相反的赵佐臣同志向她反映右派分子李涛思想意識不好，她即說：“这个幹部不錯”。閻伟鋒作風蛮橫，品質恶劣更为突出。陆檢察長和閻同时坐車出去开会，若先接了陆檢察長，閻就不滿意，曾有一次先接陆檢察長回来，車走到帅府胡同南口（离机关还有几十步）遇到她，汽車鳴笛，她就不躲道。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不仅在本院，还涉及到下級檢察院。一九五六年閻帶領工作組到邢台检查工作時，分院請她看戏，因向地委沒借到汽車，閻竟然將戏票撕碎。

二、处理意見

党組認為，閻伟鋒这一系列的反党言行，是有她的階級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的。閻自小生长在官僚破落地主的家庭，在家过着不劳而食的剝削生活。虽然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后，經党长期的培养教育，但其反动的階級本質尚未改变，资产階級的个人主义佔着統治地位，自参加工作后，就怀着“当領袖的欲望”。她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孤立的，远在察哈尔省工作时，她曾攻击过妇联会主席，調来省院后，即和其他右

派分子糾合在一起，內應外合，向党进攻。她的反党事实被揭發以后，經大家多次帮助下，她在几次检查中，玩弄手法，进行頑抗抵賴，在群众摆事实、講道理面前，亦不作交代，抱敌对情緒，态度極不老实。

据此，党组一致同意省委关于对右派分子閻伟鋒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安排工作的批示。党组意見由十一級降为十六級，可安排到农場工作。

×

×

×

省委已批准訂其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另行分配較低工作。

中共河北省委监委

中共唐山鉄道学院委员会对 右派分子白鉄岩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白鉄岩，現年四十二岁，辽宁省沈阳市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个人成份是学生，一九三七年七月参加革命，同年十月由王达、张柱二同志介紹入党。由于入党动机不純，經不起党的考驗，同年自动脫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又重新入党。曾任晋察冀日报編輯，东北鉄路总局厂务部长，大連鉄路工厂副厂长等职，現任唐山鉄道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員。

白鉄岩在将近20年的工作历史中，从許多重大問題上証明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極端个人主义者，爭名誉、居地位，在領導作风上施行家长統治，粗暴蛮橫，一贯违反党的政策，对党不满。

在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期間，白鉄岩任东北鉄路总局厂务部

部长时，向其姐夫美国间谍于葆廉洩露軍事秘密，給党和人民造成很大損失。在“三反”时期，又表現严重的自由主义，抗拒运动，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要求各单位领导把“三反”运动搞好，否則要受撤职处分，白則公开散布說：“这是吓唬神經衰弱的人”，曾被停职反省一周。在大連鐵路工厂任副厂长时，破坏国家財經制度，並假报成績，鬧不團結等，受到中共大連市委在党报上公开批評，白鉄岩对此一直不滿。在这次整風运动前后，白鉄岩又向党向人民大肆进攻，主要有以下事实：

1、借唐山鐵道学院建校問題公开煽动群众，把火引向中央，企圖用群众压力反对中央关于唐山鐵道学院在唐山扩建的决定，並捏造事实給滕部长写信，企圖威胁，同时給同学作煽动性报告說：“建校問題不是学校无能而是上級的官僚主义”。“可以組織代表团或彙报团到中央去談”，並企圖同意学生要求停課，討論建校問題（实际是鬧事）的意見，並在工会委员会上提出三点綱領性的反党建議：第一、建校問題是一个細致的艰苦斗争；第二、目标要明确；第三、建立組織机构，进行調查研究，以加速建校問題的解决。在白鉄岩及其他右派分子的策划与煽动影响下成立了反动的“建校促进委员会”及进京代表团，与在学院的牆壁上貼出了“收复失地”“重返花园路”“反对铁道部、高教部对唐院慢性暗杀”等反动标語口号，形成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嚣张气焰。从許多事实分析，白鉄岩是蓄謀已久，有計計有步驟，有目的地採用各种手段企圖推翻中央关于唐院在唐山扩建的决定，以达到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慾望，和使群众对党不滿抗拒党和国家的方針政策，是公开反党反中央的恶毒行为。

2、否定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反对学校向工农开門的方針。白鉄岩公开散布說“高等学校党委制有无問題不一定”，並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內行”等反动謬論，仇視工农幹部和不关心工农幹部學習，其实质是企圖把党及工农幹部推出大門。

3、反对民主集中制，歪曲党的政策。白鉄岩認為毛主席十

条方針对学校关系不大而反对深入学习与貫徹执行。認為鐵道部幹部政策有問題，幹部外行不懂业务。整風時在学生座談会上歪曲党的“肅反”政策，說：“过去紅旗政策时期，肅反一杀是几十几百”，並在給畢業班作“再論无产階級专政历史經驗”學習報告時，污蔑党的历史，說：“过去党不懂得團結——批評——團結，开除了陈独秀、张国焘，現在看来是不必要的”等等。

4、誹謗鐵道部的領導幹部，蔑視唐山市委及兰州市委的領導，散布对学院党委及其他同志的不滿情緒，破坏党的團結。

5、白鉄岩还丧失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質而一貫玩弄妇女：在一九五二年白鉄岩就曾利用职权和地位玩弄了在他所領導下的两个女職員；在学院工作期間白鉄岩身为高等学校的副院长（当时代理院长）、党委委員，不顧党的影响又玩弄了一个女学生，特别是在此次整風检查中竟与該女生去信欺騙該女生說他已离校（实际他正在校作反党言行的检查）並要求保持这种不正当的关系，而不向党作交代，这种品質異常恶劣，亦是党所不能容忍的。

半年以来，党内外对白鉄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了多次揭發和批判，而白鉄岩並未作徹底的检查和交代，直到支部大会討論其处分时，对党仍不老實，对其丧失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行为仍隱瞞不作交代。二十年来白鉄岩一貫拒絕党的教育，堅持錯誤，以致最后墮落为資產階級的右派分子，已成为党的叛徒和敌人。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党委同意該支部对白鉄岩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並建議上級領導撤銷其一切行政职务。

中共邯鄲市委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田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市整風运动中，徹底揭發和批判了市委委員、矿务局党委第二書記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我市党組織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純潔和巩固党的組織，增强党的战斗力，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極為重要的意义。

张田虽受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根本没有确立，当民主革命轉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由政治上的动摇而走向叛党。当波、匈事件發生后，特别是我国人民內部矛盾也比较显露出来的时候，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赤裸裸的暴露出来，而且达到了最高峰。张田是一个極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达不到目的则对党不滿，尤其是当他攫取矿务局党委第一書記的野心未逞，便發展到仇恨党，反对党的地步。

张田反党活动的突出表现是：在政治上完全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上，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恶毒地攻击和反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政策。

他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正确性，否認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績，他把波、匈事件的發生归之于农业合作化，誣蔑說：“苏联农业搞了几十年，还没有搞好，现在荒地很多。中国不出問題則罢，出問題也是出在农业上。”当我国人民內部矛盾比較突出起来的时候，他进一步夸大並捏造事实說：

“我国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很多好地都荒了。什么千斤亩、千斤队，都是下级干部为骗取荣誉向上级作假报告，村干部强迫命令很严重，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造反了。”他不仅如此而且恶意的诬蔑说：“毛主席只知道好的一面，下乡也是到好的地方去”。

他否定肃反、审干的成績，恶意的歪曲事实說肃反、审干搞糟了，老干部离心离德了，知識分子消沉了。他誣蔑党組織在肃反中对重点人“集中”、“搜查”是“侵犯人权”、“违犯宪法”。恶毒地攻击肃反中的积极分子，說积极分子写检举为的是得奖而陷害人，和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实行内外夹攻。他並公然替反革命分子辯护，說人家要革命，我們不能象赵太爷那样，不让人家（反革命）革命。更恶劣的是，替反革命分子开脱罪責，擅自武断地将反革命嫌疑加以否定。他为了达到其反党目的，曾積極地在受过处分的党员中、在肃反对象中、在被党审查过的人员中进行串連活动，对其表同情或帮助其翻案。並揚言我只要在南边（指峰峰新市区）走一遭大民主就会起来。不难看出，他已經完全站到和党对立的地步。

张田对于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从根本上加以反对，他說：“历史上的运动，偏差很大，伤人过多，錯誤相当严重。”他誹謗省、市委根据四中全会精神解决矿区领导問題是“以宗派反宗派，是无情打击。”他在党的干部政策和建党問題上，散布取消阶级分析的观点，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什么阶级成分也沒有了”，“知識分子知識很多，不用培养就够党员条件了。”他甚至連党报也进行恶毒的誣蔑，說：“人們写假稿子就登报，不那样找个叉就受不了”。

整風运动开始后，张田則完全和右派分子站在一起抵抗党所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他对于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一直抱着拖延、抗拒和反对的态度。一方面对于中央指示：轉向反右派斗争，解决敌我矛盾問題；用阶级分析方法划分左中右的

問題；反右派斗争必須依靠党团员和左派群众；对于党内右派也应和党外右派一样，一視同仁等等，公开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則把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歪曲为是因肃反得罪了人家，或借口是过去的积极分子等，对右派分子加以包庇、縱容、袒护等，以达到破坏党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张田不仅是在政治上和党对抗，並且从組織上猖狂地向党展开了进攻，粗暴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則。

他把资产阶级的技巧权术搬进党内来，本来党组织过去对他一直是信任的，解决矿区問題他是积极分子之一，他的工作一直是被重用的，但他却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說什麼党组织对他不信任，自己一貫受打击和排斥並打着为矿区鳴不平的幌子，借以煽起群众对他的同情，使党组织处于困难和被动地位，企圖达到他反党的目的。他为了抗拒上級党的领导，把下去帮助工作的市委負責同志和工作組，都說成是市委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監視”。他把工作中的成績都归为己有，貪天之功为己功，反之他把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錯誤，加以夸大，强加于別人，借以达到反对別人的目的。

张田为实现其反党目的，在局党委內部爭权夺势，独攬大权，还用了剝削阶级的技巧权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抓別人的小辮子，鑽別人的空子，以打击別人，抬高自己。重大問題不經党委討論，就擅自决定处理。个人意見經常强加于人，遇有和自己意見不一致时，就大發脾气，斥責別人对他不尊重，或者說人家不懂，而武断的加以否定，严重的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則。

市委認為，张田所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首先，我們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間的斗争不仅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現得特別尖锐化，这种斗争不可能不在党内反映出来。张田所以在波、匈事件發生之后，特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人民內部矛盾也比較显露出来的时机在政治上背叛了党，完全站在资产阶级

右派立場上，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正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具体反映。

应该指出，张田虽受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但由于他固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所以一有条件就会暴露出来，並力图按照他的面貌改造党，这次事件的发生，实质上是他的反动思想的总暴露。

应该看到，张田的叛党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张田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追求名利、地位的欲望极高，虽然党对他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但他贪而无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欲望，却始终得不到满足，所以他总怀疑党对他不信任。当其受到党的批评时，就更加对党不满。一九五七年，他攫取第一书记的野心未逞，对党更恨之入骨。因此，他便由极端个人主义，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

应该着重指出，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揭发之前，矿务局党委对他並不是沒有斗争的，当揭发了他的罪恶活动之后，市委和局党委的负责同志都曾对他进行谈话，帮助他提高认识，正视错误，力求对他进行改造。但是张田却一直坚持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並两次以自杀的叛党行为，拒绝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挽救。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张田已经完全叛变了党，成为党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市委认为，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对于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他损害了党的威信，损害了党的团结统一，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鉴于张田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市委委员和矿务局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並在党内外予以公布。

中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局

支部委員會关于开除右派分子

王斐然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王斐然，男，五十五岁，河北阜平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職員，一九二一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入党，一九二七年脱党，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县财政科长、县长、专员、雁北办事处主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司法处长、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华北分院副审判长等职，北京解放后任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现为中共北京市委候补委员，市监委委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斐然在整風反右派斗争期間，支持同情右派分子的言論，与右派分子共鳴，利用他的领导职务，对和他关系密切的右派分子多方袒护、包庇，与右派分子賀战軍訂立攻守同盟；反抗市委领导，污蔑市委不懂法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宣揚旧法观点，如“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依靠重用旧法人員和其他政治历史上有严重問題的人；长期以来組織反党宗派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以上事实說明右派分子王斐然，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場，成了党的叛徒。为了純潔党的組織，支部大会到会党员五十三人，其中预备党员三人，正式党员五十人，一致通过开除右派分子王斐然的党籍。

附：右派分子王斐然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言行

一、整風、反右派斗争期間的反党活动

支持同情右派言論，与右派分子共鳴。整風初期，法学界座談会上，有人攻击党对政法部門和高等院校的領導，会下王斐然对右派分子賀战軍說：“唉呀！这風不整真不行呀！宗派主义多严重，真是糟得很。”在高级法院的整風座談会上說：“现在看来整風是非整不可，从报上看来，简直是怨声载道”。王斐然利用他的領導职务，对和他关系密切的右派分子多方袒护、包庇，如对右派分子郑孟平、李接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拖延不报，市委批准郑孟平为右派之后，他还說：“先斗吧！将来甄别定案时再說。”王斐然不仅在整風前后支持和縱容賀战軍进行反党活动，賀战軍被撤銷整風領導职务和划为右派之后，仍对其包庇、袒护。賀战軍被撤銷整風領導职务时，王事先了解賀的問題，但在向群众宣佈时，他一再強調賀是右傾問題，不是右派問題，並为賀出主意只检查右傾。王斐然不但不積極領導反右派斗争，反而給群众泼冷水，在主持斗争右派分子賀战軍的会上，群众要求賀徹底交代問題，王竟說：“这就是交代嘛！这就是交代嘛！”另一次会上群众責令龙茜、余靜佳（与賀战軍都有攻守同盟）交代与賀战軍的关系，王竟大声制止說“不要强加于人！”

与右派分子賀战軍訂立攻守同盟繼續与党对抗。右派分子賀战軍的反党言行，有的与王斐然是共同的，有的受王斐然支持縱容，王为了隱瞞自己的反党罪行，利用其妻吳作賢与右派分子賀战軍串連，通風报信，訂立攻守同盟。王斐然多次讓吳作賢到賀的宿舍观察动静。賀战軍訂为右派后对吳說：“放心吧！好汉作事

好汉当，不怨天不怨地，怨我自己錯了，一貫道講話，不拉前不扯后。”並說：“王院長的問題我怪兜多少兜多少。”反右派斗争深入的时候，賀对吳說：“鬧來鬧去，團結問題非得把王斐然鬧出來不可。”賀还对吳說：“王斐然告訴过他，刘仁同志批評賀战軍工作不積極，男女关系有問題。”吳作賢告訴了王斐然，王說：“怎么把这問題也談出來了。你告訴他不要这样說出。”吳又轉告賀战軍。王囑咐吳与賀的串連活動中要“多听少說”並对吳說：“發現情况先向我說，然后再告訴組織”，“賀战軍說我的問題你不要叫組織上知道。”吳作賢全照办了。

二、反对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

1，反对党的领导、誣蔑市委不懂法律：王斐然借口审判独立，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五年向郭步岳同志說“現在审判独立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党委干涉，現在区委干涉区法院，簡直連判決都不能下了。”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王又对郭步岳同志說：“市委不懂法律，有些事情不好办”等等。

2，抗拒市委指示与党对抗：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期間，在政法联办討論复查的案件时，馮基平同志等对王斐然、賀战軍提出的荒謬論点不断地进行了批評，王始終坚持錯誤，会下对賀战軍說：“唉！建設法制真是個艰苦的事，不容易，应当耐心等待覺悟提高，才知道自己（指馮基平同志）是錯的嘛！”还讓賀战軍到会上去“百家爭鳴”。不仅如此，在行动上抗拒市委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八月底馮基平同志根据市委指示，在政法联办会上明确指出：除了冤案以外，一律暫不改判，需要改判的案件，待研究后再定。但王斐然竟擅自将有爭論的案件进行改判（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日市委在討論法院工作的会上，对其右傾与抗拒市委指示的問題提出了严肃批評，王也始終未作任何檢討，也沒有採取措施）。拒不执行市委的決議，一九五六年彭真同志在市人代会上提出要各单位檢查官僚主义作風問題，市人委根据彭真同志的

指示作了专门佈置，各单位都作了检查，唯王斐然借口工作忙，始终未作检查。

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和宣扬旧法观点，歪曲、诬蔑党的方针、政策

1，王斐然大量散佈“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反动论点，叫幹部在实际工作中“大胆参考伪六法”。一九五六年最高法院工作通讯第四期刊登了“无罪推定”的文章，王亲自起草通知各级法院幹部学习“无罪推定论”，並推荐给郭步岳同志，在貫徹全国第三届司法会议精神的大会上說：“审判員一方面审案子，一方面可以作被告的辯护人。”对于“証据”、“坦白”、“前科”等也都要根据有利被告的论点去解释。

2，歪曲诬蔑党的方针政策

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期間，王斐然說：“过去提五个方面的敌人，这个概念不科学”，現在这样提更“沒有法律根据”。在复查案件中他把現行的反革命說成是历史反革命，把反革命罪解释成一般刑事罪，把严重罪行認定成一般罪行。在討論人大常委“关于寬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时說：“軍、中統特务分子是反动組織中的一般成員”（即不应当算作反革命分子）。

3，說鎮压反革命太严了

对于处理敌逆产案件，王斐然提出“不与民爭利”。当一九五六年中央决定对反革命犯实行寬一点的精神时，王斐然認為“过去統治的太严了。”他說：“不只鎮反，連別的方面都寬了嘛，老是那样还得了。”

4，攻击人民民主法制

王斐然把法院产生錯案的原因說成是由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他說：“我們办案子，只有框框，沒有格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政法联办討論检查前門区法院案件时，王还在

会上說：“概括起来产生錯案的原因有三条：（1）从领导到一般幹部法制观点不强，不依法办事；（2）幹部的法律知識欠缺；（3）法制不完备，所有刑事案件都沒有法律。”

四、依靠、重用旧法人員和其他政治历史上有严重問題的人

王斐然一貫依靠、重用旧法人員和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他在一九四九年接管伪法院时，违背中央和市委的指示，虽然解除了伪推检員的职务，但却留下了一些伪推检以上的人員，以后又陸續从新法学研究院吸收了大批旧司法人員，其中大部分是历史或現行的特务、汉奸、地主恶霸等反革命分子，並且还利用一些私人，也大都是旧法人員。司改后仍未作認真清洗，这些人很多被安置在重要审判崗位和行政崗位上，对他們推崇备至，还讓老干部和青年学生幹部向他們学习。右派分子余樾，其父是北洋軍閥时代的大理院院长，本人曾任伪推事、檢察官多年，旧法观点根深蒂固，王却贊赏余是“老子英雄兒好汉。”並积极主张提拔余樾为中級法院刑庭副庭长，並要吸收其入党。

五、組織反党宗派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王斐然与右派分子賀生高之間早在司法改革以前就已互相有意见，司改后，王斐然認為賀生高在司改中对其进行打击，因而对賀生高怀恨在心，遂拉攏右派分子賀战軍和賀生高进行宗派斗争，双方各自拉攏培植一批私人势力，明爭暗斗，互相排挤。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期間，王斐然与賀生高完全与四中全会的自我批評、加强团結的精神背道而馳，互相攻击，进一步分裂党的团結。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之后，形成了以王斐然和賀生高为首的两个对立的反党宗派集团，这两个集团在日常工作中，政治运动中进行着反党的宗派活动，这一活动一直到反右派斗争他們被揭發为右派分子为止。

中共北京市司法局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賀生高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賀生高，男，四十五岁，陕西省清澗县人，貧农出身，貧农成份，一九三四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县保衛局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科长、专区保安处副处长、北京东郊分局局长、管訓处处长、北京市法院副院长，現任司法局局长。

肃反运动中，因袒护斗争重点张思之，阻碍肃反运动，被撤銷五人小組领导职务，后来又繼續与张思之进行非組織活动，始終不肯真誠檢討，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整風运动中因将中間分子梁文茜（現为右派分子）叫去参加左派分子会，洩露机密，严重丧失立場，被撤銷整風領導小組职务。

賀生高的主要反党言行：

一、对肃反中的处分不滿，企圖翻案，乘党整風之机，煽風点火

整風开始后，煽动肃反中重点张思之（現是右派分子）說：

“肃反問題是个重点，其实他（指五人小組王斐然）把結論作出来，承認整錯了，在群众中宣布一下，就把大部分問題解决了。”並說：“肃反問題不解决，整風沒办法。”“遇到机会你就講，讓群众了解真象。我現在不能說什么，我要談話，問題就复杂了，你們談，我把它搞成簡报。”在整風鳴放会上，又煽动肃反中被从寬处理的反革命分子郭可宏（右派分子）說：“老郭，你在市委（指市委召开的知識分子座談会）說了那么多，为什么現在不說了。”並多次讓郭将攻击法院党内不團結的問題写

成書面材料交給他，以証明肅反是打击报复，当郭可宏和肅反斗争重点赵威侯、陈建国（都是右派分子）貼出反党大字报后，他又鼓动說：“可以自由醞釀，不算自由主义。”並对郭說：“現在誰是不是反革命还不清楚嗎：！”当陈建国將潘守謙（反革命分子，現已开除）回机关鳴放情况告訴他后，他說：“放吧，放出来就是好事情。”又煽动周奎正（右派分子）說：“有問題你揭吧！不管什么都可以揭。”当肅反斗争重点譚泉（右派分子）問他对肅反有意見怎么提时，他即指示說：“就說是对肅反中的一些作法有意見，不是对肅反有意見。”

二、反右斗争中包庇右派，阻碍运动

反右开始后，司法局黨員幹部陈甲在支部会上批評了賀生高，並說周奎正、张思之、譚泉是右派，会后賀即为周撑腰說：

“你在下次会上揭他（指陈），你的問題我知道，不是什么大問題，你不要怕他，他說別人是右派，問問他是什么派。”在政法学会斗争右派分子楼邦彦的会上，他同情地說：“够啦！够啦！有所檢討就行啦。”又对周奎正說：“你在批判他們时，找个时机檢討一下，自己就脫出来了。”当司法局整風领导小组确定张思之、譚泉为右派时，賀竟两次找刘杰三同志說：“你說的話馮（基平同志）相信，你抽工夫亲自找馮說一下，张思之没什么問題，过去肅反时是王斐然打击报复。”右派分子张思之在被斗争期間到新华書店偷書被抓获，賀还多方袒护包庇，說张是神經失常。为此张被释放后，写信感謝他，当市委多次找其追問此信时他假装沒收到，向党隱瞞这一反党行为，直至张思之当面对証时，他才不得不承認，但拒不交出信件。

右派分子周奎正在会上揭發了他的反党言行，群众反映朱金涛有問題，他即对朱說：“注意周奎正要轉移目标。”“反右斗争你出了不少力，虛心一点，不要在群众里嚷嚷，大家屁股都有尿。”企圖讓朱隱蔽起来。司法局整風领导小组研究朱金涛（右派分子）的反党材料，他百般为之辯护。會議通过之后，他又乘

整風領導小組長楊義同志不在，召開非組織會議研究朱的材料，並指定其中一成員給市委打電話的機會，暫時不要批。反右深入時，他說：“把能下放的幹部都下放，不要把幹部都弄成右派。”右派分子郭可宏揭發了他。他找郭談話，說郭交代問題有陰謀，並威脅說：“你的事我不管，等處理你的時候再說。”

三、攻擊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污蔑鎮反政策

他說：“咱們的審判員憑空氣辦事，中央說寬就寬了，說嚴就嚴的要命”，“審判員办案隨風倒，固然是問題，但主要是放風的（指中央的政策、方針）把風放的太大，放了十二級台風。誰都吃不住，不倒也得倒。”他認為：“盲目長判不能怪下面，要找放風的地方。”

他擅自修改張友漁副市長批示的關於處理強姦幼女案件時，同志們批評他，他非但不接受，反說：“張友漁又不是金口玉言，為什麼不能改。”他又長期不貫徹市委批示的“一九五七年全市司法工作計劃和提高案件質量”文件。並說：“不是市委批的，是政法部看的。”他還惡毒地攻擊歷次鎮反運動說：“我們遇到運動就要找典型，群眾一反映就判罪，找不到點心（典型）就要拿月餅”。

四、賀生高一貫依靠、重用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培植個人的反黨勢力，進行反黨宗派活動。肅反時化裝到前門外與鬥爭重點張思之訂立攻守同盟，阻撓張思之交代問題。並一再贊揚潘守讓（反革命分子）、張思之、譚泉（都是右派分子）“年青有能力，是法院的精華”。他還對潘、張說：“你們的歷史問題作不了結論，因為領導上意見不一致，我早就沒意見了。”“要不是我，他們（指黨組其它成員）早把你們整苦了，他們就是想把你們整成反革命。”張思之、譚泉肅反後政治歷史問題尚未作結論，賀即將他們分配到律師協會任法律顧問處副主任。並說：“市委政法部沒有同意，我就宣布，還是我這個人大胆”。周奎正（右派分子）歷史問題很複雜，賀卻把周當作左、右手，並且

先后要提周及郑孟平（右派分子）为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又把肃反中被从宽处理的反革命分子郭可宏留在办公室作秘书工作，並向其示意：“你有历史問題在这兒还容易弄得清，在別处不了解你，可能搞成反革命。”机关肃反五人小組向他提出不應讓郭在办公室作秘书工作，他說：“肃反作結論由你，使用幹部由我。”

賀生高是个严重的个人主义者，一貫目无組織，重用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培植个人势力，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肃反运动中因袒护斗争重点张思之进行非組織活动，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又坚不接受处分，並对党不滿。攻击党对司法工作的領導，污蔑鎮反政策，整風期間向肃反斗争重点煽風点火，指示他們从肃反問題上向党进攻，並出謀划策。反右派期間讓中間分子参加左派分子会，严重的洩露了机密。更严重的是，反右派期間接到右派分子张思之的信，不但不交給組織，在市委的多次追查下，又伪装沒收到向党隱瞞，还百般的包庇右派分子。以上問題說明，賀生高已完全堕落为党內的右派分子，成了党的叛徒。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組織，支部大会決議开除賀生高党籍。

中共北京市房管局第二支部 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馬陵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馬陵，曾用名业韶、許智，男，三十八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一年入党，一九三九年十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偵察股长、市、县公安局长、南京市公安局保衛处长等职，一九五五年調北京市机关房管局（房建局前身）任副局长。

馬陵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在整風初期，慫恿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一九五七年五月右派分子卜一明大肆誣蔑党独断专横不民主，叫嚣配备录用干部要实行考試制，攻击三反、肃反是主觀猜測和对人格污辱等。馬对这些反动言論不但不駁斥，反在背后对卜說：“你的發言不够尖銳，太和風細雨了”，並指使卜将發言內容整理一下，送北京日报。右派分子朱荣傑發表了沒咀的人是好幹部，局内党群之間有墙沟等反动言論，馬贊揚地說：“小朱的發言很好”。

二、包庇右派分子。反右斗争开始后，整風領導小組討論卜一明的右派言行时，馬說：“卜的动机不坏，有爱护党的意思，应划卜为左派”。当整風領導小組研究右派分子郭若希（馬陵的爱人）的右派言行时，馬很有情緒並帶有气憤的口吻說：“对郭的問題，我不發表意見，我要求党组审查我有无洩密的地方”。並要求郭若希當場对質。第二次会上馬向党组質問說：“我請問党组，郭若希是不是右派，她的言論是否代表我馬陵？”又說“郭的錯誤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小資产階級意識”。在整風領導小組已确定郭为右派时，馬向整風办公室要了郭的材料，並在材料上划了很多問号。並告郭說：你發言原記錄沒有記着“要領導小組四人下台”，你不要乱承認，当郭被批判时，就在馬划問号的問題上一直要賴。

三、同情和宣揚右派分子华攬洪的謬論。他說：“我們建房按人口比例比解放前降低了30%。我們重建不重管，不如英国、日本，他們都有管房大臣。”他又否定一九五六年房建局的工作和总支工作的成績（这一年馬去學習了）說：“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成績是不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我有怀疑。”

馬陵的反党行为不是偶然的，早在整風以前他即在房建局拉攏与自己臭味相投的分子，攻击領導同志，破坏党的团結。整風开始后，他認為时机已到，一方面鼓励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一面当他們的真面目被揭露后，馬又以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副

局长身分为他们开脱、辩护；并与郭若希出谋划策，抵制对她的批判和帮助她翻案。由于馬陵披着党员的外衣，並窃据整風领导小组的成员，致使建房局的反右斗争受到一定的影响。

馬陵堕落为右派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馬的家庭是地主，个人成分是学生，是在日寇侵华后从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参加党的，虽然受到党的长期教育，但没有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当他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一些工作、有了一定成绩时，即以此作为争名夺利向党讨价的资本，当党不能满足其个人慾望时，即对党不满，並逐渐发展到与党对立，以致堕落到一个可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召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馬陵的党籍。

中共北京地質勘探学院 委员会对右派分子陈子谷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陈子谷，原名陈年裕、陈端坤，男，四十二岁，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入党，现任北京地質勘探学院副院长。

一、陈子谷所犯錯誤的主要事实

(一) 在大放大炮时的一系列言行

1、在五月十五日党委召开的講師老助教座谈会上，当右派分子尹頤齡和林墨蔭攻击汇报制度，說“汇报不全面，层层上报轉达不真实，领导偏听偏信，把汇报者看成第一号好人”时，陈

子谷在会上說：“我也有亲身体会，的确如此”；“我在延安沒有入党时也吃过这样的亏，也有人在領導面前說过我的坏話。”又說：“肃反斗了誰都不知道，要出佈告叫被斗人来登記。”

2、在五月十八日大系動員会上，当时学院內已貼了大字报，右派开始攻击肃反，污蔑黨員，並責罵党委沒有整風决心，当时党委指定他去大系向全体师生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党組織状况、黨員脱离群众、反映意見不真实、党委不团结和肃反問題上，說了下面一些話：（一）“我們党組織自下而上都这样涣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們下面党团幹部不接近群众，不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見，就是反映意見，也带些个人情緒。”（二）說“党委會意見不一致。”（听了就感到党委內部不团结）（三）关于肃反問題說：“現在大家对肃反意見很多，这問題很复杂，要分析研究，有人提意見說陈子谷領導斗争教員，事实不是这样，当时我在总务处工作，我沒有在肃反五人小組，当时是韓代望他們搞的，后来我作党委書記，連肃反斗争了誰都不知道，善后工作要，党委負責，就由我签字盖章，我曾反映过不了解情况，盖章很困难，后来上級党委决定党委書記盖章，我就盖了。”

3、在五月二十一日普地教研室第二次座談会上，当右派分子王蒙、馬万鈞、蔣蔭昌、边兆祥等攻击党委是宗派主义，攻击肃反斗争沒有根据，并大叫冤枉，号召知識分子要有骨气的时候，陈在会上說：“这就說明我們三害严重，特別是宗派主义更严重。……肃反是夏天搞的，当时我是搞总务，以后秋季調到党委會，我自己不清楚到底斗了那些人……我們材料不足就搞，侵犯人权，党中央指示我們的不是这样，我們搞錯了应負完全責任。”对于普地教研室的肃反对象，他全部否定，当面卖好。說吳达文（肃反对象，現尚未作結論，特嫌分子，右派分子）“我和他在一起比較了解，表現很好……怎么斗了？如果我知道，就不会这样做的。”並說：“不能說凡从国外回来的都有問題”。說“蔣蔭昌（極右分子）先生怎么会受到批判呢？在斯大林逝世时还表示要

參加民盟”，說：“高平（右派）先生被斗我也不知道……”，又說“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特點估計不足，敵我不清，時代前進了，但思想跟不上”，又說“自己也是個知識分子，是留學日本的，因此很了解知識分子的心情。邊先生（極右分子）這樣的人，都是沒有什麼的好人。”

4、五月二十三日普地教研室第三次座談會上，邊兆祥、馬萬鈞右派集團反黨達到高潮。右派分子杜恒儉說：“整風應撤銷我院黨委領導，地質學院的人好似生活在魔鬼峽谷中”。右派分子杜冠中說：“人事工作一团糟，裙帶風盛行，迷信黨員”，右派分子馬萬鈞說：“現在我好像回到了以前和國民黨鬥爭的時代似的……現在我才了解為什麼這次勁兒这么大……將來就會有第二次革命……地質學院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共產黨在地質學院表現為私產黨了……肅反中採取望風捕影的作風和國民黨沒有兩樣”等。在右派分子猖狂惡毒地進攻面前，陳在会上却講：“完全支持同志們的意見”，認為“是愛護黨的”，並且說：“肅反時我在總務處，關於吳達文問題的看法，我還受過批評”，他更歪曲事實說：“肅反總務處沒有搞幾個，只鬥了一、二個，其中有一個有些問題，很快作了平反，但是其它單位沒有接受我的意見，顯然是違反市委指示的”。還提到“總務處本來也捉了很多名要鬥爭，當我審查時都刪去了”。在當天下午地質類教研室座談會上右派分子曾提出要表揚進攻黨最猖狂的極右分子于仙籌時，他在當天晚上座談會上說：“于仙籌、趙傳珍、李度容……等我本來要提拔，但黨委不同意，說我拉攏人”，又說：“任淵（黨員）比朱志澄（右派）高一級，就是宗派主義”。

5、在五月二十九日第四次座談會上，陳子谷把他朋友的信給極右分子邊兆祥等看，並讓邊給右派分子傳閱，最後邊兆祥在会上念了信。大意是：“我們（指與陳子谷）是老朋友了，我是肅反中被鬥過的，本來這也沒有什麼，但那些假積極分子們，今天有的高升了，有的人入党了，這到的確使人生氣”。陳在会上

說：“上次會的情況我是理解的，所以我才讓大家看信”。這封信給王文魁等不少右派分子看過或念過。

6、對王文魁問題：王系中統北平市學生工作組成員，寫過黑名單，肅反時已作結論，因按當時條件不夠而沒有肯定他是反革命分子，但肯定是參加反動組織，陳是在王的結論上親筆簽過字的。一九五五年陳在給王文魁談話時對王說：“你的材料我已經看了，關於你的反動組織關係問題，由於某些原因，他們並沒有吸收你。”整風開始時王文魁想翻案，找尹鳳翔同志談話，對鬥爭他不滿。五月二十九日當王文魁看大字報時陳問他“他們（指黨委）找你談過嗎？”王接着說“我認為三反沒作結論不能作為鬥爭的根據”（尹鳳翔同志是說三反時的历史問題未作結論），陳表示同意。王又說：“尹稱有一個姓名、籍貫、特征和我一樣的人是軍統。這人是否就是沙灘我認識的那個同名同姓的人是軍統？”陳說：“可能就是那人”。因而王文魁極為不滿。認為沙灘那個王文魁並不和他同籍貫。陳子谷又把他朋友的信念給王文魁聽。

7、六月七日右派分子以溫昌芸事件來攻擊黨委陷害青年，黨委會對溫昌芸問題已作了結論，認為錯誤是由官僚主義造成的，責令有關黨員檢討，恢復溫昌芸名譽，並已將結論公佈。當日下午右派分子組織了溫昌芸問題辯論會，企圖通過會議作出黨委陷害青年的結論，並攻擊左派大字報。辯論會的主要組織者，右派分子蔡瑾在六月七日晨看大字報時，問陳子谷對溫昌芸事件的看法，陳說：“依我個人看法可能不是一般官僚主義造成的，這是個人不成熟的意見，不要外傳”。當蔡瑾說想組織大字報編委會來辯論此問題時，陳表示同意。六月十日蔡瑾感到氣候不冷又找陳談到溫昌芸事件。蔡瑾說：搞了討論會。陳說“這不要緊，關於溫的問題黨委也沒有下結論，粗枝大葉是解釋不了的，黨委意見有分歧”。

8、陳子谷和右派分子拉關係：陳拉右派分子邊兆祥、吳達

文說：建院時和吳、邊在一起工作過，我是了解你們的，肅反中我要是知道是不會這樣作的。又說我也是華僑，不能說凡從海外回來都要斗。陳在反右期間有一次從校外坐汽車回來，在校門附近見了吳達文趕忙下車，向吳握手問好，說：你的問題很快即將解決，以致安慰之意。陳再三說右派分子邢鳳鳴是個好同志，同意把肅反時的材料退還右派分子丛耀先和邢鳳鳴。陳又說右派分子林墨蔭是思想問題，我了解他，我和他哥哥認識，他不會有問題，一定要王哲民同志承認錯誤，並且親自道歉，又叫劉光鼎（黨員）轉告林好好工作，肅反斗錯了（王哲民曾一再告訴陳不要給林道歉）。陳經常見了極右分子馬萬鈞點頭握手致意，並在五月二十五日對馬萬鈞說：“你是搞自然科學的，我想不到你竟有這樣高的馬列主義水平，真是很不簡單”。

（二）在反右期間的言行

一、右派分子張忠胤對陳說：“過去報載領導幹部提高文化、科技水平，我認為可與體力勞動結合起來，如顧榮起（黨總支書記）王健（總支委）現在我系工作，可以下實驗室去掃地……”陳說：“我也有這種看法，可是他們不同意”（他們指黨委）。

2、在民主黨派反右中關於蘭仲雄、李世忠、王語今問題。八月黨委研究確定蘭是右派分子。肖英同志和陳子谷二人去市委，市委批示蘭是一般右派分子沒有問題，如果“以民盟主委搞聯合機構，代替黨委領導”一事屬實則是極右。回來後當天晚上陳對盟幹部說：“蘭仲雄黨委不同意扣右派帽子，你們要扣就由你們扣”。後來池際尚、關英又找陳問這句問話的意思陳說：

“不給蘭扣帽子，是黨委有意保護蘭過關”（事實上黨委並無此意）。第二天晚黨委會上肖英傳達市委批示，陳當時說：“可能我們二人理解不同。”但黨委最後仍認為蘭是右派。會後關英又問陳，陳說：“看一個人要從一貫表現去看，黨委有保護他過關的意思”。蘭仲雄的鬥爭會共開了四次，陳分工領導民主黨派反右，但只參加一次，發言內容只是說“黨委那一點對不起

你。”同时，八月二十日市委确定李世忠不是右派。但在这以后的盟干部会上，陈說：“李世忠是右派。”一直到十一月一日召开教职学生代表会议时，有李世忠代表池际尚、关英問肖英同志才知道不是右派。对右派分子王語今，党委常委会两次討論，絕大多数同志均認為王是右派，只因陈子谷不同意而未通过，当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王語今为右派又經市委批准后，陈子谷事实上不执行党委决定，当时党委由陈子谷負責民主党派工作，陈避而不参加斗争会，請他也不去，斗争王語今三次，他一次也沒有参加。

3、“山野”問題。陈子谷以个人名义支持学生会文学社出版的一个名为“山野”的鉛印刊物，並为其創刊号題頌詩。当党委提出这問題应由党委討論决定是否出版时，他大發脾气，認為他已給“山野”写了發刊詩，沒有必要再討論，甚至攻击党委，不知道就是官僚主义。后来党委决定由陈子谷領導，並决定“山野”出刊不許拿到別的学校去卖，陈在領導“山野”时期，亲自为“山野”向右派分子王語今約稿，刊登在“山野”第三期，並同意“山野”去地質学校銷售。陈在审閱“山野”第四期稿件后同意登載右派分子郭荣光的翻案文章，該班群众聞知此事不同意發表，陈又同意編委提出的将名字涂去，換个笔名發表的意見，結果此文登在“山野”第四期上。整風开始后，党委要求印刷所全部为校刊服务，陈却亲自去印刷所叫排印“山野”，特別在反右期間又亲自指示印刷所限期赶印“山野”，影响了校刊的正常出版（我院印刷力量不足）。

二、对陈子谷所犯錯誤性質的分析

根据以上事实，我們認為陈子谷在右派进攻的紧要关头，为了达到个人主义的野心目的，不惜卖党求饒，有意拉攏右派分子，攻击党委，抬高自己，实际上起了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作用，成为党的叛徒和資產階級右派在党內的代理人。

首先，陈子谷从肃反問題上来向党进攻。当右派大肆污蔑

肃反时，陈公开向右派投降，根本否認我院肃反的成績，說：“斗争的材料不足，侵犯人权，党中央指示我們不是这样，我們搞錯了，应負完全責任”，“斗争了誰都不知道，要出佈告叫被斗人登記”，“平反工作不認真”等。对于我院的許多肃反对象他深表同情，为他們喊冤叫屈說：“吳达文很好，怎么斗了？如果我知道就不会这样作”，“蔣蔭昌先生怎么会受到批判呢？在斯大林逝世时还表示要参加民盟”等。不仅如此，更阴险的是陈在肃反問題上竭力表白抬高自己，推卸責任，並利用右派进攻，把右派的火力引向党委身上。他歪曲事实說：“我沒有参加五人小組，只是签名盖章，当时是韓代望他們搞的”，“总务处沒有搞几个，只斗了一两个，其中有一个有些問題，很快作了平反，但其它单位沒有接受我的意見，显然是违反市委指示”。为了达到他拉攏反党力量的目的，当时只要肃反对象找他，他不分青紅皂白就道歉，如亲自向肃反时只經過批判的托匪外围“死水社”成員，極右分子林墨蔭道歉；向寬大处理的中統北京市学生工作組成員極右分子王文魁道歉；向至今尚未作結論的特嫌分子吳达文道歉。虽然党委再三告訴他这些人沒有斗錯，但他仍在会上会下一味道歉。此外陈並向許多右派分子和肃反对象念他朋友攻击肃反、污蔑積極分子的信，这更說明陈子谷不但否認我院的肃反成績，而且对其它地区肃反成績也同样是否定的。因此，我們認為陈子谷在肃反問題上不只是严重喪失立場，主动向右派投降，而且是有意識的拉攏右派，認敌为友配合和运用右派力量来达到反对党委的目的。

其次，陈子谷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歪曲事实，顛到黑白，贊同支持右派的言論，並多次向右派透露党委意見分歧，自己与党委並不一致，是右派分子的知心朋友。如在座談会上当右派进攻匯報制度和積極分子时，陈直接了当地以党員副院長，党委常委的身分起来用亲身經歷作証。当右派攻击說宗派主义是全院的主要矛盾，党委認識太差时，他贊同的說自己認為“宗派主义最严

重”，並举例說任湘（黨員）比朱志澄（右派）工資高一級就是宗派主义。当右派借温昌芸事件攻击党委陷害青年时，陈迂迴地应合說：“不是一般粗枝大叶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並且造謠說：“党委內部意見不一致，有人要說粗枝大叶”，实际上党委对此問題已作了否定的結論並出了公告。当右派分子要表揚極右分子于仙箒对党的攻击时，陈竟无耻的捏造事实，以討好右派說：“于仙箒等我原想提拔，党委說我拉攏人”右派分子攻击党委外行，水平低，不了解知識分子特点，陈就說“我們对知識分子估計不足，因而敌我不分”並一再在普地教研室座談会上及对个人来訪者表明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能体会知識分子的心情，自己也曾留學日本。因此我們認為陈子谷在以上这些原則問題上，也是严重地喪失立場，成为右派的应声虫，明确表示了要作右派分子的強烈願望。同时也表示了只有他才了解“知識分子”心情，一貫正确，言下之意，只有他才能領導学校，党委不能領導，以攻击党委，达到其个人野心的目的。

陈子谷有意和右派分子拉关系，組織力量，与党委分庭抗礼，給很多右派分子以安慰，支持，經常拉拉扯扯，重私人关系。如陈子谷因認識極右分子林墨蔭的哥哥，便認為：林墨蔭肃反被批判是錯了，林就沒有問題了。右派分子邢鳳鳴經常吹捧他，他便認為邢是好同志，並埋怨团委学生会为什么不用他，为什么“斗争”他（实际上肃反並未斗争只是找他談一次話），直到反右期間陈在負責民主党派反右工作中，拒不执行党委和市委的决定，根据个人好恶任意認敌为友，認友为敌，拉攏自己所好的一些“民主人士”，用資產階級的私人关系来处理严肃的政治斗争。陈領導“山野”是向党委的示威，把“山野”作为个人的独立王国，通过“山野”，組織自己的力量，与党委分庭抗礼。“山野”的成立，人員配备，約稿对象的确定等均不經過党团組織，独自一套，其宣传內容更与党委中心任务无关，反右时期，“山野”出版的第三、四期，沒有一篇反右文章，但却有陈子谷特約

的右派分子王語今的“告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郭榮光的翻案小說，“山野”的編輯對黨委宣傳部的同志更是側目而視。很清楚，陳子谷已經發展到在組織上向党鬧獨立，自成一套，在嚴重的階級鬥爭中，削弱黨的戰鬥力。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陳子谷在肅反問題上，和其它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以及組織原則上明顯地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為了個人名譽、地位，爭權奪勢不惜在黨遭到攻擊的時候，出賣黨的利益，向右派投降，並拉攏引導右派向党委攻擊成為右派在黨內的代理人，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陳子谷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陳出身於資產階級，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立場並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全國勝利後更滋長了極其嚴重的驕傲自滿，功臣自居的思想。一九五一年三反時，黨曾批判了他“爭名譽地位，不尊重組織，不能很好服從組織決議”，但三反後，陳到處表示對其批判不滿，一九五二年來地質學院後，嚴重的居功自傲，鬧名譽地位繼續發展，以致爭奪權力，一貫打擊報復，製造不團結，破壞黨內正常生活。從一九五二年擔任臨時支部書記起就拉曹添（宣委）攻馬杏垣（組委），對曹添說“馬杏垣世故深，修養差，你不要跟馬走”。以後不斷地在黨內鬧關係問題，如劉型（院長、黨委書記），肖英（副院長、黨委副書記），韓代望（黨委副書記），丰原（副教務長、黨委常委），尹鳳翔（黨委副書記）等。陳在任黨委書記時，集中力量攻擊劉型同志，同時又攻擊肖英同志。無中生有地說因工作關係和肖英同志接觸較多的總支書記是和肖英同志在搞宗派，並找人談話動員給肖英同志提意見。黨代會後，陳因未被選為黨委副書記而不滿，與黨委對立，拒不執行黨委決議，經常鬧“副院長和副書記誰領導誰”。對其它的黨委委員經常散佈流言蜚語，進行攻擊。黨委會議經常不到或遲到，對於以上錯誤黨委對他進行了多次耐心的批評教育，但他不僅毫不悔改，並且對黨委懷恨在心，一直發展到

大鳴大放，右派向党进攻时，陈子谷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丑恶面目就暴露出来，因而堕落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三、本人态度

经过四次党委扩大会议揭发事实后，陈子谷对重要事实均加否认，只承认思想意识和组织纪律有问题，为此，党委又召开对证会，在沒有拿出事实根据前，他矢口否认事实；当摆出证据后，他推说记不清了，或狡辩说他的出发点不是如此。直到市委正式批准为右派分子后，他仍然对自己的错误性质认识不足。

四、处理意见

根据以上分析，陈子谷属于一般右派，所以应按右派分子处理。他至今仍不承认错误，在事实面前狡赖，由此应按中央关于处理国家薪给人员右派分子的规定第四条处理。撤销一切职务，分配较低工作，按政府干部十七级待遇。党内开除党籍。

中共山西省委 关于开除高沐鸿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

高沐鸿，男，现年五十八岁，山西省武乡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以前曾任高小教员。抗战期间曾任县长，“黄河日报”主编，太行区文联主任。一九四九年全省解放后，历任山西省文联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当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党发动整风之后，高沐鸿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趁机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他假借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文艺上的公式主义，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这种背叛党的立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给党、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招致了严重损失。高沐鸿的这种背叛行为，是我国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这场斗争中，高沐鸿在政治上已经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高沐鸿这种背叛行为的揭露和斗争的胜利，不仅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团结，而且大大提高了党员的阶级觉悟。

二

自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这一短暂的时期内，高沐鸿曾经写了“一切为了提高一步”，“从鲁迅先生想到”，“追根”，“几个问题的我见”，“故乡春吟”，“艺术上的典型与真人真事”等八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前的现实生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以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进行了恶意的曲解和诽谤。这是他的反动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总暴露。高沐鸿向来以“独立思考”相标榜，“不说别人说过的话”，“不走别人走过的路”。然而当他决心反党的时候，却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然而然地同流合污起来，拾取右派分子的余唾和牙慧，向党发动了进攻。

高沐鸿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向党的进攻首先是对准了党的思想战线。他恶靠着个人仅有的一点资本——二十三年党龄的“老资格”，以一个“追求真理”的“正直”的老共产党员身分出现，来进行煽风点火。

高沐鴻在他所写的文章中，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系统地曲解和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在我国教条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势力”，“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头上，使得人们思想不能自由呼吸”。“教条主义已经几乎抢占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因此，人们只好“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只好“言论它之言论，行动它之行动，修养它之修养”。他在分析教条主义的根源时，竟认为教条主义产生于权威，根植于“一种统治势力”，“当反动势力居于压倒优势的时候，教条主义的发生，乃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反动势力去服务的；在革命势力占压倒优势的今天，教条主义的发生，则又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势力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规律”。很显然，高沐鸿的痛斥教条主义，目的在于反对占压倒优势的革命势力。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提出反问：“教条主义从何而来”。他自己认为“这却是一个尚未加以追求解决的问题”。所以他说：“在某种情况下，教条主义是无罪而有功的，而反对教条主义倒是无功而有罪的”，“你敢触犯这些商标吗？你就得小心你的脑袋！小心‘军法从事’！这些清规戒律，实际上有时竟变成了森严的‘军法’——原来就是教条主义！”从而他得出结论：“为保障革命的正义（这里所说的革命正义应该是括号内的革命正义），而来割掉这个表面上向革命献媚的家伙，实质上蛀蚀了革命的盗贼！”必须“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

看啊！高沐鸿的面孔多么兇恶！原来是要以资产阶级勇士的姿态来打倒马列主义了。他在“追根”一文中说：“教条主义的信徒们，毛病就在于无所思考，不肯思考，尤其不敢思考。在思想领域里完全没有个自己。”按照他的逻辑，思想领域里大公无私，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就是教条主义，就是要打倒的对象。而他所讚扬的自然就是那些在思想领域里充满了个人主义的信徒们了。这是十分明白清楚的招供。

高沐鸿在“故乡春吟”的长诗中，把农村干部当作“教条主

义者”作了極其丑惡的形象的描繪，他認為凡是根據黨的政策方針辦事的人，都是教條主義。他寫道：“蛤蟆你不往水里跳，為什麼站在岸上學人吹喇叭。老鼠你不往洞里鑽，為什麼作模作態學人樣。”在高沐鴻的筆下，農村幹部竟成為蛤蟆和老鼠，其用心之惡毒可想而知了。

高沐鴻在他所寫的文章中，對於黨提出的克服官僚主義問題，首先下了結論，認為這是“有點賊襲捉賊的形態”。在他的筆底下，把我們的國家機關和幹部，描繪得比國民黨還更加可怕。他說：“不知民間疾苦，首先就是官僚主義！認定自己的生活理應比人民高出若干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服貼於這一觀點，從而淡忘了和人民同甘共苦是寶貴傳統，這就是官僚主義！反對人們反對這種官僚主義，我以為就是最大的官僚主義！”誰曾反對過人們反對這種官僚主義呢？這不是極其惡毒的造謠誹謗嗎？事實是他把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幹部形容為一群為了“升官發財”，“無窮富貴”，“吃喝玩樂”的剝削者，這種惡毒的歪曲現實，是多麼陰險的挑撥！

高沐鴻對宗派主義的理解是更為荒謬和反動的。在他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是只准“放”，不准“爭”。如果對於放出來的“牢騷和偏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不正確的東西”，根據社會主義原則加以批判，那就“明白是一種宗派主義在作祟”，“這將會限制人們‘放’和‘鳴’的積極性，而使大家停步不前。”這就是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必遵循什麼原則，不必要什麼標準，不要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這分明是為資產階級辯護和效勞！

高沐鴻在文藝路線問題上，也是和黨存在着根本分歧的。他堅持反動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反對黨的文藝路線。黨從來認為文藝是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社會主義的文藝必須接受共產黨領導，必須為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之所以是最好的創作方法，首先是因為這種

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同群众结合。然而高沐鸿却千方百计地反对这条路线，甚至不惜采用谰黑、诽谤手段。他在谈到工农兵方向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写道：有人“担心一个党员作家有时会忘掉了这个方向……为什么他们不去担心过去宣传‘工农兵’方向以致于造成体裁与形式不够多样化呢？难道这种担心已经不必要了吗？我看未必。掩护在一句已经确立的口号之下，不去理解‘百花齐放’的新意义，这乃是宗派主义思想情绪在作祟呀！”看！他污蔑毛主席倡导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是宗派主义。他说工农兵文艺方向限制了人们的积极性，扼杀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说我们的创作不自由，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对生活不敢进行大胆干预，因而只好阉割生活中的一切矛盾。种种谬论，不一而足。他妄称党的文艺不敢尖锐地批评与有力地讽刺现实，是由于死抱着“无缺点论”，“无冲突论”的尾巴的结果！高沐鸿认为艺术家不来批评社会上一种概括的典型的错误和缺点，那就是要求艺术良心同这种错误和缺点和平共居，那就是要阉割艺术的天职，使艺术家停笔。这一连串的无中生有的诽谤，无非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高沐鸿从来也不提文艺的党性、阶级性，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必须接受党的领导，文艺家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等等问题。相反的他却热衷于“独立思考”，“创作自由”，“揭露黑暗”，“自由市场”，“艺术良心”，“艺术天职”，“自由平等”等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

高沐鸿不仅在思想上言论上反对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而且他选择时机，认真地行动起来了。一九五七年二月，“火花”编辑部退回他的反动诗稿“故乡春吟”，他竟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威胁编辑部说要辞去“火花”编委职务。他看了省文联副主任姚青苗（非党员）的反动文章之后，给姚青苗写信说：“咱们携起手来，一同前进”！姚青苗自受到高沐鸿的鼓励后，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文章接二连三地发表出来。姚青苗在报纸上提出“开辟文化自由市场”的要求之后，高沐鸿利用副部长的地位，立即响应组织“诗社”，准备出版刊物。他对于以省文化局主办的“文化周刊”编辑任一的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也颇感兴趣。他支持任一的提出办“同人刊物”的要求。高沐鸿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不但不保卫党的利益，反而和右派分子站到一个立场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于此暴露无遗了。

三

高沐鸿的反党思想，是有其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入党以来，虽经党的长期教育，并没有在思想上得到“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在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地主阶级士大夫思想占主导地位。无论对组织对同志均以“硬骨头”自居，目无组织，唯我独尊，傲骨磷磷，驕横不逊。总是感觉党对他是一种莫大的约束。在一九四四年整风期间，他曾提出过“还党清白，还我自由”。并且写道：“如果感觉不到共产主义入骨沁髓的快感精神，则我无宁再保持历史上的那个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保持这份历史遗产，仍为有用之物，可以无敌于天下……”“不能不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打算一点，以便找得生活支柱，再则，干脆为人民服务，有失元神，绝非我这精神衰老之人可以担受！”“我的整风整了个什么结果呢？满可以自招自认，也曾千瘡万痍的找得根源，都开出药方，只是体弱吃不得苦药而已……如果党不谅解，我也任其不谅解存在”。这是高沐鸿十五年前的自白。从这些自白当中，可以看出一个坚持反动立场，坚决抵抗思想改造的个人主义者的面孔。而到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的期间，在治陶会议进行整党的过程中，他又曾说过：“难道我连做一个光荣的小资产阶级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就是这样，他的所谓“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却成

了包庇地主的代名詞。因此他曾經受到黨的當眾警告處分。從此之後，他一直是心情陰暗，落落寡合，對黨採取了對抗的態度。由於他這種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和反動的階級立場長期未得到改造，因而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緊要關頭，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是必然的。

四

對於高沐鴻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省委宣傳部根據省委的指示，從一九五七年十月初起，曾經召集有關單位黨的負責同志，先後舉行了五次會議，揭發、批判了他的反黨言行，並幫助他進行檢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黨的全省代表大會上，對高沐鴻又進行了批判鬥爭。省委的負責同志亦曾多次與他談話，幫助他認識他所犯錯誤的嚴重性。在此期間，他曾作過四次檢查，並聲言接受大家的幫助，決心悔罪。但是在檢討以後，卻又推翻了自己的檢查。根據揭發的材料證明，高沐鴻曾表示：“我那敢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我新的東西沒有建立，舊的東西也沒有了，這不是什麼也沒有了嗎？”可見他的檢討是完全虛偽的。因此四月中旬，在省委第九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對高沐鴻的問題又作了討論，一致認為高沐鴻是黨內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為純潔黨的隊伍，維護黨的紀律，決定開除其黨籍。並建議有關方面撤銷他的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的職務和省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資格。行政級別由十級降到十三級，另行分配工作。

從高沐鴻墮落為右派分子的事實中證明，一個共產黨員如果不徹底改造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沒有真正地樹立起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來，無論他有多麼長的革命歷史，最終都有可能墮落為反黨分子，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個人主義就愈將無容身之地，全黨同志應該吸取教訓，尤其是黨的文艺工作者，應該響應黨的號召，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加強鍛煉，加強學習，改造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使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的革命戰士。

中共山西省交通厅机关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景良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李景良，男，現年四十五岁，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人，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分軍人，一九三七年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七年六月入党。曾任晉豫边游击队大队长，參謀长，太行四、五分区參謀长、情报处长，山西省人民政府秘書厅秘書主任、山西省交通局秘書主任、副局长等职，現任交通厅副厅长，党組副書記。

李景良一貫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挑拨离間，拉攏对党不滿的分子、受过处分的分子和个人主义严重的分子，特别是与胥德林、张水林、郭进田等人，长期互相勾結，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及其他各項重要政策，破坏党的团結，打击报复同志，企圖从根本上推翻交通厅党的正确领导，实现他可恥的目的——篡夺交通厅的党政领导，建立独立王国，进一步反党反领导。

一、攻击党对他的审查。当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及波匈事件前后，他即攻击党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对他的审查，攻击当时党的领导人李达、冷楚等同志，向省委工业部大發雷聲。五次上書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說：“我要求必須补偿我这四年多的待遇，不能补，必須拿出充足理由。我不能承認住了四、五年監獄，結果沒問題，而不承認是弄錯了。”“整風中所以胡說，也是环境逼迫的……。”並在交通厅各种會議上向幹部散布說：“我有情緒，是因为工业部給我結論上写成‘特务根据不足’所致”。

二、一九五七年他又利用整風、鳴放的机会和其他右派分子

里应外合，向党發起了猖狂的进攻。攻击党的棉布供应和招生政策說：“过去动员男人穿花花布，进行服装展覽，布票不够还可以补發，听說今年后半年布票要对折，这簡直是‘抽風’”；

“去年（指一九五六年）动员許多人考大学，今年又說招的多了，連高中畢業生也不能升学，这叫幹啥”。說什么“厅有厅长，党有書記，我受过审查，我还有意見，我沒顧慮”；“我知道省委也不相信我，賺毬这十二級”。在他主持的鳴放座談會議上誘導座談对象說：“三反、肅反問題都可以提”；“你們尽量提吧！章伯鈞还有錯誤言論，我們都是他的部下……”；“你們不要光給小和尚提，也要給老和尚提意見”。在几次座談会上右派分子都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而李景良在每一次座談会結束时，特別是在人民日报“六八”社論發表以后，全国已經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都总是說，“大家意見提的很好，扯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去，請繼續大胆地提，說錯了不負責任”。他还在总结反右派斗争大会上給右派分子撑腰並重新發起进攻說：

“有人說搞两个通訊社不对，我看只要需要，搞三个通訊社有什么不可以”。

三、拉攏煽動各种坏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最突出的表現在对党的肅反、审幹等政策上，如对张水林問題，他和胥德林、郭进田、张水林一样認為肅反中处理张水林是党组書記王振德同志对张水林进行打击报复，因而在张水林释放后，他即向张水林道歉說：你的問題我原来不了解，运动还能不冤枉人？一直为张水林鳴不平，並想方設法讓张水林任副处长和做机务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不仅如此，还想方設法要赶走党组書記王振德同志。王振德同志調住高級党校学习后，李景良便企圖通过合法手續免去王振德同志党组書記职务，任命他自己为党组書記。因王系在职学习，未获批准，未达目的后，即攻击和威胁省委。

四、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由于他恶毒地猖狂地向党进攻后，生怕同志們揭露他，于是誰給他提意見他就打击报复誰。如李正一

同志在划李景良为左派时（李景良不在場），有过不同意的表示，别人在会后告他“李正一要划你右派”，他便于去年九月十二日發動了对李正一的斗争。企圖轉移斗争目标，妄圖将李正一一棍子打死，掩盖他的罪恶。

五、李景良自一九四三年受到党的审查后，对党引起了刻骨的仇恨，对革命心灰意冷，在此思想基础上拟出了：“健康、要好、积蓄、建家。不焦思，心静口紧”的“座右銘”。几年来念念不忘地在施行着。不仅如此，在政治生活中，对党的会议，政治报告不愿参加，不看党刊，不买政治学习書籍，饱食终日，无所思事，革命意志衰退，人生观腐朽透頂。

总之，李景良是带着極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走进党內的，企圖在党内发展自己。当党的事业要求他必須服从党的利益时，他却口口声声强调他和党存在着矛盾。在政治立場上、思想感情上，公开与党决裂。为了达到他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竟不惜利用一切机会，勾結一切坏分子，对党不滿的分子，在审幹、肃反、整風、反右派斗争等重大政策上，猖狂地向党进攻，以至墮落为右派反党集团的头子。

为了純潔党的队伍，严肃党纪，經支部大会討論一致通过，决定清除李景良出党。並建議行政上給以撤职、监督劳动的处分。

中共山西省

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韓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韓林，女，現年三十八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現任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組成員、省党代表大会代表、省直总党委監察委员会委員、省妇联常委委員。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 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互相呼应，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各項重大政策。当右派分子儲安平の“党天下”謬論發表后，韓林就積極响应。她曾在省妇联代表會議上說：“儲安平說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沒有民主人士，我們妇联是統战組織，更應該有民主人士当主席。”当时即有人反駁她的这种謬論，但她仍然坚持。最近检查时，說她当时認為，沒有民主人士就是“宗派主义”，实际上就是“党天下”。对社会鎮反，她說：“一九五五年敌情並不严重，錯案比例很大，是否把人民內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了？”对机关肃反，她說：“你們說机关肃反成績是主要的，为什么斗了四个，就錯了三个，只抓住一个？”否定鎮反、肃反的必要性，在无产阶级专政問題上向党进攻。此外，她对党的統購統銷政策、贖买政策、下放幹部政策，也均进行了攻击。

(二) 包庇縱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她的弟弟

韓彬，是一個漢奸，曾到日本受過訓，日本投降後又到了國民黨軍隊里，一九四九年從綏遠跑到長治找她，她介紹韓彬投考長治工業學校（未往），太原解放後，她又把韓彬介紹來太原山西公學，畢業後混入太原市公安局（不久逃跑，現在石家莊郵電局工作）。韓林對她弟弟的這些政治情況一直未向組織交代。反革命分子、一貫道點傳師張改鳳，在一九五零年鎮反運動中，改名換姓潛逃來太原隱藏在韓林家當保姆達五年之久，一九五二年省婦聯黎顯同志發現自己用的保姆是一貫道徒時（與韓林保姆張改鳳是同鄉，並有來往關係），曾向韓林建議對張改鳳進行審查，但她毫不理睬，並且還給張犯的兒子（系一貫道徒）介紹了工作。一九五五年鎮反運動中，張犯被揭露之後，她仍設法對張犯進行袒護，她竟親自領張犯到公安機關進行所謂“坦白登記”。張犯被交回原籍太谷處理時，還讓張犯帶走她的一個孩子，並先後給張犯所在村的幹部寫信三次，以省法院的名義給太谷公安局寫信一次，表示對張犯生活的關心和負責，起到減輕張犯罪責的作用（只判管制三年）。張犯被管制後，還來過韓林家四次，領導發覺後對她提出批評時，她還對抗說：“這是人情”。曾先後贈送張犯人民幣七十餘元，同時又伸手向國家要求救濟七十元。更惡劣的是，韓林把張犯被管制，說是打亂了她的家庭，使她不能安心工作和學習，對黨和政府抱了極大不滿。她的另一個保姆柳淑貞（壞分子），曾進行偷盜、流氓、投機倒把、挑撥是非等違法活動，在全民整風中幹部家屬及群眾對她揭發出很多問題，大家公認柳淑貞是壞分子，而韓林不相信黨和群眾，並對領導街道整風的幹部說：“群眾揭發的問題不確實，某家屬對柳提意見是報復，柳淑貞是有缺點錯誤的好人，不是壞分子。”對柳進行包庇袒護。公安機關確定柳淑貞為壞分子帶去集訓後，韓林曾因此氣得病在床上。反右派鬥爭中，機關右派分子吳輔國態度蠻橫，不低頭認罪。由於韓林和吳輔國在發表右派言論上有共同之處，她不是支持群眾向右派鬥爭，反而指責大家：“鬥爭過火”。並且

還說什麼：“吳輔國在肅反中被錯鬥還能沒有些情緒，不然把你們鬥爭一下，看你們有沒有情緒”。阻撓反右派鬥爭。由於她站的是敵人的立場，在處理案件上曾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開脫罪責。如對罪行極為嚴重，非殺不可的現行反革命犯晉全銘，改為無期徒刑。對詐騙國家公款三千三百元巨額而又無理取鬧的罪犯左斌，竟以民事債務糾紛，改判釋放。

（三）抗拒和反對黨的領導。韓林不僅在各項政策上反對黨的領導，而且對省委和省政法黨組的領導也是很很不尊重的，並且有過抗拒和反對的行為。如省委指示檢察院、法院、司法廳三個機關合灶，她採取了抵抗的態度。肅反期間，她是機關五人小組成員，省委通知開會，她抗拒不去。黃石山同志由省委開會回來，要開會進行傳達，派人兩次去叫，她不來，第三次叫來之後，在會上大哭大鬧，使會議無法進行。黃石山同志對她提出嚴格批評後，她不但不接受，反而還誣賴說：“黨對我不信任”。對政法黨組的決定，她可以任意不執行。如賀振國與周治田爭執小孩案，在政法黨組作出處理決定之後，她不但不執行，反而一味偏袒賀振國，助長賀振國、崔文芳夫婦無理取鬧。

此外，她還在幹部中經常散布流言蜚語，攻擊領導，破壞團結，其情節也是非常惡劣的。

二、鬥爭中的態度

韓林對其以上罪惡事實，長期以來不主動向黨交代，領導指出以後，才進行檢查。在檢查中間，開始檢查不深刻，避重就輕。在鬥爭深入，經大家多次批判鬥爭後，雖然初步低頭認罪，承認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問題，但內心仍幻想按內部問題處理，因此，在宣布她為右派分子以後，曾一度公開向領導及群眾對抗，態度極為蠻橫。領導為了幫助她認識錯誤，叫她談話，她竟對抗說：“你們是共產黨員，我是右派，沒有什麼可談，該殺就殺，該關就關，要槍斃就槍斃，浪費一粒子彈，有話現在不說，

可能得了精神病再說，或者帶進棺材里也不說……”並說：“我還要綉上‘右派分子韓林’六個大字帶在身上，我還覺的很光榮”等等。后在大会上作第五次檢查時，同志們批判她檢查不深刻，她又對抗說：“嫌我檢查的不好，我就收回來。”但不久又有悔悟，承認了錯誤，表示願意檢查。最后在領導和同志們的幫助下，作了比較誠懇的檢查，認識了罪惡。

根據她的以上錯誤事實，充分證明韓林已墮落成為黨內的右派分子。為純潔黨的組織，嚴肅黨的紀律，經支部大會討論決定，開除右派分子韓林的黨籍。

中共陝西省衛生廳支部委員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王月明黨籍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王月明，男，現年四十六歲，陝西清澗縣人，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份革命職員，一九三四年參加革命，一九三五年加入黨，曾任縣委書記、地委組織部長、地委副書記等職。現任陝西省衛生廳副廳長、黨組委員、衛生廳機關分黨委書記等職。

一、主要反黨言行

（1）誣蔑和辱罵省委，不斷地向黨進行“政治爆炸”。

王月明為了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卑鄙目的，企圖借前廳長陳純炳同志工作中的一些缺點、錯誤，通過一九五六年八月間衛生廳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來斗垮陳純炳並撤換一批直屬單位的負責人，以樹立他個人威信。后因未能實現其企圖，王就氣勢凶猛地跑到省委，當著李書記的面惡毒地攻擊省委。他辱罵“書記

处是老爷班子”、“省委是蜕化了的省委，是堕落的省委”、“他娘的是什麼省委”、“我怀疑到底是共产党的省委还是国民党的省委”，还说：“考虑你们这些出席“八大”的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还说：“我愿意牺牲个人换取省委对卫生工作的重视”等等。

一九五六年九月間，又对李書記說：“我看为革命負責的人，不一定是官高职显的人，我看在困难的問題上，誰都負責，誰都不負責。省医院的問題，我看書記說句話，由赵部长就可以解决了。”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王月明又在李書記召开批評他的一次會議上誣蔑和中伤省委及省委領導同志，並歪曲省委的政治生活，他說：“省医院的問題长期不能解决，是書記不讓部长解决，有人說是高枫对省委一些主要領導同志献殷勤的結果”。並說：“就是将高枫換了，对于你們几个負責人看病，也不会不方便嘛”。又說：“将市衛生局局长中調一个人到衛生厅作副厅长的意見，由于省委个别負責同志不同意，就未实行。究竟省委是集体領導，还是根据个別人的意見？不根据工作需要办事，我怀疑省委的政治生活是否有不健康的成分”。他說“省委对陈純炳的态度，我有很多意見，省委包庇陈純炳”（省委对陈的問題已作过处理）。会后王月明又給张华萃同志轉李書記的一封信上說：“省委要包庇陈純炳到底”等等。

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正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王月明的态度也是非常恶劣的。如当姚尔明放出反党言論后，王对其談話时还说：“你們医院鳴放还健康，你鳴的也好”。以后在研究斗争姚尔明时又说：“姚尔明不好是高枫压制民主和宗派主义造成的，姚尔明的思想代表着衛生厅一部分幹部的思想，姚尔明不能斗争，要斗争就要脱离群众。”同时，当省产校校长张鋆重同志請示王月明如何处理学生鬧事問題时，王不但未予协助，反說：“党内人心不齐，鬧事是必然的”。当二衛校学生出現鬧事現象，衛生厅党組要他去解决這個問題，他亦不去。

当大鳴大放时期，王月明在李經綸同志面前更露骨的誣蔑說：“我看党内沒有真理，老实說我曾一度想退党”；又說：“省委書記還不好當嗎，我看只要會批評人就行了”。

一九五八年元月二日晚，衛生厅黨組召开扩大會議（張華莘、劉显曾同志参加了这次會議）研究王月明的檢討提綱時，与会同志一致認為他的檢討不深刻，提了一些意見和批評，王不但不虛心考慮，反而粗暴無理，又一次向党攻击，他說：“我認為自己沒有了不起的錯誤，我認為幾年来的工作还是努力的。因之，要自己檢討好，还是有困难的”；“这几年总是我对省委为什么不滿？誰曉得”。又說“一九五六年衛生厅召开的政治工作會議，我看到根本开不好，不如給省委来个‘政治爆炸’（指辱罵省委那一次）”，“我有反党思想，为什么反党，不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了陕西省一千七百万人民的衛生事业”。同时，在會議上他要求張華莘、劉显曾同志不要他作自我检查，还說：“因有反党思想，不好检查，組織上作个結論，該撤职查办，开除党籍，由組織决定；如要检查，由黨組研究，我照本宣讀一下。过去我鳴放的不少了，要定右派也可以，党内沒有真理”。並且說：“对陳純炳迁就，我不知省委是什么原因”，“我要省委检查衛生厅工作，始終不检查，是对衛生厅放棄領導”。

（2）經常散布反对省委的謬論，在他的反党思想影响下，衛生系統形成一股对党不滿情緒。

王月明恶毒的誣蔑：“省委很不重視衛生工作，从衛生厅工作上似乎感觉不到党的領導。省委的領導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省委的負責同志，也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並說：“省委对困难問題誰都不願意沾，对党的事业不負責任”；王还不止一次地說：“几年来我得到的經驗是要斗争，共产党内不斗争不行。”

王月明也不放过任何可以向別人散布对省委不滿的机会，如省委負責同志帶病下乡，需要帶个医生，王月明就向人說：“省委就是特殊，到哪里沒有衛生院、衛生所，下乡还要帶医生”；

在一次党組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衛生系統某些幹部提拔得不适当时，王反說：“省委提拔王荣、江云都合适嗎？作过地委書記的还没当上省委的部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王月明在护士座談会上，擅自宣布護理員可以直接晉为护士，曾造成了下边的工作混乱，結果王月明又把責任推給省委，說“省委不批，我有啥办法？”

为了反对省委，破坏党的团結，王月明不惜玩弄两面派手法。如一九五五年陈純炳的鑑定，其中尽是优点（是陈自己主持厅务会作的），省委察覺后指示王月明应給陈另作鑑定，並曾多次督促，直至現在陈的鑑定还未作，而王月明却常說：“省委包庇陈純炳”。一九五七年陈純炳調离陝西时，要两个書箱，衛生厅已买了两个箱子，事后却又請示省委文教部，文教部意見：由衛生厅研究决定；鳴放中群众批評此事时，王月明却說：“陈純炳买箱子，带护送人員是省委张、刘部长同意，李書記批准的”。

一九五六年工資改革时，王月明以个人名义，向省委提出要將陈純炳的工資級別由九級晉至八級；王季陶由十一級晉至八級；楊在泉由十一級晉至九級，后因未批准，王就对这三个人說：“你們的級別，我已向省委提了意見，省委不批”。

在王月明的反党思想影响下，一些幹部的錯誤思想有了滋长。如有的誣蔑省医院高枫同志是“溜省委的尻子”，因而一九五六年發生了衛生厅医防处三个科員在科长王活同意下联名誣告高枫的事件，誣告材料是經過王月明审阅同意后發出的。后經查証，並無事实根据，系捏造中伤幹部。高枫曾三次要求王月明亲自处理这个問題，王竟答复說：“你的問題厅里解决不了，你請省委解决吧”。

王月明不但自己散布反对党的謬論，他对于別人放出的对党不滿或誣蔑的言論，都表示支持。一九五七年六月王参加省医院的鳴放座談会，听到了誣蔑省委的謬論，他当即指示王子績（省医院办公室副主任，党员），將这些謬論整理后报給他。一九五七年冬，赵書記曾去信讓衛生厅考虑，为照顧一幹部的爱人关

系，將其未婚妻分配在西安附近工作，而幹教處副處長王秀士却多次說：“省委破壞了幹部制度”，這種錯誤說法曾在黨內進行過批評糾正，王月明也是知道的，但當王秀士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整風會議上又說：“省委破壞了幹部管理制度”時，王月明却立即插話問：“是誰？名字都可以講出來”，王秀士接着說：“是省委趙伯平書記”，總之，王月明認為一有機會，就散布反黨情緒和言論。

（3）王月明主管衛生廳的人事工作，在提拔使用幹部上敵我不分，喪失立場，使幹部工作異常混亂。

據目前查証，在衛生廳及直屬單位的人事幹部和重要部門中，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騙子、政治歷史不清及有嚴重思想問題的就有十餘人。如劉玉田是一個偽造歷史的政治騙子，一九五七年却派至省地方病防治所任人事幹事（最近才處理）。薛忠信曾是個偽警察，讓擔任省精神病院人事幹事，薛曾利用職權，借調動工作之際，偽造其愛人級別（最近才撤換）。袁國華是歷史尚未弄清，據檢舉系三青團分隊長，一九五七年發現有三青團問題後，仍提拔為衛生廳幹教處副處長。陳寶生思想意識很壞，一九五六年王月明在通遠坊療養院檢查工作時，提拔為該院人事科副科長。任建貴歷史上脫過黨，解放後品質惡劣，道德敗壞，曾被清洗出黨。而後又從教育廳要來擔任省中醫進修學校政治教員。賀普安因嚴重的不負責任，在工作中發生多起醫療事故，曾被管制兩年，期滿後，三原縣人委電話告訴王月明：“如果你們要用，應監督使用”，王反而將賀提拔為省產校附設產院代主任職務，並提為技術六級。一九五六年工資改革中，有人提出安國瑞是叛黨自首分子，應考慮提級是否妥當？王月明卻說：“管他叛黨不叛黨，只要有能力就行”。

王月明敵我不分，喪失立場還表現在對其他人的信任上，如右派分子吳霽棠獨攬防務協會，一貫反對黨的領導，象這樣的人，他從不過問。對右派分子姚爾明，王也是非常信任。

(4) 散布消極情緒，工作不負責任。

王月明在衛生廳幾年以來不負責任，將衛生業務工作推給王季陶，致使黨的方針、政策不能很好貫徹，王月明對此熟視無睹。在黨的工作上，王月明身為衛生廳機關分黨委書記，一九五七年全年只參加了兩次黨委會。一九五六年發展的六個高級知識分子，檔案材料只字未看過，一個人都沒給談過話。對上一級的指示是照抄照轉、推壓，下邊送來的報告，從來沒有看過。當下邊的同志請示工作時，不但不給出主意想辦法，却散布消極情緒，他常說：“科員對科長有意見，科長對廳長有意見，我這個廳長還有一肚子牢騷哩”，又常說：“衛生廳的工作誰來也搞不好”、“一個單位一個黨員負責幹部，工作還可以，兩個黨員就弄不成了，三個黨員就更亂。”

在精簡機構工作中，省醫院提出一些困難，王說：“任務嘛！看怎麼執行，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地方病防治所提出精減中的問題時，王月明說：“多編少編沒有什麼，人多了就多作點工作，人少了就少作點工作，能作到什麼程度，就作到什麼程度。”

二、在批判鬥爭中的表現及其所持的錯誤態度

王月明在批判期間曾檢討過三次，其態度是有一些進展和改變，但仍不願徹底認識錯誤交代問題，企圖蒙混過關，反復無常。如第一次檢討時不承認有反黨思想，第二次檢討後，即又找李經綸同志談：“你批准我捏造事實的話，我就承認有推翻省委的野心”，且說：“昨天的檢討重了，提的高了”。第三次檢討後，又找李經綸同志說：“我已徹底交代了，再不能深了，若要再深，只有說假話或者死路一條”等。甚至在一次小組會上，對同志們批評他的意見，不但不加考慮，反而當散會時，氣勢囂囂地摔門，憤憤而走。最近又說他要進行第四次檢討。

鑒於上述反黨事實，王月明已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最起碼的

条件，經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支部扩大會議討論，全体黨員一致通过將右派分子王月明开除出党。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楊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右派分子楊林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學員。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第十八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楊林的很多極為严重的錯誤，經過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學員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楊林的右派面目，第十八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楊林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通过决定將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過严肃慎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十八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陝西省委的意見，得到了陝西省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
关于右派分子楊林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簡 历

楊林，陝西省子长县人，現年四十九岁。文化程度高小畢業，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零年二月参加工作，同年四月入党。历任陝甘紅軍支队中队长，县苏維埃政府副主席，边保司令部供給部长，盐务总局局长，旅供給部长，旅政

委，一野后勤供給部政委等职。来校前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党委書記。在高级党校学习时期，任普通班第十八支部書記。

(二) 主要錯誤事实

(1) 恶毒地攻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誣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誣蔑一九四七年的土改运动，攻击党中央对运动的正确领导。他說：“一九四七年土改三查时搞得太过火了”，“群众要咋办就咋办”，“把不该斗的也斗了，农村中發生惨死现象”。他还說：“当时所用形形色色的刑法，就是桀紂时代也沒有这些”。他又說：“东北土改發生偏差和少奇同志在土地会议講話有关，听说高崗为此問題对少奇同志还有意見”。他还責备中央沒有总结，未“向全党作个交代”，“在八大也未提”，借此来追究中央和少奇同志的“責任”。

2、为叛徒高崗抱不平，否定中央对高崗問題的正确处理。他認為：“高饒問題應該公布”。在核对事实和檢討中他承認說：“自以为高崗反对的是少奇，而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处理高崗問題，对高的錯誤估得重了，帽子大了，逼得紧了”。使高崗“回不过头来，不敢承認錯誤，以致自杀叛党”。他还認為“高崗的錯誤，中央負有一定責任”。同时，他又說：“高崗过去有功”，对其处理应“将功折罪”，因而認為中央处理是“太过火了”，企圖为高崗翻案。

3、誣蔑中央基建方針“冒进了”，中央领导“一陣風”，有忽左忽右的現象。他說：“中央一冒，影响我們各个方面都冒了”。他又說：“一件事一下急起来，馬上公布动员搞，过去又放松了”。如一九五五年要降低工程标准和造价，……陈云同志过去算过賬，窝工费由建筑部門拿还是合算，“过几个月降低标准的劲又松了，結果造成了浪费”。他又說：“現在少奇說要动员家屬回乡（家），过去刘部长（刘秀峯同志）对我說过，少奇

同志說：你調上海工人應該把家屬帶來，蓋一條象上海式的街房，他們就習慣了。都是你（指少奇同志）說的，我們怎么執行”。在工資問題上他認為：“也是‘一陣風’，也就是忽左忽右的現象”。他還攻擊說：“周總理說上半年增加工資是對的，下半年國家窮了，不該增加工資了”。

4、埋怨中央布置任務太多，把自己工作中問題的責任歸咎于黨中央和國務院。他說：“我們搞建築是主要的，可是中央給下邊任務太多，中心太多，如增產節約、肅反、審幹齊頭並進，都是中央來的”。“自己忙的要死，還要受上級批評，下級也埋怨我們，我們是挨頭子、受氣工作，不是監察部門來找麻煩，就是報社來找麻煩”。他還說：“李富春、薄一波同志今春在西安又要反對‘大少爺’作風，我首先要反對他們自己，這些事都是他們決定的”。在查對事實時楊說：“浪費這股風是從中央刮下去的，是上行下效”。他還說：“我們單位是矛盾的集中點”。“各部門互相扯皮，除由於本位主義外，就是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統一，這些制度大都是國務院批准的”。“這是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各搞一套”。“國務院和國務院打架”。

5、為寒假路費問題攻擊財政部。他幾次向同志們散布說：“我們工資里沒有包括路費的因素”，曾和個別同志說：“要不發路費就向中央鬧，給中央寫信，派代表請願”。他見到財政部在報上公開檢討給高級黨校發路費問題時，不滿意地說：“這還不是要手腕，這就是給關上門了”。在向中央和學校提意見時，他提出了應該發路費的八條理由來攻擊財政部是“單純財政觀點”，甚至他還誣蔑李先念同志說：“他是老干部，當上副總理忘了老干部的苦處”。

（2）對黨和國家的幾個重大政策有嚴重的抵牾情緒。

關於統購統銷政策，他認為：“在執行中有過死過嚴的情形，西安市有的學生餓跑了，工地工人餓的睡不着覺，劇團演員下台後沒有吃的哭鼻子。國家並不是沒有糧食，却不讓百姓吃飽，

鐵路沿綫糧堆霉爛”。

他對中央規定的三反、肅反運動控制數字不滿。他說：“中央規定要老虎數字，我有意見”，“肅反中也有指標，我不反對數字，但應有較大的伸縮性。我們局內肅反搞到的多數是歷史反革命”。

他認為：“我們很多計劃是按照蘇聯的辦法搬來的”。並說：“你們鐵道部（指同組鐵道部的同志）、財政部多是硬搬蘇聯的一套”。

（3）對陝西省委“八大”代表選舉不滿。

他認為“陝西省委選舉‘八大’代表時‘民主精神不夠’”，並說：“我們這麼大單位，省委也不照顧一下，代表候選名單是由主席團指定的，我們只是划個圈。”“我是組織服從，思想不通”。

（4）對中央決定留校整風，公開表示對抗。

學校傳達中央指示留校整風時，楊在支委會上氣憤地說：“提早結束是鄧小平一個人決定的，留校整風也是鄧小平一個人決定的，都是鄧小平一個人決定！”他還說：“黨中央和學校動員我們給中央提意見，提了意見回來就留下來整我們”。當學校發下整風參考資料時，楊表現了很大的抵觸，曾兩次提出要看學校給中央所作的原報告。他從整風反右派鬥爭以來一直抱消極態度，放鬆對支部工作的領導。

此外，他在一次小組會上還說：“三反時首先帶頭作檢討，新三反又要檢討官僚主義，反保守檢討右傾、保守，反冒進又得檢討盲目冒進。老幹部總得挨整”。

（5）革命意志衰退。

在小組閒談中他說：“我現在四十九歲了，盼望再活二十歲，最小的孩子二十一歲了，不管賣苦力、蹬三輪，也能謀生了”。在查對材料時他說：“我幹了將近二十八年，象老驢子一樣，力量出盡了，該讓位了。現在學不進去，上進心不強了，有

浓厚的暮气。但要求保持中灶待遇，走路不背舖盖”。

此外，他还說：“在評軍銜时，我曾想到：自己转业了，不值钱了”。

（三）錯誤的根源

楊林在鳴放期間，表現了上述一系列的反黨反中央的錯誤言論，是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

楊林虽然二十八年来，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为党作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他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把工作中的成績归功于自己，認為党亏待了他。因而，他的居功自傲和名位思想就日益滋长和發展起来，常常表现了狂妄自大，以老卖老，自以为是，不是把自己置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之下，而是把自己与党并列起来，甚至同党对抗，以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点看待党的組織。早在一九五四年陕西省学习四中全会決議时，他所作的打油詩中，就有为高崗丑表功的内容，並受到过批判。他虽在形式上作了檢討，但思想上並未解決問題，反而認為中央对高崗的处理是从宗派和成見出發，这就完全走上了与党相对立的道路。

（四）对錯誤的态度

楊林对其錯誤的認識，虽然經過了一些反复，但从整个检查批判过程来看，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对土改和高崗問題作了基本的交代，承認了自己是党內的右派分子。值得指出的是楊林对其錯誤的徹底检查和認識还是不够的。

（五）結 論

根据以上事实，楊林由于严重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的發展，在資產階級右派向党进攻时，就完全站在右派立場上，在重大的政治問題和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性問題上，对党中央、国家

領導人員進行了誣蔑和攻擊。因此，我們認為，他是黨內的右派分子。

為了鞏固黨的組織，純潔黨的隊伍，根據黨中央處理黨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第十八支部支部大會全體同志一致通過，開除楊林的黨籍。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委員會 關於開除右派分子王文良黨籍的決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右派分子王文良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四支部學員。在本校反右派鬥爭中，第四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王文良的很多極為嚴重的錯誤，經過支部大會的批判和全校學員的批判、討論，業已徹底揭露王文良的右派面目。第四支部根據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和王文良的錯誤性質，已於支部大會上通過決定將他劃為右派分子並開除出黨。黨委會經過嚴肅慎重的研究之後，同意第四支部的決定。這一決定已報請中央審批，中央征求了陝西省委的意見，得到了陝西省委的贊同，最後中央也已批准這一決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普通班第四支部
關於右派分子王文良的政治結論

（一）簡 歷

王文良，男，現年五十四歲，陝西清澗縣人，貧農出身，一九二八年入黨，曾任清澗縣委書記，中央組織部二科交通，陝甘

与边区交际处副处长，西北军区军邮局长，西北局统战部处长等职，来校前任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二）主要錯誤事实

第一，对三反运动进行攻击。

（1）否定三反成績。王文良說：“三反是伟大的嗎？我是挨过整的，我認为是錯的。”又說：“西北军区是以官僚主义反贪污，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

（2）对于三反中某些規定和方法不滿，並联系到对肃反运动进行攻击。他認为“三反百分之十、肃反百分之五的規定不科学，三反百分之十真害死人”！对于大胆怀疑，他認为是錯誤的，至今还有保留意見。

（3）对于三反善后工作亦極为怨恨。他說：“三反报纸上公布了贪污分子，搞錯了的为什么不給平反？外国搞錯了死了的还给恢复名誉；我被公布好几次，打过了，公布过了，就这么算了？”又說：“別人受委屈不管，收拾人的中央保护他，說是忠心耿耿，不要难为他，难道受委屈的就不忠心耿耿，为什么不應該受到党的爱护？”尤其是他借此狂妄地提出：“为了国法，中央应进一步地注意善后工作”，並攻击党的历次运动“都有违法現象”。要中央检查。

（4）对在三反中曾批評过他的西北军区司令員×××同志，經常肆意辱罵，不容別人置辯。

第二，攻击中央的正确路綫。

他在鳴放期間說：“王明路綫錯了，难道你毛澤东路綫就都正确嗎？”他污蔑中央的領導說：“‘左’、右那一次不是从中央来的啊！”

第三，不滿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中停，並借此誹謗中央及中央一些領導同志。

王文良說：“中央整下不整上，搞錯了許多人的××，为什

么在七大时汗毛未动，还选为政治局委员。”又说：“××给人难处，善于察颜观色；他要怀疑的人，你哭、笑、站立都不对；你积极工作，他说你装正经。××最会给人看相，这是他在延安的杰作。”他还造谣说：“延安中央党校还有一个‘紧急治罪法’，是中央搞的，还是××搞的？××有权公布这个法吗？”

第四，替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作辩护，对中央某些政策怀疑和不满。

(1) 他认为定息不是剥削，曾说：“是国家赐予的，为什么非说人家剥削不行呢？”

(2) 当中央公布了广西平乐地区虚报产量的情形以后，他便推论到全国都可能有虚报产量现象，从而怀疑全国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的可靠性。

第五，反对留校整风的决定，散布反中央的言论。

他怀疑党校向中央关于整风学习报告材料的正确性，要求学校把向中央反映同学中右倾思想的报告材料“交二十六个支部书记核对”。当大家一致表示要展开思想检查时，他说：“没有什么问题，我是不发言。不发言，没有什么讨论头，就不会延长时间了。”有的同志说：“应该明辨是非”，他则以煽动的口吻说：“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更为恶毒的是他竟说：“中央这一手（指留下整风）办的很拙劣！”

（三）错误根源

王文良由一个具有将近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走上反党反中央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一九四二年王文良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因他曾被捕过，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便对党极为不满。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因他领导运动不力，和私商互请吃饭，铺张浪费等被停职反省。他对党这样的正确处理，不但不虚心检查自己，痛改前非，反而背着老资格的包袱，颠倒黑白，到处喊“冤”，长期对党怨

恨不已，加之，他居功自傲，长期不注意政治学习，更促成他和党离心离德，以致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终于走上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四) 王文良对待错误的态度与表现

当运动开始，对其错误进行揭发时，他态度蛮横，拒绝检查；经严厉地批判后，他才作了一些检讨，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躲躲闪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在同志们反复的帮助下，才承认了错误，并在支部大会上进行了交代和检查；但对其在三反运动中所谓“冤屈”真相，一直有意歪曲，经组织上掌握了真实情况与其对证材料时，他仍采取了拒不承认的蛮横态度；后经严正的批判，王文良的态度才有了转变，在联支大会上作了较为诚恳的交代与检讨，承认了自己反党反中央的罪行，承认了自己已堕落成为党内右派分子。

(五) 结 论

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说明王文良已经蜕化变质，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经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其党籍。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晓天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右派分子王晓天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十五支部学员。在本校反右派斗争中，第十五支部的同志们揭发了王晓天的很多极为严重

的錯誤，經過支部大會的批判和全體學員的批判、討論，並已徹底揭露王曉天的右派面目。第十五支部根據中央劃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王曉天的錯誤性質，已於支部大會上通過決定將他劃為右派分子並開除出黨。黨委會經過嚴肅慎重的研究之後，同意第十五支部的決定。這一決定已報請中央審批，中央征求了內蒙黨委的意見，得到了內蒙黨委的贊同，最後中央也已批准這一決定。

附：關於王曉天的錯誤事實材料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王曉天，男，四十一歲，吉林省長春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學生，一九三七年九月參加工作，一九四一年三月入黨，來校前任內蒙糧食廳副廳長。

一、一貫對黨的領導不滿，攻擊黨中央，攻擊毛主席，攻擊內蒙黨委。

（1）在聽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的錄音後，他對小組內一位同志表示斯大林沒有錯。這位同志說：“斯大林的功績不能抹殺，但錯誤也是嚴重的，如肅反擴大化，十七次黨代表會的代表被殺了多少人！”他就說：“那麼中國肅反就沒有擴大化？死了多少人呢？”他又說：“我就不同意三七開。”

今年五月中，他一看到校部社會科學資料室發下的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社會矛盾索引”，其中斯大林的目錄有三十六個，就說：“硬說斯大林沒說內部矛盾，人家說了這樣多，我一見到這個就高興。”後來，他又到另外一個同志的房間里，翻了翻那本索引，又拍拍桌子，氣憤地說“毛主席說斯大林沒有說過內部矛盾，你看，他說了多少啊！”

（2）同年五月中當他看到劉少奇同志在湖南省委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講到現在人死了還有等級，北京人民公墓葬墳什么样

的幹部葬在那一等，多少面積，都有規定。他就對一位同志說：

“这不都是中央規定的嗎？現在又批評別人。”

少奇同志在報告中講到，過去是私有制，因此對分配沒有人去比，現在是公有制，大家都有一分，分配要公平合理，大家都要比一比（大意）。他却說：“那不見得，國民黨時代農民也跟地主比。”

（3）同年五月中，當他和小組同志談到工資福利問題時，他說：“去年一股風，要提高工資，周總理還作了檢討，同天又說提多了，又和解放前比。”一位同志反駁他說：“這是沒有經驗。”他說：“按你這樣說，什麼都沒有經驗，那就沒有問題了。”

（4）同年二月，當他看到報上刊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發展养猪的決定後，他對小組內一位同志說：“你看中央總是這麼幹，連生猪的問題也要發聯合指示，這有什麼好處呢？這樣的指示到下邊以後，就會造成以黨代政。”（去年下半年當他看到中央和國務院發表一個聯合指示後，也曾表示過不滿。）

（5）在今年五月底的一次小組會上，他認為中央對大放火鳴估計不足，沒估計到過去工作中的錯誤，他覺得中央有驕傲自滿情緒，對錯誤估計不足，因此放後就亂了。

在一次小組會上，他認為“籠統地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和缺點是次要的，不足以服人”。這句話在“六八”社論發表前後，他都說過。

（6）在今年五月底的一次小組會上座談對整風認識的時候，王曉天說：“原來說今年準備，明年整風，毛主席還這樣說，一回來馬上就整風了，忽左忽右。”這句話在和同志們交談時也說過。

（7）在去年八大選舉時，他在小組會上和個別交談時曾說：烏蘭夫如果不是少數民族，連中央委員也當不上，他認為烏蘭夫同志能力不強，他在內蒙工作時，曾對少數民族幹部說：烏

兰夫同志当选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是沾少数民族的光，引起少数民族干部的愤慨。去年九月二十七日还和一位同志说过：“内蒙党委委员都是饭桶。”

(8) 据内蒙森林工业局局长反映：有时和王晓天联系解决粮食问题，直接找他谈问题时，他就高兴，事情也解决得快；如果是经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要他解决问题时，他就不满意。

(9) 今年五月下半月，在一次小组会结束后打扑克时，他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当时有一位同志批驳说：“有些共产党员吧。”另一位同志说：“即使有些共产党员不好，也不能比国民党还坏。”又有一位同志说：“象国民党那样就够呛了！”

(10) 他曾跟内蒙的一个干部不止一次地说过：“现在省长和部长以上干部的生活比国民党时代的官还舒服。”

(11) 在鸣放期间，有一次小组讨论整风问题时，他曾提出：“为什么每次都要搞运动？”

(12) 今年上半年，有一次，王晓天突然问一位同志：“为什么要缴党费？”

二、“六八”社论后，仍否认右派向党进攻，反对留校整风，赞同右派分子言论。

(1) 六月八日前听了校党委的传达，他和一位同志个别谈话时说：“原来叫放，这时又说夺取政权，怎见得夺取政权？为什么别的支部没有这样讲？”他又去问支部书记：“别的支部有没有这样传达？”看到六月八日社论后，在小组讨论时他又说：“对右派批评是否过早？从那里看得出右派是在进攻？怎见得是在夺取政权？”

(2) 在六月八日社论发表的一天（或后一、二天），他对其他支部一位同志说：“社论有什么根据说右派要推翻我们？”“何必用这个办法呢（指用漫画讽刺的形式）？要多用说理。”

(3) 在六月二十二日小组讨论留校整风时，他认为学校第

一次提前結束是“惊慌失措”，“从那里看得出右派是在进攻，說那样几句话就在夺取政权？”

他又說：“学校的计划变化太多，忽东忽西，說资产階級夺取政权，我就想不通，我也沒有看出什么。所謂紧张就在大城市，其他地方不見得紧张，現在給人家印象似乎资产階級声势浩大不得了。学校所說右派思想是如此嗎？听說学校學員們所提意見已發到中央各机关，有点大惊小怪。現在这也是問題，那也是問題，連入學考試卷子也搬出来了，以前幹什么了，为什么不早說，搞得那样紧张，又要整思想，搞右派分子”。

他又說：“来高級党校就是学馬列主义，提高社会主义覺悟的，一年都沒有提高，如沒有解决思想問題，两个月也解决不了問題。有些人的思想問題一輩子也解决不了。”

(4) 六月八日以后，他在一次小組会上說：“对肃反問題的估計是不是成績是主要的，这种看法有問題，我看缺点錯誤需要适当估計。”

(5) 六月八日以后，他認為林希翎所說的“对现实不滿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有正确的一面”。

(6) 在看了儲安平的檢討后，他在小組会上和个别对一位同志都說过：“原来知无不言还有个界限？！我过去还不清楚。”

三、否認、諷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今年五月底，小組討論农业合作化时，他觉得合作化的問題很多，並用老根据地一个中农的言論加以証明。有的同志談到农业合作化后政府对农民是有支援的，他問給了些什么？同志们說明政府給农民貨款，肥料、种子等，大力支援了农民。他却說：“給的多，但是向农民要得更多，还有公粮。”

今年四、五月間，有一次一位同志到他屋里去，臨走时他說：“我看合作化就沒有优越性。”

(2) 去年十二月他在支部大会上听了中央批發四个有关

农民生活情况简报的传达后，回到屋內就說：“反正是农民倒霉。”

（3）今年四月間，他看到衛生球是黑色的就說：“还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衛生球都是黑的！”

（4）今年四月間，当他听到布票打折使用以后，他說：布也不够了，这还算什么优越性呢？（大意）

（5）去年在討論“八大”文件期間，有一次，小組同志爭論三个改造的性質問題，王認為資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改造的性質是一样的。其他同志認為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沒收，消灭的問題，而农业、手工业改造則是提高的問題。后来王晓天說：“土改才多久，又集体化了，农民沒有意見嗎？农民的觉悟有那么高嗎？”

（6）在學習資本論时，他曾到五組两位同志的屋里，問道：“咱們經營粮食賺錢，是不是剝削？”五組两位同志說：“咱們国营商业，利潤都上交，怎能說是剝削！”他就說：“唔唔，我还以为是剝削呢。”

四、对党在內蒙提拔少数民族幹部有不滿情緒。

（1）去年小組討論“八大”文件时，他表示，对机关幹部民族化問題同意賽福鼎的發言而不同意烏兰夫的發言，認為烏兰夫自己是少数民族，強調反大汉族主义，不全面。

（2）在另一次小組会上，他認為少数民族幹部提多了，就是把內蒙全部少数民族都提来作幹部也不够，对于多提少数民族幹部想不通。

五、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

（1）去年，在一次小組討論临結束时，他曾說：“反正什么都要有錢，有錢就能行！”“到了共产主义还是要有錢才吃得开。”类似这样的話，他說过不止一次。

（2）今年三月中旬三組一位同志到王的屋內找組織委員交党費，王晓天将表格拿去看过后說：“你們連个十級的也沒有

嗎？”“把我們也填上吧！”

他在去年开学后即到处打听支部同志們的級別。据原来介紹王入党的一位同志說：王晓天很关心級別待遇問題，他一到党校遇見我即問，你是交多少党費？还說过去某某等二人是我們在专署的科长，現在还是十二級，落后了……等。

（3）今年三、四月間，当小組一位同志談到幹部下放和減薪問題时，他說：“我看还是在城市好。”表示不願下去，即使下放不減薪，也不幹。

当談到平日工作中下乡問題时，他曾表示不願下乡，常說下去不受尊重，下乡不解決問題。据他自己說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四年中只下去过一次。而且只是到县以上机关。

（4）小組选举他当副小組长，在临散会的时候他气愤地說：“我才不当这个奴才呢！”

（5）王晓天認為在內蒙地区工作生活艰苦，願到大城市，不願在內蒙地区工作。

（6）王晓天原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入党，同年九月轉正的，但是，他在入学报考登記表上，却填写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入党，一九四一年三月轉正。当他的两位入党介紹人糾正他的入党年月时，他还不老实承認，甚至对其中一位同志是不是他的入党介紹人，表示記不清楚。

中共兰州市委员会

关于右派分子秦汝哲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秦汝哲，男，汉族，現年三十三岁，山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〇年入党，現任兰州市公安局长，市委委員。

历史上的主要問題：一九四七年晉綏土改时，曾被群众要去和关押三天（因其兄秦儒英逃跑，家无主事人故要去被斗）。

秦汝哲的主要右派言行：

一、同意右派言論

1. 同意右派分子水梓提出：公布刑法、成立法学院、建立考試制度。他說“水梓提出成立法学院，我看很必要，目前，我們司法幹部急需要受正規的法律訓練，至于水梓提出的幹部要实行考試制度，过一个时候可能考虑实行，目前是不成的。”並同意右派分子屈凌汉攻击社会主义工資制度的謬論。

2. 一九五六年赴外參觀，在长春學習“八大”文件，討論“长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时，秦不滿罗部长对黃紹竑的指責，他說：“在黃紹竑的發言中看不出有什么攻击，罗部长不冷靜”。

二、挑撥党群关系，煽動肃反对象翻案

1.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市公安局第一次鳴放座談会上說：“有些問題处理現在看是不合适的……我考虑也不够适当，

談出來不合适的可翻案……，比方我們現在要檢討，但由於處境不同的限制，有些問題就覺不出來。比如李振基（右派分子）的情緒，過去覺來了，但象今天談的就沒有感覺到，我們頭上沒有壓的喘不過氣的滋味，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他們（指肅反重點分子）受的多，就有急切需要反掉的希望”。

2.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次鳴放座談會上說：“有些問題大家還可以研究，如宗派主義問題、官僚主義問題等，現在黨與非黨等關係，應該轉變了，是時候了，……有些處理如有問題可研究推翻，希望能幫助查這個問題”。

三、攻擊肅反運動

1. 肅反運動結束初期，他認為“肅反成績不算太大，缺點卻不少。覺得鬥爭的面較寬，鬥出來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不多，有些可以由審幹方面解決的問題，也當肅反重點鬥爭了”。

2.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全體股長以上的幹部會上，作題為“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報告，實際上是片面強調了“有錯必糾”，丟掉了“有反必肅”的方針。

3.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在市公安局兩次召開的鳴放座談會上，有些肅反對象要求看自己的肅反檔案時，他答復說：“你們可以看”，並說：“有些處理過的事情，如果有問題可研究推翻，希望能幫助檢查這個問題”。

四、反對黨的幹部政策和組織原則

1. 整風開始有些非黨幹部（有些後來是右派分子）提出，公安機關派幹部出外工作，介紹信上註明政治情況（黨團員），對聯系工作不便，他們要求取消，他表示“可以考慮”。由於他的支持，曾一度有的非黨幹部外出工作寫介紹信時，就拒不用印有政治情況的介紹信了。

2. 整風開始後，在一次非黨人員及一些有意見人員座談會

上，非党幹部羅鳳鳴提出“为啥調去學習都要党团员呢”？他說：“这个誰也沒有規定，就那样執行着哩。”

3.在鳴放中有些非党幹部（有些現在是右派分子）提出，为啥公安局科、分局長幹部都要党员？他說：“我看有些人是可以提拔的”。

4.他还說：“我們过去对历史上有点問題的人扣得太紧了，比如有些人是伪党团骨幹，但給敌伪作事時間短，解放后給我們工作多年了，对这些人扣得紧，实际上是对党的教育作用估計不足。”

五、反对党的領導，拒絕執行上級的政策和指示

1.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反破坏事故斗争，兰州市布置作了一个时期，到一九五七年三月总结經保工作时，他認為兰州就沒有多少破坏事故，提出反破坏事故，有点脫离实际，並認為現場保衛工作与安全检查工作，基本上是一回事，主张交安全检查部門去管。並將中央經保工作上的反破坏事故斗争的首要任务，擅自改为“安全生产，防止事故”。同时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召开的二科科、組長會議上說：“反动的标語，传单謠言不能当事故看待，向中央写一报告（实际中央早已作了决定，反动标語等应以事故看待），鬧鬧事件不要当敌情看待，如果把反动标語当事故看，反破坏事故斗争口号再提一百年也是正确的”。

2.省公安厅提出严厉打击美、蔣特务，他認為“甘肃騷乱事件突出，不能和沿海地区相比，我們这里美、蔣特务就沒有發生多少，这个口号提的不具体，甘肃应从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做起”，“反动标語大都是小孩写的，残余反革命基本肃清”等无敌或少敌的論調，在他出外參觀回来后对科长說：“其他地方对敌情也不一定熟悉。”又說：“未參觀前，对兰州的工作提心吊胆，这次把其他地方一看，也就放心了。”並認為“兰州經保陣地越来越大，政保陣地越来越小。”因此，去年四月在他的積極

提倡下，将市局政、經、文三偵察科合併为一个偵察科，一个保衛科。

一九五四年，他曾主張縮減分局，加強派出所，撤銷了分局股，將分局變成督導性質，實際上派出所並沒有加強，而是從組織機構方面削弱了對敵鬥爭的力量，使工作受到了很大影響。

3. 一九五七年省公安厅指示蘭州市應搞打擊刑事犯運動，開始他對是否搞運動，動搖不定，叫不叫運動曾討論過，其笑是不大同意搞運動。以後雖然同意搞，但親自研究督促不夠，以致運動進展緩慢，打擊不力，運動結束後，刑事案件依然上升。

4. 中央規定要局長親自批准的某些偵察手段，也交給正、副科長去批。

5. 中央公安部規定，市局六科的業務要定期向中央公安部有關業務單位寫專題報告，而他卻提出科、分局一年寫一次總結報告。

秦從去年十月停職反省到現在已半年多的時間，對上述反黨言行毫無認識。尤其在黨代大會期間，經大小會揭發批判後，秦不但不低頭認罪，反而以拉攏引誘、暗示煽動等手段，利用黨興民等四人，公開替他辯護，解脫罪責，企圖混淆敵我界限，蒙混過關。

根據上述事實，經中國共產黨蘭州市第二屆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討論通過，將秦汝哲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中共青海省委員会

对右派分子刘杰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五月)

刘杰(女)，汉族，四十岁，陕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二月入党，現任青海省妇联主任，全国妇联执委，行政十級。

刘杰是孙作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員之一，夫唱妇随，对孙作宾的反党罪行，毫无揭發，这次會議中，一再包庇。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 刘杰極力反对党的肃反、审幹、反右派斗争。她說：“肃反、审幹冤枉了一些地下黨員，这是不了解地下党的艰苦与情况所致”，“雷鳴(原青海日报副总編輯、党内右派分子)說过，省委是老虎屁股不敢摸，雷主持青海日报新聞方向有錯誤，这是否就够上右派。”又說：“一个人給弄上几条缺点就成为右派了”。主张楊希尧(民盟主任，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在内部斗一下，不要上报。当孙作宾指示他的反党集团成員之一潘光亚平反秦志伟的反革命問題时，她說：“老潘！你也是被整过的人，其中情况总是知道的。”在大鳴大放时，她鼓励孙作宾反党集团的另一个成員毛文祥說：“有意見就放”，当大会印發了两份攻击省委的匿名信时，她說：“难道群众連个匿名信都不能写？还說發揚民主叫人家提意見嗎？”对于达参事件，她說：“河南叛乱……去年打了也不解決問題，弄得很惨，民族关系搞坏了”。

(二) 污蔑省委不能代表妇女利益，她說：党要教育幹部。

“認識……工作做的再好，如不把婦女工作作好，只算作了一半，黨員再好，也只算起了半個黨員的作用。”“省委委員中沒有婦女委員，一河水開不了。”“如果我不離甘肅，早就是省委委員，現在新疆的呂銘是省委委員，我也不比她差吧！”

（三）污蔑青海省委是“陝北宗派”，說省委“陝北人佔多數，其它地區的不過是陪衬，部隊幹部亦不多，部隊同志很有意見，婦女就更不用說了，這對團結各方面不利。”潘光亞交代

“我是說了省委陝北人比例大，孫與劉杰都說比例就是大”。有人提出“省委不堅決執行中央指示”，她說：“這個說的正確，民族統戰工作就搞的不好。”

她對於孫作賓，却有意吹噓：“孫書記的職務頂不頂中央一個部長？”“他是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實際是副部長）就当不了一个第一書記。”

（四）對於孫作賓在民族、統戰工作上的投降主義，劉杰是夫唱婦隨極力支持和執行的，她認為“青海省三百多名上層民族代表人物家屬，在群眾中有廣泛深刻的影響，是民族婦女的代表……她們是本民族中有特殊作用的人”，“我想向省委提出讓蔡塔，尤黑魯作縣長或副縣長”。為了擴大個人影響，不經組織批准，常以個人名義出現，給王德海、康克明等人的老婆送禮，給魯閣（河南蒙旗親王，已故）送禮，還給西藏某上層婦女寫信問好，顯示自己重視統戰工作。她推薦右派分子馬樂天（司法廳廳長，划而未斗的右派分子）的小老婆趙湘（妓女出身，已划右派）為西寧市婦聯副主任。

（五）介紹現行反革命分子唐仲常（中華革命黨中央宣傳委員，解放後又以唐為首組織中國社會黨）去勞動局安置了工作。

（六）會議開始後不久，就指示毛文祥為孫作賓找根據，說“高、孫是關係問題”，說：孫作賓的主要問題是與組織關係沒擺對，革命意志衰退和嚴重右傾。同時對她自己的問題讓婦聯副主任王玉芝捎話給全國婦聯，怕省委把她“弄錯了”“冤枉了”。

二、整風中的态度

包庇、抵賴，至今仍未徹底交代。

三、处理意見

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銷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共青海省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 潘光亚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五月)

潘光亚，男，四十四岁，汉族，甘肃省清水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現任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这次下放为河南县委第一書記，行政十級。

一、主要反动言行：

潘光亚是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幹

(一) 污蔑党的領袖。

(二) 污蔑省委書記，除孙作宾外都是“铁路警察”。

(三) 与孙作宾合謀，借民族统战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到处煽風点火，专门搜集“五五一条”作为攻击省委的毒箭。

(四) 抗拒省委领导。潘在处理“达参叛乱”善后工作中，报請要給四十余名上层头人送礼，省委批复不能送，但他拒絕执行，反送了九十五人，而且連叛乱头子們也都送礼道歉。

(五) 攻击和污蔑省委的幹部政策“是稳重的吃得开，积极的吃不开”，“青海的幹部没有一个水平高的，都不見得称职”，“青海的幹部政策是宜守不宜攻”。

(六) 潘是孙作宾一貫反党的極先鋒，二人称兄道弟，无話不說，潘可以罵孙“羞你八輩子祖宗”，孙也可以罵潘“羞你的先人”。早在一九四七年潘在孙的指使下即曾惡毒地攻击当时隴东地委書記李合邦同志，污蔑“隴东地委是宗派主义集团”、“地、县委書記都是陝北人”；在甘肃他支持孙作宾誹謗張德生同志是“繡花枕头”、“笑面虎”，高健君同志是“阴險”、“忘恩負义”；在西北局他同意污蔑馬文瑞、李景膺同志是“宗派主义”；在青海孙說“省委常委陝北人多，”潘答：“高是一統天下，別人插不上手，沒有別人吃的飯”。

(七) 反对平息“达參叛乱”，污蔑我們“打得不对，打得很慘”，“部队紀律很坏，无故杀死活佛和槍斃群众”。声称“应由当地党政負責”，叫嚣要撤公安局长的职，要杀部队几个人的头。

(八) 反对、污蔑肃反，破坏整風、反右。潘自称他对肃反政策的态度是“反也可以，不反也可以”，並說：“在党外人士中肯定不搞肃反，今天不搞，将来也不搞，如果搞到党外，那就不是一个肃反問題，而是造反的問題”；他污蔑机关肃反是“烏煙瘴气”、“打击了幹部的积极性”，公开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翻案。整風开始，他威胁給他提意見的人說：“反对领导也能成右派”，但又煽动和打保票說：“給別人提意見不定右派”；反右中他假借習仲勳、汪鋒同志的名义，說“青海反了馬文鼎对爭取台灣不利”，对机关的右派分子，他主张“定也可以，不定也可以”，並公开講：“右派分子也有前途，过几年会成为黨員，今天的黨員过几年也会成为右派分子”。要幹部“以同志式的关系对待右派分子”。

(九) 处处維護剝削階級利益。自称“作統战工作就是靠剝削階級吃飯”、“民族統战工作就是上層工作，中央沒有作下層群众工作的規定”、“千百戶、牧主‘都是革命头人’”。

(十) 政治品質極端惡劣。一貫採取卑鄙下流手段，打击別

人抬高自己，挑拨离間，造謠生事，封官許願，收買拉攏，曾无耻公开地說：“我要的是省委常委”，並托刘杰給孙作宾捎口信“把我的官升一升”，未达到就埋怨孙“把我弄到青海来就落得这个下场”。

二、斗争中的态度極其恶劣，出尔反尔，不肯低头認罪。

三、处理意見：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銷一切职务。

中共青海省委監察委员会 关于右派分子雷鳴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雷鳴，男，三十五岁，河北安次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五月入伍，同年十一月入党。曾任华北抗日联军二十七支队一总队政治处幹事、二营五連政治指导员，一二〇师政治部幹事，一軍一师三团政治处股长，青海互助县委副书记，青海省人委办公厅秘書处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在整風和反右斗争前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編輯。

雷鳴在日寇侵略至家門时，抱着寻找出路的目的混入我軍，在部队工作期間就十分驕傲自負，个人主义严重，抱怨組織提拔自己慢。到互助县工作后，更加暴露了他資產階級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丑恶面貌，在一九五一年春节时，群众組織秧歌队到县委会拜年，有一反动富农（后被判刑六年）高呼“雷主席万岁”、“雷書記万岁”。雷鳴不但沒有制止，反而欣然自得給以鼓励。同年在湟中参加土改試办工作时，在幹部中傲慢地說：“湟中試办的好乡不如互助的落后乡，尙志田（当时湟中的县委書記）該杀头”。但后来互助县在土改复查工作中發現大部分漏掉和錯划地

主成份的錯誤都是雷鳴批的。雷鳴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中打击县委書記吳正夫同志，在幹部中散佈“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謬論。他認為“世界上根本沒有具備工人階級思想的人，解放軍打堡壘有的人雖然英勇，但動機不純”。報紙上發表省委的工作總結后，他說是“假的”。誣蔑

“省上處理問題和舊社會一樣，只許州官放火，不許民間點燈”。“我國有民主，但有不同意見不能講。美國打民主招牌，

但有反面意見可在報上登”。後來省上派沈嶺同志去互助縣任書記和縣長時，雷又為自己沒當上縣委書記而不滿。同年八月被調到省人委辦公廳和秘書處工作后，把秘書處特殊化，擅自擴大

“青海政訊”的編輯組織，在由他決定抽調的七個編輯中後來查明有五個是歷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一九五六年又擅自代表省長向團省委組織的“青年遠征隊”講話發獎。雷並且誣蔑“省委以

黨代政，听不得反面意見，百依百順的是好幹部，有些人強調黨的領導，讓黨包辦了一切”，

另外，雷鳴在辦公廳和互助縣工作時，還亂變機構，按個人好惡用人，隨便給和他臭氣相投的人封官許願，提職升級。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被調到青海日報社工作后，又糾合右派分子，大肆向黨進行攻擊。其主要罪惡事實有以下几点：

一、否定黨報的成績，反對黨對幹部的審查和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

雷鳴到報社后否定報紙的成績，說“社論空洞，老一套”、“消息枯燥”、“板起面孔教訓人，群眾不愛看”。誣蔑報社以往工作是“一本爛賬”，“同志關係冷冰冰，生活狀況不象個機關”，“肅反而寬了，不該斗的斗了”，提出要少宣佈幾個肅反對象。當右派分子誣蔑“黨組織有宗派和關門主義”時，雷鳴迎合說“領導把同志們的歷史問題看得太嚴重了”，“幹部、人事工作神密”。他把在思想改造中因有反動言行而受到批判的人說成是“精神受了壓抑”。對右派分子和壞分子向黨的進攻說成是

“兇子急了要咬人”，“可以理解”。極右分子程远給極右分子郭統厚的反动信件，孙君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同志批示系胡風思想，須典型批判。雷鳴却怀疑說“从一封信是否能断定一个人的思想，这只是思想落后”。右派分子辱罵“彙报是沒人性，黨員有奴性”，“入党是朝气衰退”，“領導不懂人学”时，雷鳴却認為这些意見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

二、糾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雷鳴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报社两个右派小集团勾結一起，专门搜集领导的缺点向党进行攻击。在报社检查工作中，雷鳴煽动群众攻击乔迁（报社总編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調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仍兼总編輯），說“报社的問題都是乔迁的，与我无关”，“大家不敢对乔迁的缺点抱不負責任的态度”；号召大家在下面醞釀意見；影射乔迁說“大家提了意見如果不改，就是国民党作風”。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同志到报社講話，斥責了右派的反动思想，雷鳴公开反对說“高書記不了解报社情况，我沒向他彙报过，有一些意見我不同意”。省委書記陈思恭同志指示报社要全面检查工作，不要集中检查領導。雷鳴抵抗說“不知道該咋办好”。当乔迁同志作自我检查后，右派分子大肆攻击时，雷鳴也借机点火，煽动要乔迁挖意識、割尾巴；右派分子質問党、团员，积极分子为啥不發言；雷鳴却指責不發言的人有“个人主义”；右派分子罵某某人接触領導“八面玲瓏”，雷鳴同意这种說法。当党内一些同志被右派分子打击的抬不起头来时，雷鳴反惡毒地誣蔑說“某某人为闊地位待遇而消極，某某人个人主义严重”。当同志們提出要批判右派所造的攻击領導的謠言时，雷鳴說“誰知道有沒有”。后来，編委提出检查工作有偏差，要糾正。雷鳴却說“无偏可糾，誰認為有偏去向‘群众’講”。最后，还要报社中級領導同志以自己的檢討去带动右派，混淆两类矛盾，掩飾右派罪恶。

三、反对党的領導，搞独立王国。

雷鳴把黨視為阻碍他發展的絆腳石，誣蔑黨領導的歷次革命運動的正確性，說“每當運動初期做的愈左愈好，這是黨的要求，左總比右好一點。黨搞什麼運動歷來都是先緊後松，碰到頭上倒霉，碰到尾上不要緊”。“根據我的經驗，歷來運動都是左的，有偏差”。右派分子孫明軒借省委修建新址寫稿攻擊省委時，雷說“你不要想的太天真了，省級機關存在的問題不止這一件事”，並在群眾中散佈說“高峯不如張仲良（前省委書記）”，說“整風彙編”上全國各省的材料都有，就是沒有青海，以此誣蔑青海領導不行，破壞領導威信。一九五七年春生產抗旱時省委提出“千軍萬馬”的口號，雷說是“形式主義”。雷對省委要他列席的會議，多不親自參加，而隨意指派別人代他出席；認為省委對報社工作的批評是對他的不信任和干涉，如說“你既然叫我在這兒工作，就應該完全信任我，不應再干涉”。對省委宣傳部和該部的負責同志極不尊重，說“宣傳部管的太多了”。宣傳部長午人同志批評報紙配合中心工作做的差，雷鳴罵道“去他的吧，他懂得個啥”。雷鳴還採取打擊和分散報社編委委員的辦法，破壞集體領導。右派分子視報社幹部科是“眼中釘”，雷鳴就取消了幹部科。在調動幹部上也是從他個人的好惡出發，如今春提拔的二十名組長級幹部中就有右派二名和不少歷史未作結論或思想上有嚴重問題的人；由他自己決定調配給採訪室的十四名記者中，右派分子就有七名，雷並稱這些人是報社的“精華”。另外，還想把原在報社工作后被送去勞教的反革命分子庄本先、石麟祥等人調回報社工作。有些問題雷鳴是先與右派分子雷廷梓研究后才拿到編委會上去通過。當支部對他這種喪失立場和獨斷專行的作風提出批評時，他竟說“支部要受編委會的領導，我是負責人，我可以決定”。此外，雷鳴不經請示省委就把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草稿、劉少奇同志在廣州黨內會議上的講話及鄧小平同志在甘肅的講話等重要文件讓右派分子雷廷梓翻印，結果毛主席的報告被寬大釋放的反革命分子李階倫去送交反

革命分子庄本先传閱，严重洩露了党的机密。

四、圖謀篡改党报的方向，向党放出許多毒箭。

雷鳴长期以来对省委十分不滿，对省委对他在工作上的正确批評抱仇視和抗拒态度，因此在他到报社工作后就竭力想把党报当成为他反对省委的武器，以党报和省委分庭抗礼，和省委唱对台戏，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大肆講“大家怕什么，省委不是不可以批評，(我是)老虎屁股也敢摸，頂大总編輯不当，我原来就不願意来报社”，“批評要抓大的，不要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拼着一身剮，皇帝也敢拉下馬”，“要搞些有質量的批評”，“以往報紙是人們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我們的報紙很不够，礼拜六、礼拜日要多給人們消遣的东西”。由于雷鳴是資產階級的办报观点，在他支持下，“青海日报”曾在一個时期出現过不少的錯誤和毒草。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为了配合右派的进攻，曾进行了不少歪曲事实、夸大缺点的反动宣传。如去年五月一日“青海日报”第一版刊登“中央关于整風运动的指示”，雷鳴就在第三版用通栏标题：“解放思想，解决矛盾”，暗示过去思想不自由。五月十七日又別有用心地在一個消息的副題中标出“有的同志認為張國聲（省委書記）同志在省宣傳工作會議總結中將其他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划入敌我矛盾不妥当”。雷鳴尤为恶毒的是利用党报进行煽風点火，企圖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滿。如五月十八日他亲自指示要公开在報紙上討論“遊行示威是大民主的办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否违犯宪法”，“过去提政治领导业务，現在又說政治为业务服务，应如何理解”，“我們和平解放台灣，寬大蔣介石，如果人民不答应怎么办”，并且还指示下乡記者在各县召开座談会，搜集对省委和省的领导幹部的意見。另外，在雷鳴领导下“青海日报”江河沅副刊已变为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的講壇。雷鳴还利用“左叶事件”擅自决定召开新聞界座談会，以此来反对党对新聞工作的领导。

以上事实說明，雷鳴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已發展到極其

严重的程度，他一貫抗拒党的領導，反对省委，積極勾結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圖謀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並且一再坚持錯誤，拒絕改造，已墮落成为一个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維護党的團結和統一，經青海日报社支部討論通过，並經省委二〇二次常委會議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雷鳴的党籍，撤銷其所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編輯的职务，行政上由十二級降为十七級使用。

中共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哈木提尧魯达 西甫的党籍

(一九五九年)

哈木提尧魯达西甫，解放前在拜城县伪稅局任稅务检查員，于一九四五年参加民族軍后当战士、事务长、連部总务、师供应处副指導員，轉业后在南疆行署財政处任副处长。在高級党校結业后任自治区供銷合作社副主任。

历史問題：系国民党黨員，

主要反动言行：

1. 反对祖国統一、破坏民族團結。他說：“新疆沒有汉族亦可建成社会主义”，更加惡毒地說：“供銷社在关內代訓的學員不允許調回，今后我們培养当地的民族幹部”，合作社的庫房在吸收汉族战士时，他反对並下命令說：“离开部队，找不到工作的民族战士非常多，应吸收他們，今后你們应录用民族战士”。他还帶污蔑的口吻說：“應該讓民族同志担任採購員，目前的採購員由于是汉族，所採購的商品不适合民族同志的風俗習慣，积压了

很多的商品，損失巨大”。反对汉族领导同志及汉族幹部，尧到拜城后曾这样謾罵县委書記韓瑞說：“你看这个烏龟，起初我們是用維語交談，現在这个人好象不懂維語似的，真是，从烏魯木齐来到这个地方，就不認識人啦”。其他汉族领导幹部給他提意見，他說“我根本和汉族不能共事，尤其我和王树恒（譯音）（中共拜城县委委員會書記）合不来”，以上述論調制造不團結。他不服从县委领导，任意走、随便来，工作情况也未写書面报告。他不仅打击合作社的幹部馬左良（黨員科長）、張啓元、田建才等人，而且还污蔑說：“这些人是說大話，不办事的东西，从外表来看是个人，就是不办事。”尧到原合作社后，不仅污蔑与排挤汉族，而且还拉攏以阿依明·艾里为首的若干落后分子、坏分子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收集安主任的材料，进行顛复领导的活动。一九五八年二月份任主任（供銷合作社主任）从北京开会回来以后，写出传达會議精神的提綱后对尧魯达西甫說：“沒有专门材料，我就按照此提綱传达”，他反对說：“沒有維文嗎？世界正个是属于你們的啦”。

2. 反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項政策。在党委五月扩大會議及財貿會議上叫囂說：“我虽是合作社副主任，到关內採購商品的幹部，他們到那里去？購買些什么？不得而知。成吨的購进扁担、坎土曼把子、鞭桿子、木床……等，这类商品新疆不能解决嗎？我認为完全可以解决，这样做是支援了关內手工业者，却忽略了新疆的手工业者”。尧在五月大会上給阿不都熱依木·艾沙帮腔說什么：“从整个發展手工业的角度来看就是依靠了一方，却又損害了一方”，尧为了在扩大會議發言，曾准备了一份专门材料，他在發言前，曾讓哈捷耶夫同志看了，当时哈捷耶夫說：你根据什么准备的，这是不对的。此后，他沒有發言（据了解这份材料是为歪曲真理，反对党及民族團結而写的），該材料至今尚未交出。尧在一九五七年合作社社員代表大会上，有意識制造混乱，在做財務決算报告时顛倒是非說：“我們的基建資金未下

放，参加了业务周轉”。当时与会的以伊明毛拉吉（右派）为首的一伙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落后分子均向领导猖狂的进攻，並說：领导給我們算算賬。

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艾里的哥哥向艾里及尧魯达西甫談了一些反对在瑰同駐扎的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論时，由于尧亦是反对人民解放军，于是将此視為把柄，他說：“如果是这样的话，应立即向党委彙报”，将艾里的哥哥用小汽車送到党委农村工作部。尧魯达西甫反对党的內、外貿易政策說：“在下面合作社吃苦，但名声却屬於外貿，外貿的利潤多，合作社却在賠本，合作社收購了却不供应群众，其中有問題”，他反对一九五七年合作社向天津調拨三百吨葡萄干，叫囂說：“未經我批准向关內調运了三百吨葡萄干”。一九五七年为了向苏联出口，区党委及人委批准了三千二百吨干果出口計劃，尧反对說：“計劃数字太大，一九五六年生产下降了，且一九五七年自由市場开放，此任务我們难以完成”。

尧魯达西甫到原合作局后，就与一部分右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落后分子、坏分子混在一起，不仅在生活、思想、行动方面亲密无間，而且趁着党委工作组了解培养民族幹部情况的时机，以他們同路人的意見为基础，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阿依明写了一份充滿反对党的领导、幹部政策、民族政策言論的提綱，阿依明写出六条后，他說：“无力”，于是他亲自动手，补充了三条，其題目是：“领导同志的官僚主义”其主要內容是：“黨員幹部与非党人士的团結差，党对統一战綫所持的觀點不端正，解决所有的問題时均未發揮民主，向群众执行了少数人专政，党的大門紧閉，党成了非党人士的‘蜘蛛’（以党来恫吓非党人士——譯註），未搞党的建設工作。沒有适当的安排民族幹部，目前我机关的民族领导幹部，存在着有职无权，有桌子无工作問題，未关心幹部生活。”不但如此，他为了突現其机关“民族化”，不允許从关內招收學員，及使合作系統的民族幹部“有职无权”的

反动野心，积极进行了反动活动。（尧鲁达西甫在合作社时所写的材料及其臭味相同人的详细情况见单行材料，尧的这份材料虽让他们数个同路人写出，但未拿出，在这次斗争中其中一个人交了出来。）

尧鲁达西甫为了使其同路人、民族主义分子阿依明入党，拼命地进行了活动，他在党的会议上这样说：“应该接受阿依明入党，他是立过许多功劳的人，有关他的问题我曾询问过伊明诺夫主席，他说：无任何问题。你们不了解他。”上级领导曾对尧这样说过：“阿依明常叫嚣什么‘新疆没有出现象纳赛尔那样的人物’等反动言论，因此应注意他的言行”。虽然上级领导向他提出警告，但尧依然在为阿依明的入党问题，进行积极活动，在党的会议上说：“应吸收阿依明入党，对该人入党的问题，拖延的太久了。”他在党支部委员会上提出按民族成分建立小组，进行了分裂党的活动，他说：“应在民族党员中成立一个小组，如此做，对祖国统一，国际主义并无害处，亦不违犯党的政策及马克思主义”。

一九五七年区供销社的库房发生火灾时，全市职工、干部、部队、学生均积极地在扑灭火灾，尧鲁达西甫来到现场，问道：“这是那个机关的仓库？”他毫不经意，当天和他的老婆孩子乘小马车去乌拉泊野游。

3. 歌颂反革命分子，反对肃反、审干政策。他到供销合作社后就和反革命分子、落后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糾合在一起，不仅支持他们，打击积极分子，而且积极公开地进行反对党的活动，他还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提拔坏分子卡斯木库尔班、穆提吾拉，落后分子沙克江、木沙热依木等人的职位。在肃反的时候，确定卡斯木库尔班作为肃反对象时，他反对说：“我知道卡斯木库尔班的历史，我不相信卡斯木库尔班的历史有问题，他解放以后的问题是属于思想问题，不能作为肃反对象”。在审干期间他又说：“把卡斯木库尔班的历史应作出结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

有作出結論呢”。尧魯达西甫未經过任何手續就把坏分子阿不都热苏尔自行吸收，並把他配备搞秘書工作（阿不都热苏尔現在劳改中）。

尧魯达西甫不仅与坏分子勾結在一起，而且到拜城去以后，借口要解决农民的烤火問題就到被管制的富农烏沙音艾力的家去当客人，讓他（富农分子）宰羊一起吃喝（該富农是个国民党的軍官，曾和尧魯达西甫發生过極其密切的关系，尧对該富农究竟談了些什么問題尚未交代）。当反革命分子阿不里孜馬合苏木从獄中被释放出来以后，和他来往頻繁，同时他还歌頌阿不里孜馬合苏木所写的：“献給母亲和女”、“礼拜日”等反动的詩歌。

4. 对运动所持的态度：

尧魯达西甫的思想極为反动，对整風运动的态度一貫表現恶劣，交代問題与对錯誤的認識方面均差。尧交代問題时抱着敌对的态度說：“我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者，只是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傾向而已，把我的政治問題和法律性問題相对照的話，是不足道的，我再沒有交代的問題了”，尧包庇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阿依明並为他辯护說：“我对阿依明将以事实为依据向他进行斗争，我不能将阿依明視為兇恶、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整風运动中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坏分子一道飲酒作乐，他的生活作风極恶劣，有着严重的违法行为。

尧魯达西甫的劳动态度不好，在劳动当中，仍然散布反动的言論。尧被斗后仍企圖与海力且木發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关于尧魯达西甫的违法乱紀行为

尧魯达西甫的作风从来就是恶劣的，一貫賭博、吸麻烟及嫖風……等。解放以后在喀什生活上表現腐化墮落，並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此外还与坏分子糾合在一起酗酒等。来供銷合作社以后常与海力且木（女）接近（原合作幹校翻譯），于一九五七年底到拜城县搞粮食工作时，与海力且木一起酗酒、形影不离，后与她發生肉体关系。發現海力且木怀孕时，尧在烏市写信讓海力且木

到喀什医院去打胎，海里且木沒有到喀什而到阿克苏医院去打胎，医师未同意她打胎，对她說：这是属于法律問題，她无法打胎便返回烏市，尧給海里且木打主意並讓她到伊宁去打胎，海里且木虽然想到伊宁去，但被領導上發現以后未批准，因而未达到目的，海里且木生了孩子（此問題有海里且木自己检查交代的專門材料）。海里且木生孩子以后，尧付了住院費一百元，尧这种不法行为不仅引起了当地幹部（拜城县）的不滿，而且还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憤。

尧魯达西甫不仅在生活上腐化墮落，而且在拜城县的时候，曾与解放以后被劳改过的富农分子烏沙銀艾里，阿合买提热西丁等人来往頗密，甚至到他們的房子去閑談，尧以“不要把政治問題与生活問題混为一談”为借口，經常和坏分子、嫌疑分子、反革命分子来往頻繁，丧失了立場。从拜城县返回烏市时甚至未将他自己的党关系带回来，过了五、六个月以后才給海里且木写信讓把关系轉回来，他由于生活腐化，因而工資不付支出，去年曾申請補助，結果得到一百元的補助。

一九五七年以八个月付款的办法从原自治区供銷合作社經营管理处選購一只价达四百二十元的奧米卡名表，以后对牙生江（处长）說“你們以現款卖吧？”，牙生江說：“与我处汉族經理研究一下”。尧說：“我确定你是处內有权利的負責人，有什么与他們研究的必要，你可以自行处理”，后来把这表以四百二十元現款售給斯馬依成了变相貪污。

尧魯达西甫来供銷合作社以来的工作表現不仅不好，而且和坏分子糾合在一起到处酗酒，發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此种流氓行为在群众中产生了極不良的影响，于一九五七年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艾力爭吵不休，几乎發生拳斗。于一九五七年原自治区供銷合作社倉庫失火时，为了搶救受災物資使国家財產少受損失，全烏市的机关职工、学生和部队一起动手灭火，尧来到失火的地方背着双手滿不在乎地說：“在这兒也有我們的倉庫嗎……”。

当天和他老婆孩子一起坐机关的小汽车到乌拉泊去野游。

一九五七年他到拜城县搞征粮工作去的时候，不仅他的工作态度不好，而且对党的征粮政策的認識和态度亦不正确，当地领导干部曾严格的批評过尧，尧不服从当地党政部門的統一领导，与当地领导干部鬧不团结，並对拜城县县委書記海端抱着敌視的态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資降一級，下放劳动鍛炼。